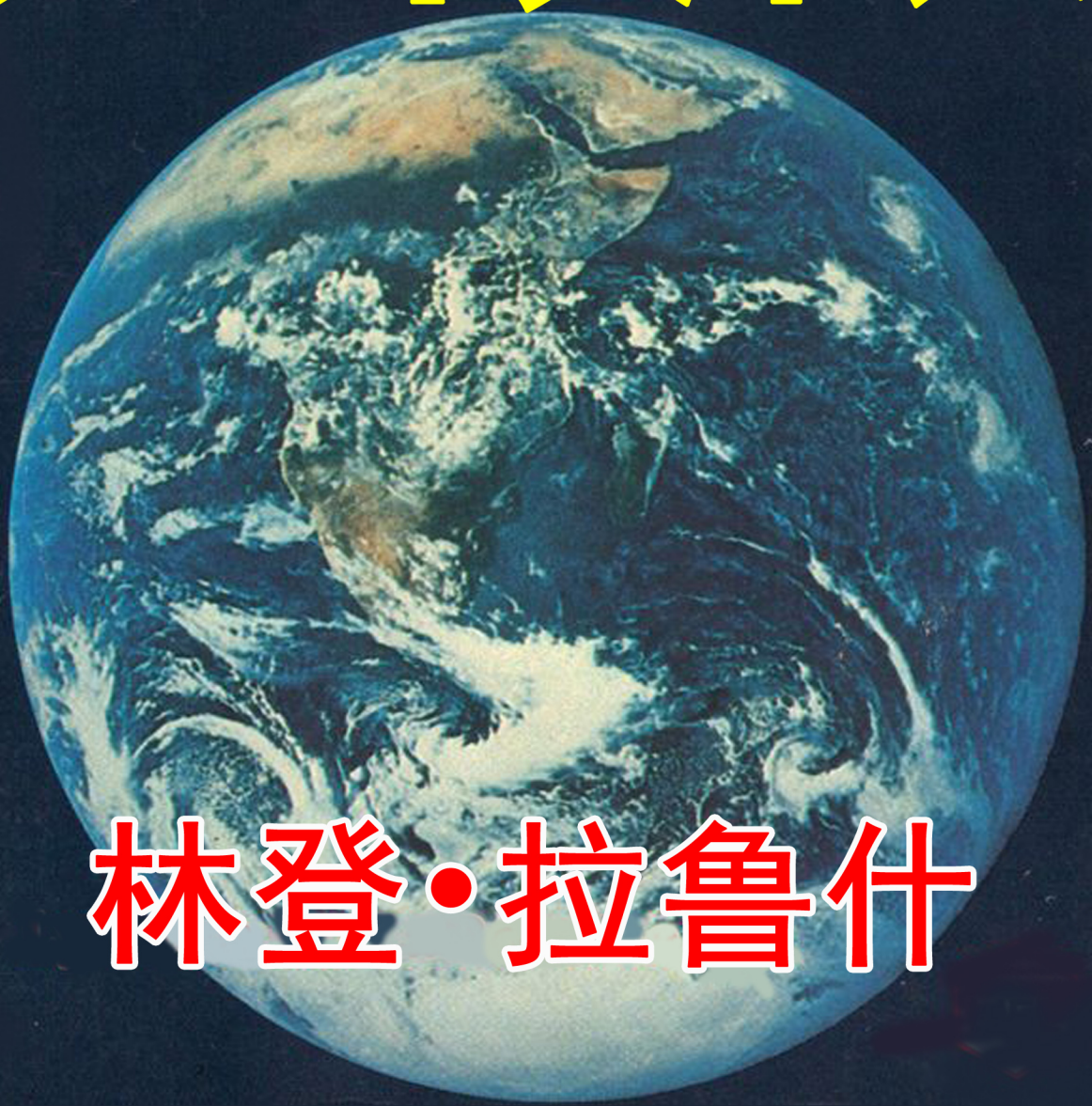
成长无极限



林登·拉鲁什

成长无极限

林登・拉鲁什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8 EIR News Service Inc

目录

引言

1
大自然杀死德国森林……1

2
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背后灵……11

3
罗素的世界帝国……32

4
火星上的森林和城市……53

5
人口法则……74

6
例如，英国选择担任积极的角色……94

关于林登·拉鲁什……110

引言

拉鲁什1983年出版的“成长无极限”一书已出中文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发起“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BRI），为未来创造一个新而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新典范成为可能。

习近平主席为未来 “人类共同命运” 的宏伟设计，设想全球经济、科学和文化复兴，结束地缘政治和世界大战的危险，以国家间的合作为中心，共同发展 “双赢”原则。这种对未来的展望反映了西方过去伟大的文艺复兴思想，以及美国建国时期的文件、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崇高意图，创造了人类的未来。

为了要帮助读者理解西方的“腐败”， “成长无极限”决定完成35年后出中文版。

拉鲁什在书中驳斥了人类经济和人口增长有限的观点，这种观点反对不发达的前殖民国家发展，也拒绝了 BRI。西方现有的范式有时称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却是大英帝国马尔萨斯、亚当·斯密和东印度公司的本质，在过去50年间逐渐衍生成为思想霸权，而“回归自然”、 “后工业社会”、“环保主义”和“绿色”这样的句子已经成为常态。

1972年罗马俱乐部赞助“成长的极限（福瑞斯特＆梅多斯合着）”一书，用于发起公共关系运动，使罗马俱乐部一跃成为影响政策的重要机构。该书危言耸听，声称地球资源有限，只能维持1-2亿人口，当时人口已经远超过这个数字，成为反人类的“零成长”环保主义运动宝典。

林登·拉鲁什（Lyndon LaRouche）是唯一挑战和反驳所谓经济学家“零成长”概念的人士。拉鲁什称他们的观点为“灭绝人类的蓝图”，或者“零成长：政治经济学的法西斯主义”。

拉鲁什在“成长无极限”（及其他著作）中，创造了实体经济学(Physical Economy)理论，截然不同于投机的金融系统，一种纯然的货币价值和“市场”决定产量的标准。实体经济的前提是人类具有发展新科技的独特能力，从而创造新资源，发现符合自然法则的新原理- 这是任何动物都做不到的。拉鲁旭表明，人类的创造力就是经济价值。因此，真正的经济成长是没有极限的。

陸淋漓
《全球策略信息》编辑
2017年11月

1. 大自然杀死德国森林

1982年3月28日至4月4日，墨西哥尤加敦半岛的埃尔奇琼火山轰隆作响，大气蒸腾后爆炸，估计喷发了3至4立方公里的火山灰柱进入地球大气层。这种大规模污染大自然的状况，一年约占全球总量的15%，估计有1500万吨硫磺及其化合物。

世事的演化，如潮起潮落。埃尔奇琼火山喷向地球上层大气的污染物逐渐下沉时，有时会污染雨水。在德国，人们大声疾呼："森林快死了！ 我们必须拯救森林！"

相对于鬼神信仰，许多德国人坚信工业应对森林死亡负责。无论真假，对狂热分子而言，工业就是罪魁祸首。至于埃尔奇琼火山造成的污染呢？今日所谓的"生态学家"，对于事实证明大自然本身就是祸首这件事，他们一点也不在意。

这些德国异教徒还忽视德国工会成员大量失业的事实。即使是森林，也要像婴儿一样必须喂食，否则就会死亡。森林每年的最低降雨量至少要90厘米；德国一部分垂死的森林并不是因为降雨不足，森林不止要喝水，也需要养分。

几十年来，人们在森林中砍伐树木，再拖到锯木厂或造纸厂。每一棵树被拖走的地方，树木已经从土壤中撷取了一些必需的化学成分，没有这些化学成分，新的树木无法正常生长，甚至无法成长。情形就和农民希望农作物健康成长一样，他必须对土地施以化学肥料和必需的微量元素。

假设过了好几十年，树木被砍的地方都没有施肥，森林最后就会饿死。此外，就像营养不良的人或其他生物一样，营养不良的树木比营养充足的的树木更容易受到疾病和毒药的侵害。德国森林不是受害于投入太多，反而是太少的工业化学产品，也就是土壤中的化学营养不足以维持树木健康的成长。

巴西雨林大片砍伐是最近破坏森林的典型案例。部分砍伐措施是为劳力密集型农业地区清理土地。一些树木砍伐后做成制钢的木炭。两种情形，巴西都是因为外部压力，被迫大量砍伐。劳力密集农业是根据世界银行和勃兰特委员会(Brandt Commission)所谓的"适当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ies)"理念，认为北回归线以南的国家只适用"适当"的劳力密集农业，小型、原始的地方产业，不适用现代农业、现代工业。 使用木炭制造钢材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的欧洲；他们建议巴西省下自国外进口石油和煤炭，也不需投资发展自身的核子和石化燃料潜力的方法。

这种"适当科技"做法的结果就是一场灾难，可能是全球性的生态灾难。

暴雨年复一年地冲刷雨林土壤中的化学物质，造成森林中所有植物生长必需的化学物质几乎都留在树上。柬埔寨吴哥窟古文明的崩溃，就是无视这个事实的典型案例。如果为了建立原始的劳力密集农业，使用刀耕火种的"适当科技"

清除雨林地区，并将树木砍伐殆尽，土壤很快就会变成(铝)红色的岩石状物质，一种劣质的铝矿石。农业经过几年的“适当科技”摧残之后就崩溃了，巴西事实上就是重演这种情况。

大雨林的另一种生态功能，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掌控全球气候。透过树木进入大气层的水气，形成上升的温暖水柱直达平流层，是维持一个大型、永久高压区，使空气往外扩散，上面的空气往下沉的重要部分。大量破坏雨林，会改变全球气候，巴西雨林的砍伐已经证实这一点。

这种影响并不限于雨林。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推动下，非洲萨赫勒地区(Sahel region)的一些国家加强对部分游牧居民征税。人们为了付税，不得不增加放牧。过度放牧摧毁了半干旱的萨赫勒和沙漠之间的屏障；由于这种情况，水气不再流入大气层，导致北非的气候模式转变，与亚马逊高地的气候变化产生交互影响。萨赫勒半干旱地区变成了荒芜的沙漠，要逆转萨赫勒地区的荒漠化，可以引入水资源管理的工业化模式和相关科技。

印度家庭因为缺乏工业燃料，迫使农村人口将包括喜马拉雅山麓在内的大片树林和灌木丛剥得一片光秃。 森林不仅可以保护集水区，更对稳定溪流、河流以及地下水位都至关重要。同一地区，森林消耗的阳光百分比相对较大，并可转化阳光为适合作为燃料的生物质能，调节邻近地区的气温。印度的水资源问题逐渐恶化，过去印度大陆的热节曾经很舒适，却因为平均气温上升，如今已经炎热难当。

其实并不是工业成长破坏全球森林。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缺乏工业产出，缺乏对生态圈良好的工业管理。过去十五年，破坏全球“生态”最大的原因，就是容忍所谓的“生态学家”，也就是下列单位定义的“新马尔萨斯人”提出的政策。这些单位包括罗马俱乐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全球野生动物基金会、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 、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塞拉俱乐部(U.S. Sierra Club)等等。我们在自己生存的地球生物圈的农业中，没有投入足够的水资源管理、化学品等工业产出的能源。同时，我们使用生物质能燃料和其他“传统”方式，有些时候我们应该使用核能供应的能源，采用现代工业生产的材料，代替住户用的木材。

与此相反，大约在1920年代，德国已经有人规划探索和殖民太空。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期间，精心设计的月球和火星人类殖民计划已经展开。随着受控热核聚变的开发和使用，火星和地球附近停放的大型轨道空间站之间的频繁旅行将变得切实可行。使用定向光束科技（包括大功率激光）结合热核聚变能源，我们将拥有在“月球”或“火星”上建立和维护“人造地球”环境所需的基础科技；可能以月球(地球的天然轨道卫星空间站)，作为附近空间的后勤基地，从中开展更进一步的探索临近星空和深空。

人类可能在火星上建造森林吗？如果我们想要恢复科技进步的速度，我们可能会想起1967年前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进行研究和开发的努力，我们也能够在二十一世纪做到这一点。利用热核聚变科技，我们能以最佳成本和

数量的“塑料气泡”，开发必要的人造地球环境，提供廉价生产的丰富能源。采用大功率激光和相干粒子束(coherent particle-beams)的定向光束科技，以及相对论物理学科技相关的类别，则每人平均生产力将会飙升到地球今日的十到一百倍之间。在生物科技进步的帮助下，我们能够将树木和其他植物精心培育成适合人造、类似地球环境条件的物种。

如果这可能在不到一个世纪就达成，为什么我们无法解决，今日地球上改善生态环境这种挑战性较低的问题呢？透过非常高能通率密度(energy-flux density)的热核聚变、定向光束和相关科技以及生物科技的组合，我们可以生产今日太空中不存在的空气、水等，并且提供植物生命所需的物质，以应付其特殊问题；我们甚至可能开发一种新的改进版的叶绿素，扩充植物生命的能量收集能力至二、三倍。今日，这些科技有的我们已拥有，有的即将掌握。那么现有科技已经证明有能力解决问题，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容忍地球的现况？

造成这种悲惨的状况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一些掌控全球各地大部分的期刊、大学、金融机构和政党有力人士，根本不想解决这些问题。

以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为例。 他当时正要离开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西方申请庇护，因而以自由和人类福祉的伟大斗士享誉国际。现在，我们很多人怀疑东德政府很高兴看到其竞争对手西德，接纳巴罗先生的忠告。1983年3月中，巴罗先生向观众介绍他手中一些大概是粮食的种子，宣称这些种子代表了今日开始折磨人类的罪恶。

巴罗先生也很含蓄地，提出地球上人类生活的经济史和史前史一些非常基本的事实。

“狩猎采集社会”是人类最低等的生存形式，如果接受巴罗先生的建议，人类就会回到那种社会；届时，每人平均需要10-15平方公里的居住范围，以维持一定的人均生存水平。也就是说，地球总人口将会不到一千万；以目前居住在地球上大约四十五亿人口，我们不禁要求巴罗先生，请他依名称列出杀人的名单，以便将人口水平降到十到一万二千年前“农业革命”之前的人口水平？

这种前农业革命形式是人口稀少的社会，普遍的平均余命也明显低于二十岁，每个地方部落的整体生活都十分危险。虽然巴罗先生不曾表示抵制农业革命增产的粮食和纤维，但是他似乎还是以诚恳的态度提出，南非曾经有一个文化充满活力、逐海洋资源而居的游牧渔民（strandlooper）已经灭绝，这真是个天大的错误。游牧渔民将大量的石头掷向海洋生物，垂死的鱼以及诸如此类的海洋生物，随着海浪冲上沙滩。

诚然，巴罗先生的观点只有很少数的组织赞成，但是数量不断增长，不过幸好目前仍属冷门。而且，他的观点只是一般新马尔萨斯教条主义的极端版本。但是，所谓的“环保主义者”或“生态学家”在大多数主要政党以及新纳粹主义和“左派”的各种“反科技”教派都日益增多。 此外，大部分主要的新闻、娱乐媒体、法庭、立法机关，以及强大而多金的基金会，或多或少含有新马尔萨斯

政策和支持罗马俱乐部的宣传活动。

近年来，众所周知，拥有广大群众基础、曾经备受忽视的“生态学家”，最近很活耀。他们的第一次运动是1969年年底由高层人士整合1950年代的禁止炸弹运动，及1965至1969年反越战运动和大西洋两岸新左派的残余。1970年春季的“太阳日”活动是第一件由政府机构和私人基金会组织的“生态学家事业”的示威活动。（以欺诈藉口）禁止使用杀虫剂滴滴涕和稍后出现的反核能源运动。这种意识形态的传播只不过才十几年。

直到1972年，现在的新马尔萨斯组织因为出版“成长的极限”这本书，才真正进入“重新编制的左派”行列。这本由罗马俱乐部赞助的书，主要用于发起公共关系活动，使罗马俱乐部几乎成为影响即将到来的重大政策机构。

成长的极限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Meadows）和杰·福瑞斯特（Jay Forrester）两位教授指导下进行的计算机辅助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本身最显著的是两项重要的欺骗性看法。首先，为了试图证明工业社会即将用罄剩余的自然资源，梅多斯和弗雷斯特大大地低估了这些已知数量的资源。第二，更重要的是，梅多斯和弗雷斯特通过使用联立线性方程组预测自然资源的消耗率。运用这种线性方程组，将计算机“模型”构建在计算机预测中，假设社会科技绝对不会进步。事实上，包括从根本定义“自然资源”的科技进步，已经是欧洲文明五百年来的突出特点。成长的极限假设这种科技进步会突然的完全停止。

人们怎么可能相信这种废话？每个合格的科学家都知道，罗马俱乐部使用的种种论据都是骗人的。大多数的工程师都知道。工业公司也知道。如果新闻媒体与科学家一起检查，他们也会知道。如果政府和政党负责任地行事，那么他们同样会谴责罗马俱乐部及其成长的极限是一场骗局。

以现在的消耗量我们知道煤炭大约还可以供应200年， 如果煤炭用完了，为什么不使用更丰富的核能，为什么不加速开发几乎无限的热核聚变资源？石油也还没用完；发现大量的新油田速度比我们用尽的旧油田更快。但是，如果担心二氧化碳增长和其他化石燃料造成污染，为什么不加快速度改用核能和热核生成的加工用热能？

“辐射性”？都是废话！核能厂将辐射性废物排放到环境中，比燃煤场生产相同度数电量的废物更少。核能厂放射入环境的辐射量比红砖墙还少。一个靠在核能厂的人接收到的辐射，低于搭喷气式飞机横越大西洋旅行时的辐射，或在美国洛矶山脉或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周末滑雪之旅。如果人们在意这种辐射量，他们应该坚持在同一张床上不应该有两个以上（自然是辐射性较差的）人体。

“核电厂事故”？ 首先宾州的“三里岛”事故所涉及的情况只能藉由破坏而发生。其次，“三里岛事故”完全证明了今日核能电厂的安全防范措施很完美。事故中和事后每一次调查，都证明“新闻媒体”发表的“中国症候群”[“China Syndrome”- 假想美国核子反应炉炉心熔毁,下沉穿过地心到达地球另一边的中国的电影] 故事和其他“格林童话”故事都是故意捏造的骗局、谎言。

为了造成核能事故，一个人不是得将核子弹头的炸弹直接投放在工厂上，就是携带和放置所能想像的组合最复杂的装置。任何情况下，在 (受核污染的)工厂上建造钢筋混凝土的主体，将成为全球目前为止最具防爆能力的结构。例如，如果我们使用钍增殖循环(thorium cycle)的核子燃料，在极不可能发生的核子事故中也使其可能性几乎为零。

所有这一切都众所周知，即使是受过科学训练的骗子以”当局”自居的反核宣传人士亦然。

热核聚变使得核子事故完全没有可能发生。热核反应的组成，用于氢弹的部分，是锂-氘(重氢，氢的同位素)、氘-氚(超重氢，氢的另一个同位素)，或者是氘-氘组合。后两种组合产生所谓的“清洁爆炸”，没有主要的辐射脱落。造成热核燃烧，温度需高达5 × 107和5 × 108绝对温度之间；即使如此，如果材料没有精确发挥流体动力学自聚焦的物理原理，也无法点燃，从而发生等熵(isentropic)压缩效应。一旦发生事故或直接被10兆吨炸弹击中而中断，则意味工厂的热核反应突然停止。

热核聚变远优于核能，但是开发热核聚变导向经济所需能量，需要大规模供应核能。探讨此点需要提供一些数字，以为佐证。

今日，热力学统计理论中，我们以能通率密度为单位测量热制程的水平，并以发热过程的横截面测量所需度数。以下是1979年编制的两个表格，比较不同能源的能源通量密度，以及比较使用这些能源生产的电力所需成本。

表一 能通率密度

能源	度/平方米之密度
生物质太阳能	0.0001
地球表面太陽能	0.2
近太陽軌道（5百萬英里）太陽能	1.4
化石燃料	10,000.00
太阳表面的太阳能	20,000.00
核分裂	70,000.00
核融合（第一种商业类型）	70,000.00
核融合（下个世纪）	10^{15}+

表二 输出电力比较 (美金)

	(英里/度) 能量總成本	(英里/度) 能量總售價	資本投資 ($10億)
油	25.1	45.7	$ 0.94
煤炭	24.2	31.7	0.97
煤气	41.7	55.37	1.67
轻水核	27.8	28.5	1.16
快中子增殖堆	33.7	33.9	1.43
融合（早期型）	45.2	45.2	1.92
太阳能收集器	490.0	490.0	20.90
太阳能电池	680.0	680.0	28.9

(资料来源: 核融合基金会)

选择能源最简单的物理原理，就是能通率密度水平越高，能源效率就越高。不仅浪费较少的热量，能通率密度越高，完成工作的加工用热潜能就越大。

要了解期间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考虑维护森林问题在内的议题。这个数据的术语，外行人第一次看到可能会头大，但是我们会以容易理解的方式呈现，称为潜在相对人口密度。我们会解释这个数字的意义，然后说明与维护森林业的关系。

以居住在某个特定地区的人口为例，当地以平方公里为衡量单位。当地人口通过发展和利用当地可用自然资源的劳动力工作产出，平均每平方公里足以维持的人口数，也就是人口密度。

因为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尽相同，所以每平方公里的居住人口会因地区而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是因为理想的地力不同。人会提升也会耗尽地力。土地肥沃的程度是综合耗尽和提升地力的最终结果。所以，我们会说并不是所有的平方公里价值一样，其实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必须以居住地的相对质量来衡量人口密度：相对人口密度。

目前的人口水平未必足以衡量真实的人口水平，我们必须确定目前使用的各种生产科技最多可以喂养的人口数。这些科技可以喂养的潜在人口数，就是潜在相对人口密度的一般含义。

我们曾经指出，原始社会的潜在相对人口密度约为0.06～0.10 /平方公里：最大人口数约为1,000万人。今日有大约4.5亿人，是原始社会人口的100倍以上。由于“10”的倍数是一个数量级，因此人类已将其潜在相对人口密度提高了两个数量级。结合现在的热核、定向光束和生物科技，充分利用现有科技水平，地球可以维持数百亿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平，高于美国1970年代初期：也是原始社会向上

提升了三个数量级！

不会有任何野兽或其他较低等的生命形式，会故意增加一个数量级的潜在相对人口密度。人类与野兽根本就不一样。人类不只是如动物般感受快乐和痛苦的本能，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与动物非常不同。人类有潜在的理性，有创造性发现的能力，可以提升科学知识，并将这些科学进步转化为科技进步。随着科技日趋纯熟，我们能够挖掘世人足以遵循合于法律许可的普世法则，展开普世的创造，并且透过自我引导，改变行为模式，逐渐有能力遵循宇宙的规律掌握自然。

自从巴鲁先生提出的乌托邦水平以来，人类文化积累的连续科技进步，使得人类潜在相对人口密度已经增加了两到三个数量级。

提升人类潜能的科技进步，已经藉由越来越多的能源管理实现。从农业革命和早期的出海捕鱼开始，每人平均可用能源已经增加，社会每平方英尺的电力的使用量也增加了。今日，我们可以从农民每公顷使用“人造能源”的量，粗略估出农地生产力：化肥、微量元素添加剂、农药，以及用于灌溉、动力机械等其他工业生产的能源形式。同样，工业和交通运输方面，每人平均劳动生产力(average labor productivity)也是首次以人均工业生产能源的总量估计。

这种科技进步是可行的选择。“成长的极限”作者也许无意于这么做，但是这一点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科技不再进步，那么这个愚蠢的社会就会谴责自己至死。

任何生产科技水平都需要一定产量的农业、造纸、林业、采矿等原物料产出。这就是我们在地球制造的主要生产原料和其他的消费材料。无论是哪一种科技水平和人类的消费水平，每一种原材料都接近人均需求量。

因此，扣除原材料产量占社会整体劳动力一定百分位数后，剩下的劳动力就可以用于其他形式的劳动。一旦某些自然界最丰富、最易取得的原材料产出用尽，社会劳动力必须用于维持原材料上涨但是人均金额不变；因此，成本上涨降低了平均劳动生产力。一般而言，平均劳动力的产出只够维持较少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潜在相对人口密度下降了。如果科技产出不变，重要的自然资源枯竭造成的成本上涨会一直延续下去。因此，潜在相对人口密度就会一直下降。

此时，社会的潜在相对人口密度低于现有人口密度，天启四骑士的瘟疫、屠杀、饥荒、死亡就会到来。饥饿加速绝望产生的冲突；战争和血腥的民众暴动恶化了饥荒。情况就和十四世纪初的欧洲一样，饥荒人口成为疾病的滋生者，逐渐衍生成为流行性传染病和蔓延于广大地区的瘟疫。农业和卫生机构的崩溃加速了瘟疫的爆发。社会被(外力)击败、崩毁或突然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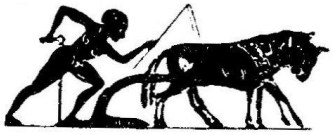
科技进步以两种相关的方式阻止了上述灾难。首先，只要提高劳动生产力，科技进步就能制止原材料生产成本上涨。第二，科技革命扩大定义可用的自然资源范畴，并依法令要求引入新的原材料，情形就如同工业革命时，煤炭克服了森林枯竭导致欧洲瓦解的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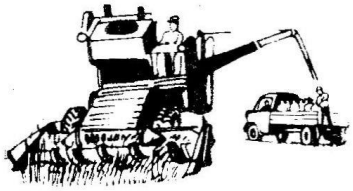
地球人口发展

(联合国统计年鉴，单位：百万)

	1650	**1750**	**18/00**	**1850**	**1900**	**1920**	**1940**	**1950**	**1960**	**1980**	**2000**
欧洲与苏联	103	144	193	274	423	487	575	573	639	791	973
亚洲(不含苏联)	257	437	595	656	857	966	1244	1381	1651	2557	4401
北美	1	1	6	26	81	117	144	166	199	272	388
中南美	7	10	23	23	63	91	130	163	212	387	756
非洲	100	100	100	100	141	141	191	222	273	458	860
大洋洲与澳洲	2	2	2	2	6	9	9	13	16	22	32
地球	**470**	**694**	**919**	**1091**	**1571**	**1811**	**2295**	**2517**	**2990**	**4487**	**7410**

狩猎采集经济是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理想条件下每平方公里最多可以养活一个人，所以地球上大约不到 1,000 万人能存活。社会过渡到畜牧和游牧经济，人口密度增加到每平方公里大约 8 人；原始形式的农业经济则提高每平方公里的水平到 20 人左右。





工业社会带来快速进步。现代能源密集型农业经济的人口密度增加到每平方公里 100 人左右。 因此，地球的相对潜在人口密度增加到约 100 亿人口。

为了保持潜在相对人口密度的水平，科技进步也不可或缺。因此，社会必须不断增加每平方公里和人均能源供应才能生存。这些不断增长的能源供应必须相对便宜；生产人均能源增加的平均成本往往要比生产人均能源的原有成本要小得多。一般情况下，能源供应的能通率密度(energy-flux density)也会增加。即使在恒量的潜在相对人口密度的条件下，“自然资源”也必然会过一段时间就有革命性的新定义。

关于农林问题，今日存在着广泛但虚假的观点，认为农业土地的生产力本质上是以自然的土地生产力为主。这项论述多多少少是法国十八世纪激进封建主义派，即所谓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ic)”，提出。美国的农业史始于十七世纪，可能是证明重农学派荒谬见解的最佳例证。值得注意的是，加州帝王谷(Imperial Valley) 几十年前仍是一片沙漠，今日已是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农地。这不是通例，某种程度上是例外。美国几乎整个农业和早期的定居点都很贫瘠且荒无人烟，必须透过人为提升地力，和改善投资和工业资本很类似。欧洲的农业占用土地的时间较长，对于所有从事农业的人来说，同样的示范立刻就明白了，但是美国农业历史相对简短，同样示范的时间较短。

最罕见的例外是人为制造，而非自然发生，同样原则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德国森林。那不是森林，而是树木农场，这应该足以立即向造访这些令人愉快的公园（称为森林）同时拥有第一手强行通过原始丛林或温带森林回忆的游客澄清。然而，不要因为它们不“自然”就鄙视这些德国“人造”森林，如同不要鄙视我们桌上或土里尚未被毒化的热带瓜果，不像它们的祖先一样“自然”。这些“人造森林”在许多方面比那些自然而生的森林都好；如果没有比较好，是因为树农无法履行农民的责任。因此，发展良好的森林必须像农民的田地一样除草，就能产生更健康的“自然”而生的森林。

像农业一样栽培的森林，也是一个生物系统。除了死亡之外，所有生物系统的特征都有负熵(negentropy)的属性。在其成长周期中，产生比以前更大的能量，这个系统相当于每单位质量重的能通率密度。他们成长质量的增长潜力，和抵抗各种伤害的能力随着环境提供的营养而不同。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相对丰富的能量，以它们能吸收的形式组织起来。

实验人员在英国威尔士用亚麻树完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例证。实验反覆证明，提供亚麻幼苗适当的温度和营养环境，这些植物就会变异。尽管不是遗传上的变异，但是这一变异证明是会遗传的。即使在正常条件下复制其后代，没有特殊的温度和营养条件用于产生原来的变异，这种遗传仍然存在于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植物中。

如果植物没有发生环境导向的遗传变异，培养优良的植物品种通常需要改良环境，特别是营养。改良措施包括水资源管理和土壤改良，有时候在移栽前为幼苗准备“温室”。无论是森林还是农场，前述一切都需要工业生产的“人造能源”，并转化为每公顷的森林或农场都能增加供应这种“人造能源”。因此，传统上，德国农田和森林的最佳伙伴之一就是巴斯夫 (BASF) 化工厂。

在火星上，森林开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覆盖人造气泡并创造地球环境。这是迫使我们思考如何维护和改善地球环境问题的适当观点。迫使我们自己解决在火星上种植森林有关的问题，衍生的好处就是迫使我们开发科技，也有助于维护地球的森林。

无论是火星或地球，我们都需要科技进步的好处。我们不仅需要新科技处理生物圈的问题，也需要其中涉及的能源供应。这些工作帮助我们提高社会生产力，降低的社会成本也不可或缺。

这在一般原则中，一点也不新。这些原则欧洲好几世纪前就已经知道了。我们必须问问“为什么颇富声望、财富、影响力的名人和机构，会得出与罗马俱乐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一样危险荒谬的教义？

2. 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背后灵

我们在前一章中提到，罗马俱乐部所谓的“科学作品”，“增长的极限”是个骗局。 书中采用的数据来源在关键类别中非常不准确。计算机演算时，假设所有科技，在三十多年间，突然或渐渐不再进步。本书作者及其许多支持者都知道，“增长的极限”这本书是骗人的。然而，罗马俱乐部和其他大多数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在1970年代或多或少严格的按照该书欺诈的结论进行宣传。

他们传播连自己都不相信的马尔萨斯主义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呢？

十多年前，本书作者及同事对国际“新马尔萨斯”运动和计画背后的重要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渐渐了解罗马俱乐部和联盟组织的代表及领导人，并听取这些人亲自说明他们创造新马尔萨斯骗局的真正动机。

住在巴黎的英国国民，亚历山大金（Alexander King）博士，曾经担任北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董事，也是成立罗马俱乐部的幕后推手。金博士在一次纸媒采访中主动表示，他赞助新马尔萨斯宣传的真正动机是种族主义。他坚称，盎格鲁撒克逊族系在地球上越来越少，因此，新马尔萨斯的宣传和活动必须着重于减少深肤色“种族”的人口。金博士口中的“深肤色种族”，包括一些热情的“地中海种族”，一般认为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

来自南非的英国知名猿猴学专家索利?祖克曼 (Solly Zuckerman)勋爵坚称，他在创立罗马俱乐部的地位比金博士更重要，目前担任英俄马尔萨斯协会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主席，IIASA 是与美国支持的麦吉尔邦迪(McGeorge Bundy）共同成立的组织。哈佛大学著名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描述此“邦迪”是“美国建制派(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领导人”。人们合理地描述祖克曼勋爵的观点为危险的野性，影响力也最大。

领导美国支持的新马尔萨斯计画中，就有与纽约狄龙里德投资公司(New York investment house of Dillon, Read)有关的威廉德雷珀(William Draper)将军的案例。这位德雷珀参加了1932年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受托人会议的音乐会。他们在这次会议上，齐声赞扬德国即将上台的希特勒，德雷珀特别带头赞扬纳粹的“种族优生”学。他的德雷珀基金会支持人口危机委员会，明确致力推动减少非洲和其他地方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族主义狂热分子视为“次等种族”的人口。

德雷珀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相关圈子的作为并非例外。该机构成立于1869年，旨在推动达尔文和赫胥黎的学说，这些人十分了解必须经过数百年的奋斗和介入，才能减少非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世系”的人口。本世纪，著名的摩根和哈里曼家族在其中的表现最为突出；哈里曼家族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是美国遗传学名义上纳粹式种族主义教义的主要推动者。毫不意外的，就是这些家族对种族主义教义表示特别欢迎，并主导将德国银行家雅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的党羽阿道夫¨希特勒推上德国舞台。也是这些家族，特别是哈里曼家族，在1920年代推动美国移民法，定出一年一度的配额，旨在阻止“地中海深肤种族”大量移民进入美国。

1930年代后期，美国国内有人疾呼，取消受希特勒暴行威胁的犹太移民配额。哈里曼家族立即动员阻止这种特殊安排。一批逃离希特勒的犹太人，被美国拒绝而原路折返，许多人都被哈里曼家族的种族主义拒绝，重新折返面对他们的厄运。如果美国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那么希特勒的种族迫害，可能就有三百多万人得救，如今却只有相当少数人逃脱。艾维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美国亿万富豪)在内的哈里曼家族，都热心支持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从1920年代末到1938年，许多摩根圈子里的人都一直支持希特勒。直至1938年之后，英国的丘吉尔和其他人发现并警告说，英美瑞士制造的德国希特勒已经失控了。

近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圈子，对于美国强推新马尔萨斯政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力。

我们该把这些邪恶成员的供词放进报告里，而不是在这个问题上相信他们说的鬼话。而浪费时间检视造成当前新马尔萨斯狂潮的典型名人，还不如将注意力转移到他们现在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我们将提出并回答，这个社会阶层，有何独特且具与众不同的哲学，促使他们宣传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科学教义？

我们且从“托马斯马尔萨斯教授”开始。是哪些人和什么原因促使他在1798年完成“人口论”？马尔萨斯背后的富裕家族当时都在同一阶层，今日也在背后推动新马尔萨斯运动。

1751年，美国独立领导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完成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是”关于人口增加的观察”。他认为，美国在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北方人口必须快速增加。富兰克林的朋友和崇拜者詹巴迪斯塔贝加利亚(Gianbattista Beccaria)将这本小册子翻译成意大利文，并在意大利出版。威尼斯靠收租为生的资本家家族重要发言人嘉玛利亚?欧特斯(Gianmaria Ortes)，对这本小册子的意大利版大加驳斥。

欧特斯对富兰克林的攻击延烧到英国。几天后，雄心勃勃的牛津大学神学院年轻毕业生马尔萨斯，将欧特斯的论点窃为己用并出版“人口论”。当时，马尔萨斯在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辖下工作。1798年皮特赞助出版第一部马尔萨斯的著作，并对英国议会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可以作为1800年改革英国济贫法的借口，不用再向“无用的吃货”提供财政援助。

这就是“马尔萨斯主义”的起源。

为了纪念马尔萨斯的成就，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英国设立了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职位，任命马尔萨斯为这个职位的首席执行官，在公司所属的海利伯里学院（Haileybury College）接受培训。除了马克思博士的特殊情况外，所有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 - 亚当斯密和杰里米边沁，透过约翰斯图亚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都和马尔萨斯一样，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多数人像边沁、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都隶属于哈利伯里，也接受其指挥。

我们将提出说明，要厘清英国政治经济学、马尔萨斯主义、非洲奴隶贸易与中国鸦片贸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必须了解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马尔萨斯主义，在英语系国家一发不可收拾的发展。要了解马尔萨斯主义对欧洲大陆的影响，人们还必须知道威尼斯人嘉玛利亚?欧特斯的支持者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密切关系。

英国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比较先进的研究，伊拉斯谟派就曾影响英国都铎王朝推动，到托马斯格雷沙姆（Thomas Gresham, 1519 ─1579）期间，以当时欧洲的标准来说，仍然十分活跃。1603年苏格兰詹姆斯六世加冕成为英国国王起，英国人就不再推崇这个学派了。在英国政治经济首次以正式的理论出台之前，现代经济学教学已经超越法国、意大利、德国和俄罗斯知名机构的习惯做法五十多年。

整个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大陆都在“(重商主义的)官房学派”提示之下，教授现代政治经济学。这种建立在十五世纪先锋经济学家杰米斯图斯¨普莱桑（George Gemisthos (Plethon)）和达芬奇之上的官房学派，是英国都铎王朝的重点工作。法国政治学家让博丁(Jean Bodin)及其”国家六论(*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影响了法国政治菁英和英国共和党（联邦）派系制定政治经济政策的方向。十七世纪，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那不勒斯学派，影响力最大。十七世纪法国政治经济决策在这种潮流之中，出现了黎塞留(Richelieu)、马萨林(Mazarin)和著名的马萨林继任者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1671年莱布尼兹介绍自己的”社会与经济”大作，并正式推广现代经济科学。

18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采纳了莱布尼茨的建议，使得俄罗斯经济成功发展，其中矿产和工业超越英国的规模和质量。德国在十八世纪以“物理经济”传授莱布尼兹的经济学，成为官房学派的一部分，后来成就了史坦因和洪堡兄弟。法国和意大利则引进俄罗斯莱布尼茨彼得格勒学院的教学修会及其生活常规。富兰克林博士则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前，引入美国。虽然汉诺威议会提议邀请莱布尼兹担任英国首相，但是莱布尼茨的经济科学从未抵达该国的海岸。

英国制定政治经济学学说始自1763年，经过长时间的运行，臭名昭著的第二代谢尔本伯爵下令亚当斯密进行破坏北美英国殖民地经济的计划。当时，亚当斯密是前爱丁堡大学道德学教授，隶属于大卫休谟(David Hume)领导的英国秘密情报局（SIS）。休谟在反对法国的行动中，是谢尔本伯爵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下属。谢尔本伯爵的祖父威廉佩蒂爵士(Sir William Petty)创立伦敦皇家学会，是 SIS 苏格兰分社最高级别的家族。谢尔本伯爵也和他祖父一样，具有耶稣会教士之美名和背景，类似法国伏尔泰隶属于（克莱蒙学院）耶稣会、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Franois Quesnay），以及共济会巴黎总部瑞士九姐妹苏格兰仪式(Scottish Rite)的耶稣会。他是苏格兰-法国-瑞士耶稣会教士（有时名义上是新教徒）的怪异组织成员之一，这个组织在谢尔本伯爵、富兰克林和拉法叶的一生中，与奥尔良公爵有牵扯不清的怪异连结。

大卫休谟对所有的道德领域都很有影响力，这些理论主宰了亚当¨斯密、边沁、马尔萨斯、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凯恩斯等英国政治经济学深层的公理假设。亚当¨斯密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论》是他所有思想的基石，然而1776年他著名的反美短文《国富论》却完全是剽窃自法国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的”财富形成与分配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 他1759年书中的一段正是经典：

为世人谋取普世幸福，是上帝的事业而不是人的事业。(上帝) 分配给人类的部分更适合于权力的弱者，以及对自己理解很狭隘的人：照顾自己的幸福，自己家人的幸福，自己朋友的幸福，自己国家的幸福但是，我们虽然非常强烈的渴望达成这个目标，也已经以理性进行缓慢而不确定的决策，以便找出适当的方法达成这些目标。大自然已经以原始和直接的本能，指引我们更大的部分。饥饿、渴望、两性结合的热情、对快乐的热爱和痛苦的恐惧，促使我们为自己不择手段，也不考虑大自然有意产生的有利结局。

上一段引用的是苏格兰长老会和其他人的加尔文主义教条，是合理化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非洲奴隶贸易和中国鸦片贸易等的精髓。加尔文主义者认为，人类对其行为的后果不负道义责任。除了享乐主义的冲动之外，如果他对道德漠不关心，对许多人造成残酷而深刻的伤害，那么上帝就会因为提供加尔文主义者享乐主义的本能而受指责。

加尔文主义者对不道德做法的辩护是亚当¨斯密“无形之手”教义的本质。亚当¨斯密就曾和边沁、马尔萨斯、李嘉图、詹姆士穆勒等人，为1819年对印度人民的种族灭绝辩护；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效益主义」，和杰文斯、马歇尔和凯恩斯等人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基于大卫¨休谟彻底拒绝任何可知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无差别主义“激怒了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写下《纯粹理性批判》，批评英国的经验主义。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是英国政治经济史上比亚当¨斯密更重要，也是谢尔本伯爵最亲密的同谋和党羽。边沁的主张与亚当¨斯密1759年的原文相同，但是论点更野蛮，是更激进的休谟追随者。因此，亚当¨斯密1759年一书的内容将立即与边沁1780年的《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和1787年明确的政治经济学主题，《为高利贷辩护》，进行比较。另外，边沁激进主义的典型之处就在他的《为鸡奸辩护》，而他设计的洗脑监狱正适合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一书的环形监狱社会。

采纳威尼斯人嘉玛利亚?欧特斯的政策，正是英国马尔萨斯主义圈流行的道德哲学。在转向马尔萨斯的书出现之前，我们先向读者介绍威尼斯的特色。

1589年至1603年间，意大利威尼斯和热那亚的金融“黑色贵族”和毗邻国家，在英国境内主导了一场血腥斗争，诋毁和污蔑伊丽莎白一世指定的皇位继承人，埃塞克斯男孩(the boy Essex)，并确保继承热那亚的资产，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继

承皇位。十四世纪初期，热那亚以雇佣军、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曾领导苏格兰人打败英格兰军队，确保王国独立）和他自己的 圣殿骑（武）士团征服并掌控苏格兰。十五世纪，当英国、热那亚和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Charles the Bold)结盟对抗法王路易十一时，控制了苏格兰与欧洲大陆连结的瑞士法语区和法国相邻部分。

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年加冕后，授予他的外国金主垄断并包下英国公共债务和征收的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1589-1603年的政变中，曾经拥有热那亚（帕拉维奇尼 Pallavicini）资产的利益，被(詹姆斯一世)任命为财政大臣，直到公众舆论拒绝容忍培根无止尽的贪污。接着是英国十七世纪的内战以及伦敦金融中心和英国央行的基金会。

同时，热那亚和威尼斯的金融利益，从已被洗劫一空的葡萄牙基地，将黎凡特（Levant，指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公司大西洋分部搬到英国和荷兰。黎凡特公司搬迁后，结合1688-1689年的改革，产生了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这就是休谟和谢尔本所代表的利益：1782-178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透过谢尔本与乔治三世国王协商，巩固了对英国政府的控制权。

我们曾经指出，热那亚和威尼斯等外国利益接管英国，直接间接造成英国十七世纪的内战。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加速了英国共和党人迁移到北美殖民地，英联邦也因此衰落。这些1603-1689年间的发展加深了文化差异，而十八世纪，英国的道德哲学也与美国隔得越来越远。

从17世纪末跨到18世纪，英国由外国控制的执政利益十分集中，整合后都归入金融贵族的世袭领地。过去，苏格兰和英国组成的不列颠执政阶层在政策上很一致，一度国人几乎无法分辨。这项规则延续至今，对人民生活产生自上而下的影响，也转化英国国民对哲学的看法，乃至不列颠国民如同今日的国民一般，普遍都接受十九世纪休谟、亚当¨斯密、边沁等人的无德教义，甚至以此作为“常识”或“人性”的一部分。至1790年代之前，英格兰共和主义遗迹，只剩富兰克林的友人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博士(Dr. Joseph Priestley)和爱尔兰及苏格兰的共和主义为典型之外，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的哲学观点几乎不为不列颠人民记忆。

因此，北美的共和主义圈子，成为英语界共和主义哲学和文化的中心。根据美国1790年人口普查和当时其他相关证据，显示出两国这种哲学差异的影响。美国成年人的识字率高达九成以上，是英国的两倍多。此处的公民素质是以英国著名民主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定义的“接受和传播尊重人与自然深刻理念的能力。”以此为例，美国公民对经典的熟悉程度，使整个欧洲都赞誉其为“拉丁农民”。例如，重要的政治文学及传播美国宪法小册里的用词，再再都显示1790年代的美国成年人，远优于今日的美国人。美国公民这个时期的文化优势超越英国国民，也从美国人的生产和收入都是英国财富两倍的事实中得到映证。虽然许多美国的爱国者是苏格兰裔和德国裔，但是只要是英国裔，就是约翰米尔顿的追随者。在这方面来说，美国革命成功的复制十七世纪的英国内战。

这些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的状况，也是这两个世纪整个欧洲发展的总体模式。

因此，威尼斯、热那亚-瑞士和英国金融寡头之间的联系一览无遗。

1589-1603年发生在英国的热那亚政变，促使17世纪法国天主教君主出面领导欧洲的新教联盟。这个联盟是由红衣主教黎塞留及其后任依序接班，教皇自己任命黎塞留的接班人，红衣主教马萨琳和马萨琳的继任者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欧洲天主教会由威尼斯人产业，包括瑞士法语区新教徒以及威尼斯耶稣会教士的哈布斯堡王朝，和英国、荷兰的新教君主主导。当时法国收受贿赂，并不是所宣称向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良知效忠。因此，那段时期的用词往往是骇人的误导，也是自当时迄今历史上政治事务的普遍现象。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战争中，欧洲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我认知的冲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成员，很痛苦的在象征性严守罗马教宗规则更为根本的议题上分裂而互相对抗。天主教和、新柏拉图式人文主义的观点，代表性作品就是库萨枢机主教（Cardinal Nicholas Cusa）结合神学、自然法和科学方法的精义，提出极具影响力的论点。另外出现的相反观点是一种属人的宇宙观，也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政策-罗马帝国法，传统上与拜占庭、罗马、波斯、巴比伦帝国以及古代推罗（Tyre）的腓尼基城(Philistine city)相关。腓尼基城之传统可以追溯到迦勒底的吾珥(Ur)城。

第一个共和主义的观点建立的前提是，人类因拥有高尚品德的神圣潜能而异于动物。因此人类很神圣，而国家的功能则是保护并帮助每一位成员，使其有机会充分发展其创造力。反之，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和边沁等寡头观点，将人视为不同品种、只会享乐、会说话的野兽，他们的知识和自我利益只限于快乐和痛苦。前述引用亚当斯密的文章，陈述了这些寡头贬低人性的观点，边沁的作品”简介道德准则和立法原则”也简略地表达了这一点。

马尔萨斯出版“人口论”的同一时期，诗人、剧作家和历史学家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描述欧洲文明的基本政治分界，并以雅典的梭伦（Solon of Athens）共和国传统，区别斯巴达神话中的来古格士（Lycurgus）寡头传统。共和主义传统已融入哲学观点，其对西欧的影响可以回溯到圣奥古斯丁的著作、查理曼大帝的改革，以及库萨阐述的自然法原则，也大致上因此定义国家的宪法和国家之间的法律。反之，寡头方面则是斯巴达贵族阶级猖獗的鸡奸，年轻贵族一时兴起就杀了奴隶，以控制其人口。这项政策和做法恰恰是十六、七世纪威尼斯哈布斯堡家族为首的”天主教会”之作为。

德尔福（Delphi）的阿波罗邪教圣殿，正是斯巴达来古格士的哲学观点和“斯巴达模式”的邪恶创造者，现代马尔萨斯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也由此应运而生。里士多德的著作是最直接呈现德尔福哲学的观点，也是其重要的辩护者，尤其是他邪恶的着作《政治学》和《尼各马科伦理学》。马尔萨斯派系并太不邪恶，因为他们的理论基础都来自这两本著作。这大致上是休谟、亚当斯密、边沁和谢尔本伯爵圈子的观点，也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现在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道德哲学观。

回到美国的马尔萨斯主义支持者之前，有必要谈谈马尔萨斯立即上轨道的

事实：英国东印度公司如何在1782-1783之间掌控英国政府。

1782年前，对美国殖民地战争造成的负债，使英国政府陷入破产。谢尔本在此期间，多次企图控制政府。他在1783-1784年的努力成功了。他结合英国东印度公司银行家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与乔治三世谈判达成协议，安插谢尔本手中的玩偶，小威廉皮特，担任首席财政大臣。这只是第一步。根据现存的记录，1784年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代表谢尔本以20万英镑买进整个英国议会；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劳伦斯沙利文(Laurence Sullivan)安排了这笔交易的融资。所以，谢尔本的玩偶，小威廉皮特得以长期担任总理职务。

谢尔本在同一年，1784年，重组英国东印度公司，增加该公司的权力和财富，巩固其几乎等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地位。边沁成为谢尔本重要的肮脏伎俩专家，包括在适当的时候，将英国 SIS 代理人丹顿和瑞士的马拉特，从伦敦培训站送到法国，煽动雅各宾党恐怖事件。这就是建制派的马尔萨斯、李嘉图、詹姆斯米尔、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等，他们也吸收其他人成为官员。这就是马尔萨斯主义者。

他们都是耶稣会教士。与耶稣会教士的官方历史相反，指令其实是威尼斯的孔达里尼(Contarini)家族在威尼斯下的，不是在巴黎。依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在往巴勒斯坦朝圣途中，在威尼斯耽搁了一下，接受招募领导威尼斯创造的秘密情报服务，模仿德尔福古代邪教信仰逍遥学派(Peripatetics)建立的情报部门所有基本要件。耶稣会最初是接受圣约翰医院骑士团（Hospitaller Order of Saint John）的指令，称为马耳他骑士团(Order of Malta)，受威尼斯节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教皇在十八世纪压制耶稣会教士，迫使骑士团的总部迁到俄罗斯，（根据官方说法）直到1815年威尼斯人卡波迪斯特里亚(Capodistria)在维也纳国会指示，耶稣会重回西欧掌权，骑士团成为梅特涅亲王的秘密情报部门，并以此身分共谋参与英国 SIS 暗杀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进而规划暗杀其政府官员。

谢尔本伯爵的祖父威廉佩蒂爵士是在梅森的指导下，到卡昂(Caen)的耶稣会学院接受训练，耶稣会的代理人笛卡尔（Ren Descartes）已经受过此项训练。1660年，将查理二世带回英国的苏格兰船员，就是耶稣会代理人。谢尔本本人在法国接受耶稣会训练，因为在耶稣会的这个主题上极受欢迎，所以无缘英国的最高官方职位。更具体地说，谢尔本藉由他岳父约翰卡莱雷（John Cataret）与法国搭上线，是博灵布鲁克(Bolingbroke)圈的产物。后来，班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总结了这件事：

谢尔本伯爵采纳第一代博灵布鲁克系统；取代首席法官的真正皇室；与法国永久联盟，取代辉格党计画中视英国为天敌的诡计；最重要的是可以在乌得勒支(Utrecht)长期恶意的谈判中找到的商业自由计划，但是这项谈判在谢尔本伯爵一例中，很快就会使欧洲的所有经济科学成熟。

迪斯雷利的多此一举，正好坏事。谢尔本结盟的对象，包括法国的奥尔良公爵、反富兰克林的法国分部，以及法国圣约翰骑士团大修道院，都是当初推翻和斩首国王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引导雅各宾党上台掌握大权，实行恐怖统治的组织。法国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国家，但是财政部长

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从1786年开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后，法国在1789年破产了。这完全是（当时被官方压制的）耶稣会和日内瓦、洛桑的主要瑞士银行家族一起完成的。

和耶稣会一样被视为鸡筋弃之可惜的医院骑士团，今天仍然在瑞士摇旗呐喊，并为曾经在巴黎接受同样训练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提供该国教育，而这个巴黎机构则将罗耀拉送到威尼斯。因此，日内瓦热那亚成为名义上的新教，热那亚拥有的苏格兰为长老会，而反教皇的威尼斯则部署了名义上的天主教耶稣会骑士团。在法国，苏格兰仪式、耶稣会教士和瑞士加尔文主义者则始终如一地躲在圣约翰大修道院的大伞下，结为盟友，彼此之间行同样邪恶计画时，没有功能上的差别。这些人受制于共同的认知，认为实践的计画是一种信仰，高于各自名义上的新教或天主教信仰。今天法国和美国的情形也不惶多让，至少在苏格兰仪式和医院(骑士团)的最高级别仍是如此。这就是马尔萨斯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 耶稣会在梵蒂冈官方机构内无耻的推广罗马俱乐部，甚至进入罗马教皇科学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 -似乎是教会多次试图打击马尔萨斯反堕胎信仰，都以失败告终的神秘原因了。

我们不想在此区别，耶稣会骑士团的部分成员，或是一般的长老会或苏格兰礼仪共济会，到底是不是严格定义的基督徒或犹太教徒。我们不干涉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只是注意到有宗教团体，以非常邪恶的方式干预国家政策。我们过去曾经指出，耶稣会骑士团创立玫瑰十字会邪教，成为苏格兰礼仪之上的骑士团，银行界联合成为苏格兰教会或瑞士法语区和法国的加尔文主义者。这些一直都是马尔萨斯主义和相关计画的同一股力量，谢尔本则是他们之中最邪恶的缩影。

这群人在英国建立了更大的权力并及于美国国内，1787-1792年，英国国务大臣登达斯(Henry Dundas)进而主导规划中国的鸦片贸易。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紧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脚步，将其从美洲非法奴隶贸易投资的易腐物品，转移到更为密实、收入更丰厚的中国鸦片贸易。十七、八世纪间，耶稣会教士以这种规模，在中国和印度的建立了非法交易。

这就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亚当斯密曾经以符合苏格兰加尔文主义者的耶稣会道德的方式捍卫鸦片贸易：

“为世人谋取普世幸福，是上帝而不是人的事业。(上帝) 分配给人类一个少许的部分促使我们为自己不择手段(的不道德享乐)，也不考虑大自然有意产生(享乐本能)的有利结局。”

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美国代理人进行非洲奴隶贸易和中国鸦片贸易，及美国重要家族背叛其立国精神的主要罪恶，是追求他们和后代的利益，使之更富有，权势更强大，甚至更受敬重。

非洲奴隶贸易、中国鸦片贸易，怪物般的高利贷和背叛(美国)立国精神罪孽的利益，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美国代理人的道德和哲学标志。这些就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他们的后裔，以及瑞士和“黑色贵族”的后代，都是今天新马尔萨

斯主义背后的力量。

英格兰的鸦片贸易家族

今天美国所谓“(美)东部权势集团”的核心就是“美国钜富家族”的集合体，主要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主导参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中国鸦片贸易的美国家族，也是麻州撒冷城(Salem)的“珀金斯集团(Perkins Syndicate)”。 这些家族包括洛厄尔（Lowells）、卡伯特（Cabots）、福布斯(Forbeses)、希金森（Higginsons）、皮博迪(Peabodys)，库欣 (Cushings)和珀金斯(Perkinses)，最初来自麻州波士顿以北的艾塞克斯郡(Essex County)。他们自1776-1783年美国与英国战争期间，彼此就乱伦似的通婚，包括名义上的“洛厄尔” 麦吉尔邦迪（McGeorge Bundy）今天都是源自同一个血缘关系的家族。

自从这些新英格兰家族出现后，1763-1783年期间他们都坚决反对美国独立；他们受益于1776-1815年期间成为英国重要的代理人，甚至已经到了彻底叛国的地步；而他们主要的财富累积，都来自于英国政府协助的房地产投机、盗版合法化、非洲奴隶贸易和中国鸦片贸易。

这些家族还可以藉由几项显著的特征辨识。他们在美国革命时期与英国代理人亚伦伯尔（Aaron Burr）勾结，也是1800年、1804年和1807-1808年伯尔谋反的支持者。当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和美国秘密情报机构发现了他们刺杀的名单时，埃塞克斯政治集团(Essex Junto)非但不停手，还继续与伯尔的圈子合作，与设于(加拿大东岸的)新斯科舍省和(美国东岸的)波士顿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勾结。1812-1815年美国与英国的第二次战争中，这些家族提供驻加拿大的英国军队资金和物资，入侵美国。同一时期，他们参与另一个企图分裂美国的哈特福会议(Hartford Convention)，处心积虑 将新英格兰从美国分出，加入加拿大的不列颠诸省形成邦联。

从1800到1862年间，他们与英国 SIS 合作，这是他们屡次谋杀制造事端，将美国“巴尔干化”，分裂成两个或多个部分的一贯目标，也是1800年他们支持亚伦伯尔竞选总统的目的。伯尔竞选的计画是1804年先成为纽约州长，并将纽约州与美国分裂；1807-1808年进入另一场分裂的努力 - 却受阻于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和当时的参议员约翰昆西亚当斯之间的合作而不得不终止；他们最后一次的努力就是与 SIS 合作，建立美利坚联盟国（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CSA，即美国南部邦联）。

以下，简短的说明一下。埃塞克斯政治集团主要在在撒冷和纽伯瑞港(Newburyport）运作，然后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Charleston)建立了一个巢穴，与英国 SIS 合作。这个巢穴用于组织苏格兰礼仪共济会在美国南部各州的网络，以及共济会的卫星组织，如金环骑士(Knights of the Golden Circle)，1867年，英国 SIS 创立三 K 党(Ku Klux Klan)的前身组织。运作以纽伯瑞港为中心的家族发言人卡莱布库欣（Caleb Cushing），与其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同谋及纽约市的英国首席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合作，将情况引入1861-1865年的内战。(此处引述得所有文件，均是上述主犯间的通信记录，包括贝尔蒙特自上述

期间留存迄今的所有信件)。贝尔蒙特是1850年代和1860年代民主党的造王者。这几位阴谋家连续把两位他们的代理人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和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 推上总统宝座，并用这两个政府部署未来的邦联，解除未来联合政府部队的武装。为加快这一进程，这些新英格兰人从非洲奴隶贸易（和中国鸦片贸易）商，听从英国指挥成为“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组织各种反对奴隶制度的非法军事组织行动，包括他们的代理人约翰布朗（John Brown）煽动北方和南方对峙的激情，使之成熟到愿意分离。

其中，埃塞克斯政治集团与新罕布什州、佛蒙特州和康涅狄格州早已结为盟友，又与纽约市、新泽西州和宾州等与英国金融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合作。

他们庞大财富的基础始于1792年的中国鸦片贸易，当时麻州撒冷的汤玛士汉纳斯德珀金斯（Thomas Handasyd Perkins）退出非洲奴隶贸易。詹姆斯和汤玛士汉纳斯德珀金斯初步拥有自己的财富，进而加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国鸦片贸易。珀金斯在这项新事业中初步累积了财富，这项优势使他们得以与美国革命期间逃往英国的珀金斯家族合作。所有新英格兰的“家族”都直接、间接地透过大量通婚-进入英国家族。英国的家族从土耳其士麦那(Smyrna)港开采鸦片，是珀金斯家族经营和供货的源头。

埃塞克斯政治集团旗下所有的新英格兰“家族”及其附属的珀金斯家族，组成了“珀金斯集团”。珀金斯很快的就遥遥领先纽约鸦片交易员雅各布阿斯特（Jacob Astor）。康乃狄克州重要的鸦片贸易商 Russel 公司则是珀金斯经营的附属公司。

我们曾经提到，乱伦式通婚是这个大家族的大型结构。麦吉尔邦迪名义上隶属于洛厄尔家族，可以从英国非洲奴隶贸易的布里斯托港追溯到纽伯瑞港。因此，邦迪据信是透过背叛初衷取得不动产，是大片私有庄园及彻底背叛美国立国精神的非洲奴隶贸易、中国鸦片贸易、新英格兰洛厄尔家族雇用童工的纺织厂和新英格兰渔业等产业的继承人之一。其实，是不是”洛厄尔”这个名字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要看看邦迪的家谱，所有腐败、背叛美国立国精神的新英格兰“家族”都蛇鼠一窝的聚在这里。

除了新英格兰的“家族”以及纽约与原来的“亚伦伯尔”网路有联系的其他家族，还有两个重要的部分更强化今日“(美)东部权势集团”的核心。某些情况下，例如摩根家族是英国和新英格兰创造出来的新“家族”参与其联合行动，或者纽约、新泽西州和宾州，或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附近的特别帮派。在第二部分中，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犹大本杰明和斯莱德尔斯，组成今日纽约银行投资界的核心，不论是部署代理人建立邦联的网络中，或者在后内战时期的“炒房团”操作中，都是靠掠夺他们的前邻国致富。这部分主要加入来自瑞士、德国和英国的”家族”。

这群人被搅成目前的状态，主要是英国人在过去一百年持续运作的结果。其中以两个实例最为显著。首先是摩根证券成立的全国公民联盟，做为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勋爵伦敦圆桌会议集团的殖民地分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米尔纳将伦

敦老皮特的住所，漆咸楼(Chatham House)也就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展为英国的第二家协会，并在纽约市设立分行成为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进而并入全国公民联盟。

这些“家族”一般是以“威尼斯模式”组成一种金融信托的家族基金，继承人可以从中使用指定的财产，领取孳息收入，但不能碰母金。这些“家族”透过家族基金，看似可以“永远存在”，却或多或少与现存一代的血缘家族命运无关。家族基金可能延揽一群包括或不包括血缘家族成员的“专业”管理人。意大利模式中，家族基金执行官拥有古罗马的家长权力，包括接纳血缘关系家族阶级之外继承人的权力，目的只在于延续家族基金的合法存在。

据此，这些“家族”出现了封建制度，美国的重要经济学家亨利凯里（Henry C. Carey）也因此认为英国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混合的封建资本主义，封建利益 - 金融统治”家族”等靠收租为生的资本家利益 - 将其所属的工业资本主义利益置于其虚拟的奴隶身上。

这是比威尼斯老得多的制度形式，甚至是罗马帝国寡头统治阶级的权力。至少与古代的腓尼基人和迦勒底的吾珥人一样古老，是社会寡头形式的制度。

自有记录的最古老时代，寡头“家族”就与威尼斯的情况一样，具有相同的本质。除非投资非属重要，且可用于他们喜欢的金融投资，通常这些家族十分鄙视投资生产性资本。数千年来，他们的首选投资都是高利贷、升值的地租收入、垄断投机商品价格的利益，特别是原材料交易、奢侈品贸易以及直接、间接包下政府公共债务和收益的权力和财富。腓尼基人首先发展非洲奴隶贸易，阿拉伯贸易商则照抄腓尼基传统，将毒品贩运到远东地区，并建立了非洲奴隶贸易，威尼斯人则将之发扬光大。

美国法律实务中，特别是引入个人所得税以来，律师（包括许多来自上述阶级家族的律师及其特定律师事务所所属律师）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技巧，使这些家族能够建立相当于家族基金的形式；房地产和私人家族基金会的剩余信托只是其中一二。 因此，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所代表的“家族”或多或少以威尼斯模式出现；它是代表的家族基金，或至少符合美国法律。这就是”(美)东部权势集团”的家族基金，以及附属组织，这些组织认为自己团结一致统治美国，操纵其选举，至少决定其法定政府的崛起和没落。

“(美)东部权势集团”家族的特征并非是血缘关系和财务形式的组合，也就是“家族”与继承人的关系并非永久不变。教会和学校也是关键。今天，这些“家族”主要是英国圣公会（英国教会），长老会（苏格兰教会）或天主教（耶稣会，威尼斯人）。整体结构由与神职人员相交的“兄弟”邪教紧密连结在一起，并以教会的阶级设置。邪教的最高级别是英国圣约翰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往下则是与之相交的苏格兰礼仪共济会的最高层级和耶稣会骑士团。这个宗教和邪教的操作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所谓的“常春藤盟校”等重点大学相交，某种程度上也建立了私立中学网路，如著名的英国圣公会格罗顿(Anglican Groton)，和安多弗和埃克塞特的菲利普斯学院(Phillips Academy)。家族圈子、教会、兄弟会、

大学及其校友会，为”(美)东部权势集团”家族提供新血，一个或多或少从出生到死亡都受到控制的社会环境。

这项制度影响的配置主要是模仿英国，影响最大的当属艾略特(Charles W. Eliot)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以后。这种制度作为一种将文化矩阵强加在家族成员身上的传输带，制约成员成为”(美)东部权势集团”家族的一份子，进而分享他或她这一代家族的文化和哲学观点。

同样受控的社会环境，包括大学，教会和兄弟会（邪教），还有筛选和招募家属潜在仆人的作用，也是这一过程的主要手段。潜在的人才可能便于“看管”，却不表示会为这些家族提供服务。 潜在招聘的人员可能要接受“训练”，也可能要“接受”任何可能的任命，等等。筛选代理人和招聘个人加入封建官僚机构的工作，主要是由重要的大学学者，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观察员”担任。获选为代理人的职业生涯则取决于其为“家族”提供的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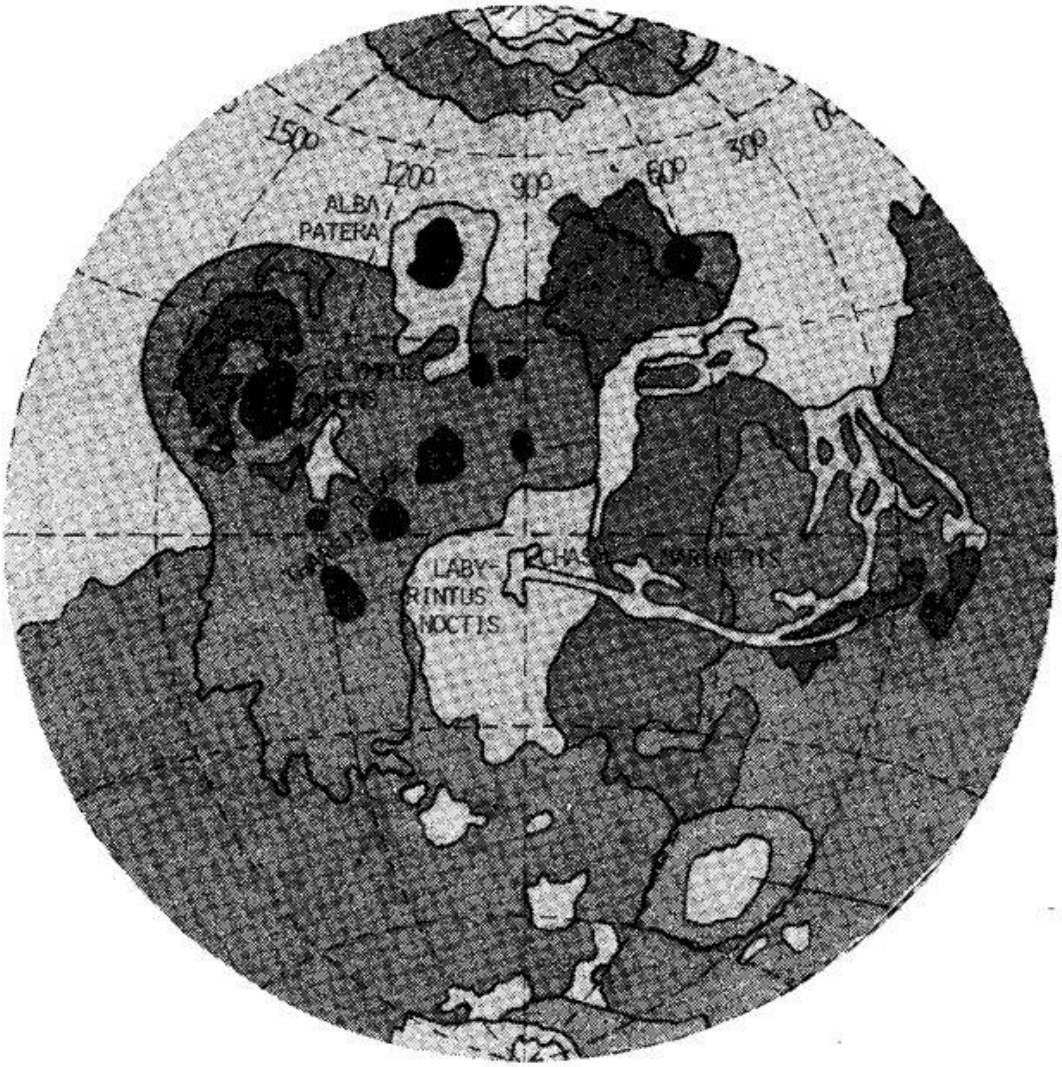
谢尔本先生的操作首次进入未来的“美国家族”核心，所以这二百多年的文化融合过程已经移交给这一代的“(美)东部权势集团”，就像以前奴隶贸易、鸦片交易和背叛美国立国精神所传达同样的世界观。重点不在于 “(美)东部权势集团”主导地位者的祖先是奴隶贸易商、鸦片贸易商和背叛美国立国精神的叛徒；关键在于，这种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同样的道德观和哲学观，已经传达给今日大部分的“家族”阶级及其“封建官僚主义”附属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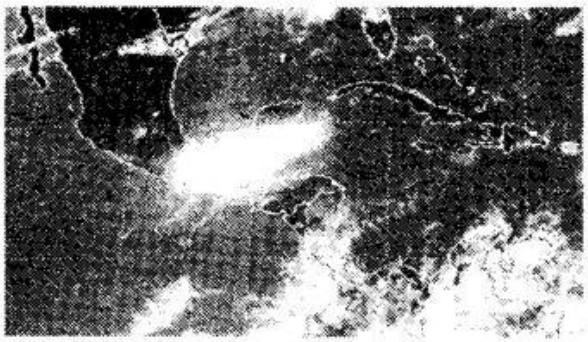
“(美)东部权势集团”控制了美国大部分的新闻和娱乐媒体、大多数重要的金融机构、大部分控制原材料的公司，都透过房地产市场自上而下一条龙的方式掌控，特别是房地产集团持有矿产和其他特殊的自然资源，以及直接或以融资的方式掌控大多数工业产业。这些力量通常控制政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控制政治和文化上有影响力的基金会，等等。

1964 - 1968年期间，“(美)东部权势集团”形成一股力量，推动美国成为“后工业社会”残骸的政策，将美国转向成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天堂。这些行动最重要的操作者，是“(美)东部权势集团的头子”麦吉尔邦迪，他先是担任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之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来从1966年起，主导福特基金会，最近在斯隆家族基金会从资深策士晋升为更高级别的“智叟(wise old man)”，是纽约大学特别为他设立的巢穴。邦迪和他的同伙在1969 - 1970年的冬天，全面从“禁止炸弹，反越战和新左派”的瓦砾中，创立了“环保运动”。

这个过程层次更深，我们将在下一章专注于此，检视当前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暴行是一个很重要的远程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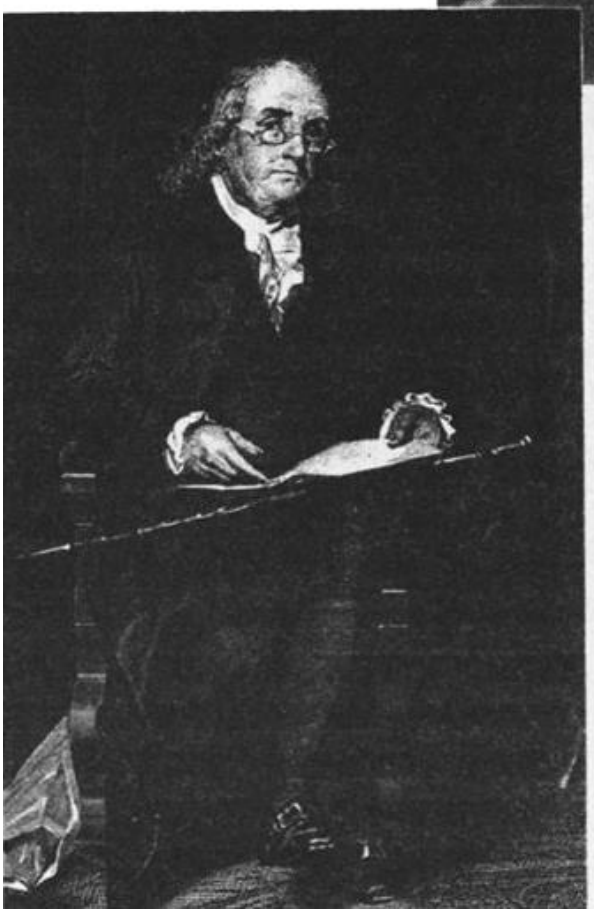
1946-49年间，相对的和平主义哲学家罗素，组织“禁止炸弹”运动和帕格沃什(Pugwash)会议之后，要求进行预防性核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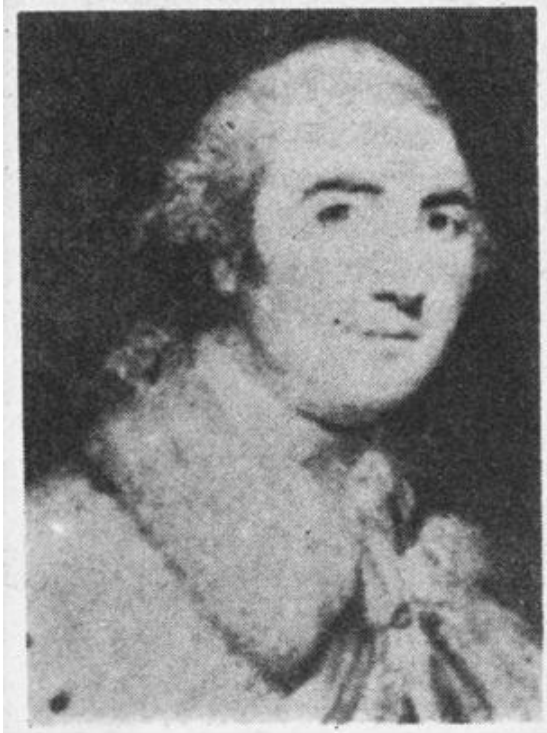




1982年4月4日的卫星云图显示墨西哥埃尔奇琼火山爆发造成的自然空气污染物。矩形顶部显示墨西哥地峡上的明亮圆点、细灰和二氧化硫云层，在十二小时内，扩散到图中矩形底部的宽阔区域。估计这场“自然界”的大规模污染，产生1,500万吨硫磺及其化合物，并蔓延到全球。

库萨枢机主教（右下角）重新建立科学严谨性，莱布尼兹（右上角）展开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学。富兰克林抓住了莱布尼兹想法的重心，在美国革命中实现此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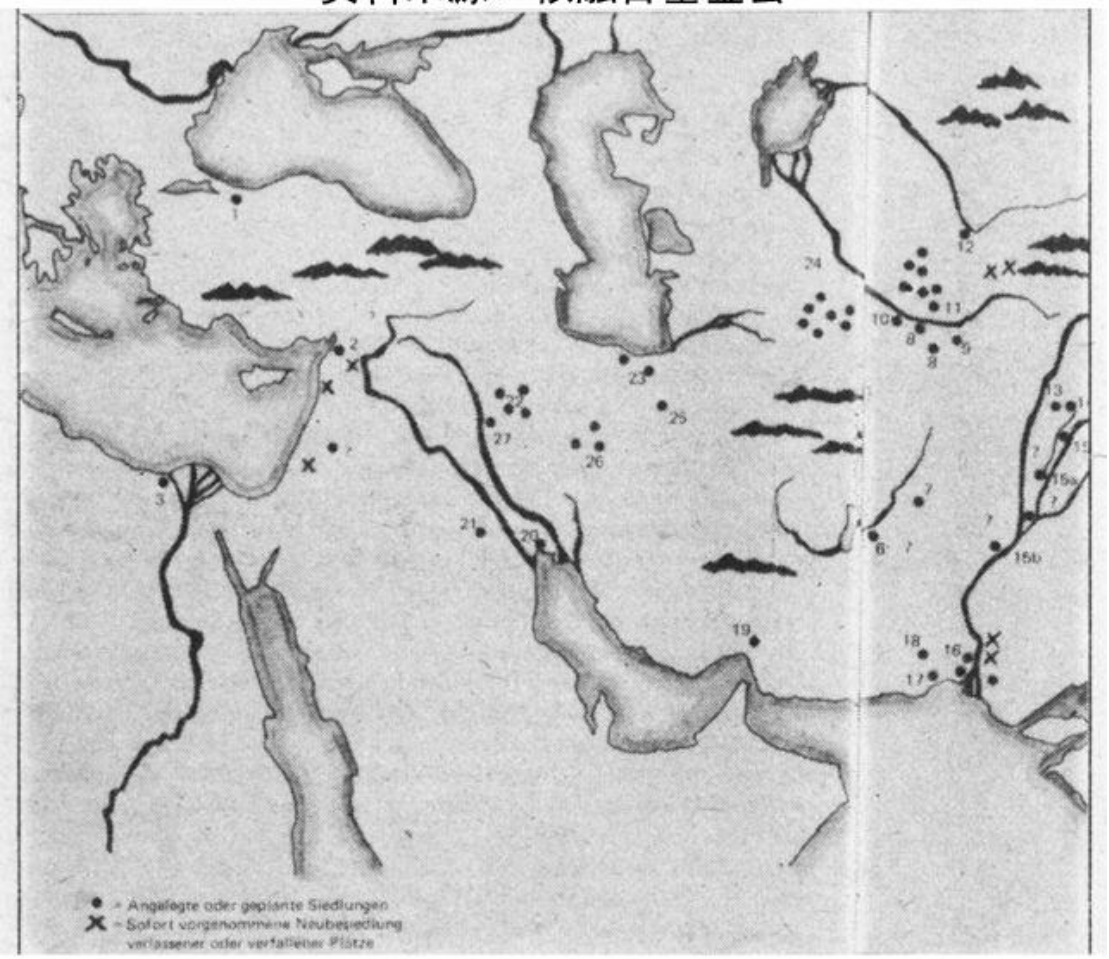


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左上）和新教的加尔文（右） － 同一个邪恶硬币的两面。下图是谢尔本伯爵（左）和他对美国革命的"秘密武器"亚当・斯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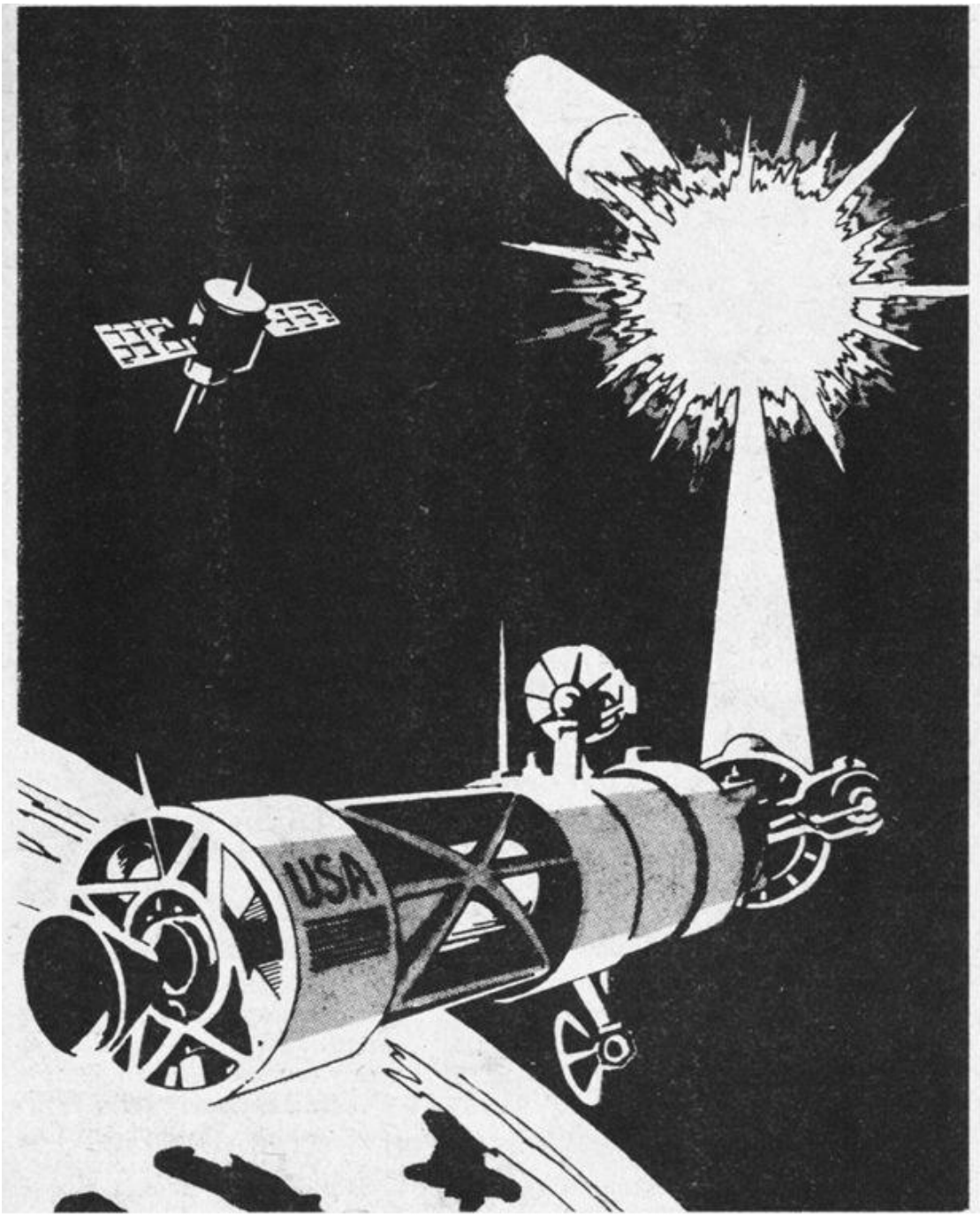
寡头是人类发展的敌人。上图，查理四世家族，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皇帝，弗朗西斯科·哥雅(Francisco Goya)绘制。下图，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

旧家族基金会的发源地，威尼斯（上图）。下图为圣山，阿索斯山，他们的组织中心，传播邪恶的异端邪教 - 诺斯替变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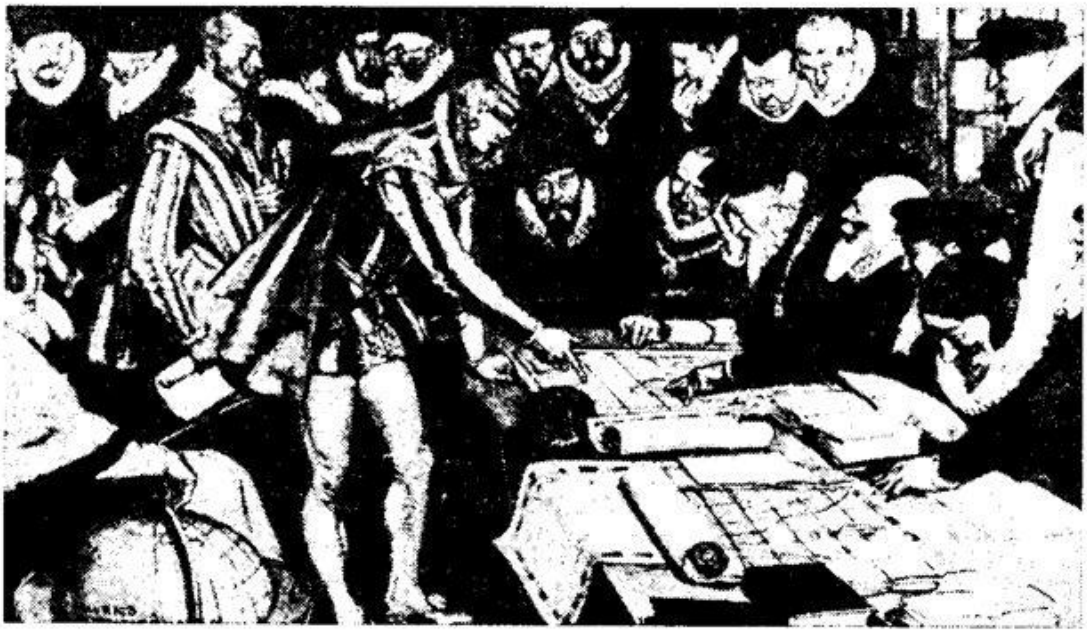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核融合基金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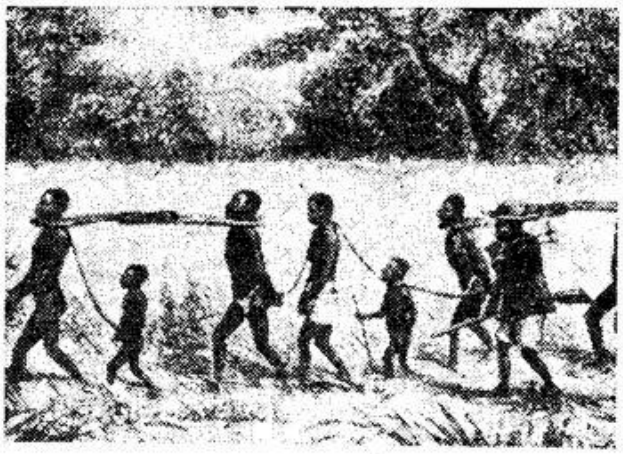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大帝的城市建设计划。黑点显示亚历山大计划的城市



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宣布“保证互相毁灭”（MAD）的军事战略应以“保证互相生存”的战略取代。艺术家因定向能量束反导弹武器的发展，在此绘出相关概念。 1982年采用拉鲁旭提案的政策是否会贯彻？





隶属于东印度公司的黑利伯里书院(HaileyburyCollege)为马尔萨斯（1766-1820）创建了他自己主导的政治经济学，并宣传自己的短文“人口论”，为东印度公司的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政策辩护。

3. 罗素的世界帝国梦

大多数不熟悉罗素(Bertrand Russell)真相者真诚地相信，英国首相约翰罗素伯爵的孙子是爱好和平的人。他们不记得，或者只是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罗素试图在1946 - 1949年期间几乎成功的动员英、美、法等国进行“预防性战争（drop shot 网球术语：过网急坠球，扣球）”。美英确实承诺这一场命名为“行动坠落(Operation Dropshot)”的战争计划，并概述1950年代后半期发起核战的准备工作。

阻止对苏联的“预防性核战”并不是来自罗素的良知。苏联在1949年开发了核裂变武器，“向前超越十年”，接下来开发可部署的 H 型炸弹武器，与此同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博士领导的同一小组在美国取得成功。只有一方拥有核武的“预防性战争”已经不复存在了。罗素再次回到自己反战的游行行列，并且组织1950年代的国际禁核武运动(international Ban the Bomb movement)。

尽管如此，罗素要求“预防性核战”长远政策的因素仍以各种形式存在，包括核威慑、相互保证毁灭（MAD, Mutually and Assured Destruction）、有限核战争、前进核子防御、灵活反应战略、绥靖政策等战略思维。 1964 - 68年间，正是这种战略原则将世界转为新马尔萨斯政策。

整起事始于1946年10月，罗素在“原子科学家公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罗素思想在这个时期的根源深深渗透到自己的过去，更深入到前一章所述的英国历史，原则上深入英国居民庆祝的历史时期，据说，人类在巨石阵中的宗教献祭。此刻，我们会把1964年之前的历史视为事实，并将注意力放在战后。

罗素在整个这段期间的总体建议是，发展核武使得世界政府为唯一拥有且使用此种武器的局面。他建议世界政府的副产物就是对苏联进行“预防性核战”。他认为，必须在苏联制造核武之前征服苏联，才能创造垄断核武的世界政府：西方联盟建成核武军械库之后，就可以果断出击，压倒苏联陆上和“常规”军事力量，启动战争。一旦预防性核战获胜，盟军就可以建立拟议中的世界政府。

为了加速这项方针，罗素组织了名为世界政府全球议会世界协会（WAPWG）。罗素的 WAPWG 在1955年之后逐渐消失，当时四名苏维埃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两位稍后出席另一系列称为帕格沃什的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当时罗素建立世界政府的意愿并未减低，修改形式后又借尸还魂重新出现在帕格沃什会议。 1955年以后，WAPWG 逐渐退出世界舞台；由帕格沃什会议接手。

帕格沃什会议早期的关键发展发生在1958年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第二次帕格沃什会议，1958年议程中，最重要的议题是“如何在炸弹下活下来”，由退休的芝加哥大学原子科学家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博士演说。西拉德原为奥匈裔 – 这无可争辩也是很重要的事实 - 他在移居美国之前已经在英国经历过一段流亡生活。 1958年他发表的演说，1966年刊于“原子能科学家公报”成了知名影片《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副标：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上炸弹)的灵感来源，其中已世的英国演员彼得·谢勒（Peter Sellers）扮演三个角色，包括著名

的利奥·西拉德漫画“奇爱博士”。

西拉德在演说中提出的主要特点包括：（一）利用核武确保世界和平，以相互威慑对抗超级大国发动的全面战争。 （二）将有限核战作为舒缓紧张局势的手段，避免紧张局势累积到全面核战发生的程度。 （三）例如，美国必要时允许苏联在选定的城市进行热核破坏，平衡苏联在当地交战中遭受伤害。 （四）全面的中东石油危机，造成中东的全面受创。

没必要只是提到西拉德的提议，是代美国和北约联盟1960年通过的政策，其实帕格沃什会议也是如此。一般来说，帕格沃什会议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通过的政策，已经成为美国和北约联盟的战略和外交政策准则。

我们更准确地描述了帕格沃什会议是苏维埃、英国和美国东部权势集团的代表定期会晤，会中各方就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策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后来的政策成功地向美国政府和北约国家政府强加了代理人，例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美国前国防部长、前福特汽车董事总裁)，麦吉尔·邦迪(McGeorge Bundy ）和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

这种苏联代表与英美的全面性谈判通常称为“秘密外交或非正规”谈判。“秘密外交”谈判和其他的交换意见，本质上没什么好或不好。当无法在官式或外交的保护下进行探索式讨论时，这种私人交流的方式有时也可能有用。

然而，帕格沃什会议并不是一般的“秘密外交”讨论过程。这是英美权势集团为了私人利益，背着美国政府，暗中与苏维埃政府密谋世界未来发展的场合。事实上，苏联政府已经参与影响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却不了解美国政府出卖这些编造政策的事实，还以为是扼杀苏联利益和野心的聪明方式。

这些帕格沃什会议的谈判还有其他特点，说明谈判的特殊性质。这些谈判的特点，美国总统都不会承认 - 直到一切都太晚了。帕格沃什会议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世界政府的制度。利奥·西拉德在1958年的演说中已经提出；他表示，核威慑必须重新划定全球政治版图，这个生意由英国的彼得·卡尔顿勋爵（Lord Peter Carrington）命名为“新雅尔达” （New Yalta）政策。

然而，这只是划开了事情的表面。他们谈的是建立世界政府制度，将整个世界分为两个或三个世界帝国，这取决于 - 是否赋予中国的影响范围延伸至邻国，例如日本、东南亚，也许是印度的部分地区。除了中国的特殊情况外，其余的世界地区会在世界帝国分为西部和东部，也是世界政府的两个制度，其中一个系统由西方富裕靠收租为生的家族统治，另一个系统则归给俄罗斯帝国统治东方。

这项提议或多或少与欧洲历史的先例相符。幸存的通信副本仍然存在，其中记录了西元前四世纪中期的波斯帝国，从幼发拉底河划一条线，和安纳托利亚的相应部分划为西部和东部。当时波斯帝国所属的阿启孟尼德王朝(Achaemenids)留在幼发拉底河以东以及安纳托利亚一部分东部地区。波斯帝国的西部，也是该分界线的西部，留给马其顿王国菲力浦世袭的统治者开发。其中部分协议包括，菲

力浦将在西部地区强制推行 “波斯模式”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其他地方则以“寡头模式”称之。这两个术语含义相同，其中一个参与这个阴谋的主要代理人，亚里士多德收录在其《政治学》和《尼各马科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的著作中。

这个计划是波斯帝国的真正统治者所设计，是靠收租为生的资本家家族、现代人称为“迦勒底人”和“魔术师”的异教祭司、“腓尼基人”，以及中东东部“模贝人(Mobeds)”的综合体。当时腓尼基的推罗 (Tyre)城是这些力量的集结中心。除了与菲力浦国王的协定之外，这些势力与谢尔本伯爵1784年掌控英国议会相同，还控制了希腊底比斯（Thebes）邦辖下德尔福和提洛岛(Delos)的阿波罗邪教，并在斯巴达和雅典拥有主要的派系。

该计划是由各种纠缠不清的原因编制而成。首先，无论是贿赂或伯罗奔尼撒战争等，波斯帝国永远无法征服希腊本土；波斯与希腊军事系统不契合。此外，波斯帝国的边缘当时已经非常不稳定， 总督辖地面临地方性的起义状态。原因众多；这方面的详细讨论与本文宗旨无关。

最重要的是，第一，亚历山大大帝的胜利击败这项阴谋，第二，亚里士多德等人暗杀亚历山大，阻止亚历山大完成他的“ 盟约 “。亚历山大的早逝，加速了罗马帝国的成立，依正常速度罗马帝国大约要等三个世纪以后。

菲利浦国王即将执行协议条款的前夕就被暗杀了，亚历山大在雅典学院和阿蒙的昔兰尼(Cyrenaic)神殿支持下，夺取权力，摧毁推罗城和整个波斯帝国。尽管亚历山大遭到暗杀，大约在迦勒底人已经足以整合成另一个西部地区之前250年，菲利浦国王的运动已经破坏了波斯帝国的制度。

迦勒底寡头“帝国”模式在历史上多次出现，存在时间比巴比伦还久。政治上，它是局部、无能、半自主式政治实体的集合，每一次都有一些特殊的种族、宗教或民族宗教的特征。通常，这些局部、文化、半自治宗教实体都被归类为封建君主的权位，类似波斯帝国总督的辖地。 “民族”，如亚述人、巴比伦人、玛代人、波斯人、腓尼基人或罗马人，窃据社会顶层，施加军事霸权。实际上，整个过程都是由幕后的迦勒底“家族”或“腓尼基”式“家族” 的联盟所掌控。这些“家族”是靠收租为生的资本家“威尼斯模式” “家族”，同时又控制祭司职位。

这就是波斯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内涵。

从查理曼(742-814)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霍亨斯陶芬家族 Hohenstaufen，1194-1250）的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奥古斯丁思潮，试图透过接管古罗马帝国，应付拜占庭对文明的威胁，并将圣奥古斯丁版本的尼西亚信经(The Nicene Creed-早期基督徒的信仰宣告)的文化环境传递给帝国当局。宗教裁判所在1230-1233年之间兴起及1250年腓特烈二世过世，导致查理曼的设计功亏一篑。 1268年之前，威尼斯人领导的教宗党员（Guelph，德语：Welf），在义大利和西班牙消灭了斯陶

芬王族(Staufer)，同时击败了皇帝党员(Ghibelline，德国：Waibling）派系。义大利，以白色教宗党员的共和派爆发了抵抗黑色教宗党员的寡头派别。黑教教宗党员（今日称“黑色贵族”）获胜，具有伦巴第银行（如巴尔迪和佩鲁齐）典型特征的义大利家族基金，则以高利贷掠夺欧洲。

白色教宗党员政治领袖但丁（Dante Alighieri）也是斯陶芬王族的盟友，为欧洲的新政治秩序创造了一个新视野的设计，取代查理曼、塞利尔斯(Saliers)和斯陶芬王族的皇家形式。设计的中心是奥古斯丁教义的新柏拉图式次序，由但丁著名的喜剧《神曲》定义。 《神曲》中阐述的原则本身并无新意，却一直都是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政策的中心特征，其中新意是但丁对义大利语的处理方式，将民族国家制度的设计，隐含在大作《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中。

与十九世纪初耶稣会士制作的神话相反，义大利语不是衍生自拉丁语。虽然过去两千年之间彼此相互影响，他们仍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罗马的拉丁人征服了使用义大利语的人民，他们仍然是义大利的绝大多数人口，主要使用的语言是义大利语，而不是拉丁语，情形和法国、西班牙一样。新高地德语则是部分合成的语言，比任何罗马系语言都更拉丁化。

但丁并不反对使用拉丁语。罗马本土的野蛮拉丁人受到希腊文明影响，十三世纪中期之前的中世纪教会，以改进的语言编制了优雅而有时深刻的文学作品。问题是，以拉丁语作为帝国管理的共同语言，鼓励当地母语降解成野蛮的方言，影响所及大多数人口没办法以严谨的语言形式传达政策的重要概念。但丁表示，义大利语是一种可以优雅而又深刻表达的有力语言；他产生了一种义大利语，直到今天都以一种无与伦比的优美力量沟通。十五世纪，正是通过有组织的公开诵读《神曲》段落，义大利人民学会了用义大利语发言和思考。

为了建立真正的共和国，每一名成年人都有能力承担公民的职责，共同研议国家政策最深刻的议题，共和国公民有必要使用共同的书写语言。因此，分享共同的书写语言和共和主义哲学观念的人，应该以书写形式的语言为基础，成为主权民族国家的共和国人民。

但丁的著作成为深谋远虑的基础，甚至延伸到十四世纪最黑暗的深处。总部从亚维依(Avignon)招募佩特拉克(Petrarch，欧洲人文主义之父)，成为这个谋略的领导人。格鲁特共生兄弟会(Groote's Brothers of the Common Life)所属的奥古斯丁教职修会(teaching-orders)兴起，促进了十四世纪末期成形的文艺复兴，也可以说布鲁内列斯基(Brunelleschi，义大利文艺复兴早期颇负盛名的建筑师)完成了佛罗伦萨大教堂圆顶的任务。库萨枢机主教将不受尊重的教皇从废墟中解救出来，最终将他的合作者皮科洛米尼(Piccolomini)带到教皇派，成为庇护二世，完成了但丁推展的事业。库萨从自己所著《大公教会的一致》(Concordantia Catholica)一书开始，设计民族国家的法律，以及主权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并启动了欧洲文明五百年统治的数学物理学革命。

其中，库萨一次就把威尼斯和拜占庭的势力打垮了。这就是著名的1439年佛罗伦萨议会，其中君士坦丁堡的帕里奥洛加斯王朝(Paleologues）和包

括科西莫·迪·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库萨和枢机主教贝萨里翁(Bessarion)等圈内人都尝试建立圣奥古斯丁和子说的原则，作为西方和东方教会的共同、普遍原则。他们的努力几乎成功。

这似乎是古老的历史，但是这部分是罗素及其世界政府政策背后的决定因素。因此了解他们在最近三十八年的过程所做的工作十分重要。

十五世纪中叶之前，黑色贵族的家族基金从上个世纪中叶的破产浪潮中快速复原；这次的破产浪潮始于大型伦巴第银行旗下的巴尔底(Bardi)、裴鲁齐(Peruzzi)银行的破产。他们向佛罗伦萨理事会反击， 1453年的秋天在君士坦丁堡赢得决定性的战役，在欧洲恢复了持续迄今的实力。

威尼斯主导破坏君士坦丁堡帕里奥洛加斯王朝权势的阴谋，并与家族史可以追溯到凯撒时期古罗马的热那亚家族，以及阿索斯山修道院(Mount Athos)的拜占庭教会合作。威尼斯曾经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签署摧毁帕里奥洛加斯王朝的协议，允许奥斯曼帝国控制君士坦丁堡和大部分的拜占庭遗址。阿索斯山修道院代言人金纳迪乌斯（Gennadius）利用拜占庭教会命令希腊人不要聚集防御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和罗马家族提供奥斯曼炮兵和枪手，聘请四千名热那亚雇佣军协助防御君士坦丁堡，晚上跨过围墙和大门的卫兵，并允许奥斯曼部队征服、掠夺城市。

作为回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穆罕默德征服者快速授予金纳迪乌斯为牧首，控制奥斯曼帝国境内非伊斯兰人事务，并要求威尼斯征用希腊投降地区的部分土地，授予其终身通事（Dragoman）的有利地位，实际上则是为奥斯曼情搜和外交服务。威尼斯则从内部创造并控制了奥斯曼帝国。

同一时期，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在西班牙兴起，热那亚接管了伊莎贝拉和伊比利亚半岛的绝大部份，尽管费迪南活着时就一直反抗。虽然义大利金色文艺复兴时期的盟友帕里奥洛加斯王朝摧毁了东半部，加上西班牙步兵从西方夹击，威尼斯最终赢得在义大利发动对抗金色文艺复兴的胜利，并在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过世后控制义大利。切萨雷·波吉亚是军事强人，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为拯救义大利而努力时，曾经是他手上的最后一张王牌。

同一时期，威尼斯接管巴伐利亚，开始酝酿成立奥匈帝国，作为奥斯曼帝国未来发展的支票。威尼斯从内部支配哈布斯堡家族和土耳其人，并藉由创立其中一方控制另一方，大玩两手策略。威尼斯完成了毁灭俄罗斯帝国和德国二大帝国的长期计画，这场巴尔干的竞赛在沃尔皮·迪·米苏拉塔伯爵(Count Volpi di Misurata)领导下，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威尼斯的代理人亚历山大·洛夫维奇·帕尔乌斯（Alexander Helphand (Parvus)）将列宁送至俄罗斯，成为威尼斯的资产，列宁则在1917年的10月革命中愚弄威尼斯人，逃脱他们的控制。列宁再透过保留布尔什维克的权力，又在俄罗斯创造了一个当年威尼斯人玩第一次世界大战略微不同的情境，再搞一次二次大战。

同时，威尼斯的计划在十五世纪下半叶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法国国王路易十一成立第一个现代形式的主权民族国家。路易十一世的成功创造了历史上称为英国伊拉斯谟斯阵营的情况，正如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历史上的典范，在英格兰内战时期创造了第二个主权民族国家。破坏这两个主权民族国家，成为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当时至1815年维也纳会议期间的目标。英格兰在1603年被征服，并于1660年由热那亚重新取得。法国并没有被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所毁，但是内部被削弱，以至于从未能恢复过去的荣光。这个行动的关键是大胆查理(Charles the Bold)的勃艮第王朝和哈布斯堡之间的联姻，即时催生了未来哈布斯堡王朝的君王查尔斯五世。

1525-26年，德国改革进程中，威尼斯组织德国农民战争，进而屠杀农民。当其时，查尔斯五世掌控西班牙王位，代表威尼斯的哈布斯堡洗劫罗马，让威尼斯在1527年，除了法国和英国之外，拿下欧洲的所有权力。库萨和教皇庇护二世受到压制，威尼斯以耶稣会士和医院骑士团为主要工具，组织了“反改革”运动。这是一场噩梦，新的黑暗时代，直到教皇信赖的代理人马萨林主教(Cardinal Mazarin)，出面在1653年取回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的权力之前，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受害。

要了解反改革，必须看到其核心基本特征。这是一场摧毁和消除库萨枢机主教和十五世纪教皇所成就的一切运动：主权民族国家，库萨自然法则理论和与之相关科学方法的潮流，以及奥古斯丁（新柏拉图式）神学。反改革的智力武器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和罗马帝国法。

这是对英国施加的威尼斯文化环境。十八世纪期间，英国领导圈之间围绕罗马帝国法和历史问题展开长期政策讨论。吉本治疗只是其中最为人知的部分。十九世纪，威尼斯的影响力及于阿克顿(Acton)家族以及重要的布尔沃·李顿(Bulwer-Lytton)家族，引导加入本杰明·乔维特(Benjamin Jowett)和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牛津圈，形成了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费边社、英国（同业公会）社会主义和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的系数俱乐部(Coefficients Club)、圆桌会议和漆咸楼(Chatham House)都说明了这个过程。总理约翰·罗素（John Russell）的孙子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教子·罗素是十九世纪发展观点的主要案例。

罗素自己在1902年离开米尔纳系数俱乐部的圈子时，想法就出现了奇特的变化。他走出餐厅的那一刻，谈话的主题就是为了迎接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准备。英国工业绝不适宜面对即将到来的冲突。英国海军已经过时了，可能会沉没。陆军还在使用火枪凌空战术，等等状况不一而足。绝对必须动员工业界并重组军事力量。

罗素从不反对这场战争，有几个例子足以说明他的观点。

他在1951年写道：

但是，你说光景不好是例外，不过却可以例外处理。这在工业主义的蜜月期或多或少是真的，但是除非人口不再大量增加，否则这就不会

再是真的.....。迄今为止，战争并未对这一增长有何影响..... 。战争.....在这方面的表现令人失望..... 也许细菌战可能会更有效。如果黑死病可以每一世代在世界各地再传播一次，幸存者就可以自由地生殖，世界也不会变得太拥挤.....。事态的发展可能让人有点不愉快，但是还能怎么办呢？真的，情操高尚的人对幸福无动于衷，特别是其他民族的幸福。

1927年，英国外交部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席策划威尔斯（H. G. Wells）提出 “公开的阴谋论(阳谋)”议案，其中总结了以下说法：

1. (我们)为所有实际和理论目的断言，并默许现有(主权)政府的临时性。

2. 以激进的手法利用个人和财产，干扰世界经济体，解决这些政府尽可能减少冲突的决心；

3. 负责任的全球理事会决心以最少的信用、运输和基本生产，取代地区或国家的私人所有权，为人类的共同目标服务；

4. 承认有必要进行全球生物防治（Biological Control），例如人口与疾病；

5. 支持普世个人自由和福利的最低标准；

6. 个人生活的最高职责是创造可完成上述任务的世界首脑，并且能全面提升人类的知识、能力和权力。

罗素对此的回答：“我不知道是否能有其他任何事情让我更同意的。”

罗素在同一时期提出了以下的观察结果，这些观点涉及他说明威尔斯“公开的阴谋论”宣言：

社会主义，特别是国际社会主义，只有在人口(几乎)稳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为稳定的体系。农业改良可能足以应付(人口)缓慢增加，但是(人口)快速增长最终将使全人类落入贫穷的境地..... 无须借助于战争和瘟疫，出生率下降到使人口稳定，则全球白人将很快不再增加，亚洲人会更多，黑人仍然一贯的更多，.....如此，社会主义的利益才能部分实现，较不多产的种族将在必要时以一些令人厌恶的方式，对抗多产种族，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罗素离开米尔纳系数俱乐部不是因为他们想要战争，而是因为他们提出以工业建设拯救民族国家的制度。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罗素在世界政府运动提出核战，并不矛盾。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战主义，他的角色与赫胥黎（Aldous Huxley）等人，建立了1930年代的誓言和平联盟（The Peace Pledge Union）的立场一致。罗素在19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的反战主义，是其政策的一贯表达：世界政府由盎格鲁 - 撒克逊人统治，拥有即使是有必要也很恶心的垄断手段。罗素的一贯政策是他“社会主义”的目标，即马尔萨斯世界政府致力于减少黑皮

肤人口，“即使是有必要也是很恶心的方法。”

许多人分享了罗素过去三十八年或之前的观点。这份协议是世界政府全球议会世界协会的基础，也是所谓帕格沃什会议“秘密外交”谈判的过程。

事实上，世界政府与苏联领导层的谈判，划定至少两个，甚至三个“帝国”，是因为苏维埃核能和热核武库增加，而不是谈判者想和新波斯帝国的俄罗斯“东部地区”并肩生活。毕竟，人们可能总是希望在协议中作弊，亨利·基辛格的前导师和现任商业伙伴彼得·卡尔顿公爵（Lord Peter Carrington）最近强调此点。卡尔顿在向苏维埃政府提出“新雅尔达”条约时，竟同时宣布现任苏维埃总理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是卡尔顿外交政策的苏维埃宝贵资产，并向公众保证，他正在苏维埃维持“临终看护”联盟。彼得·卡尔顿的“临终看护”绝对不是什么 天大的秘密。基辛格、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许多其他同样想法的人都提出过类似观点，“苏维埃帝国”已经接近种族和宗教叛乱浪潮的边缘，预计从东欧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简称经互会)成员国，横扫过苏维埃的乌克兰和高加索，进入中亚的伊斯兰。

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探讨彼得对苏联通称克格勃(KGB)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想法。重点就是，美国东部权势集团一直以来都想要摧毁美国、西欧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因为他们假设“苏维埃帝国”会在西方崩溃之前先从内部崩溃，也认为苏联有能力在此之前利用西方日益衰弱的经济和军事。 1964-68年间，东部权势集团及其在西欧的同盟已经成功地从内部摧毁西方。

接着我们将检视西方遭破坏的过程，然后再把注意力转到苏维埃总理安德罗波夫和他相关伙伴所造成的问题。

马尔萨斯的核威慑逻辑

1960年代初执行核威慑战略伊始，情况取决于超级大国是否有足够的手段，在热核弹道导弹发射后可能击中目标之前，就摧毁飞行中的导弹。因此，亨利·基辛格在1972年成功地与苏联签署限制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这是支持帕格沃什会议武装力量的基本目标。这是源自于西拉德1958年帕格沃什会议演说中定义威慑的意义，他们才企图阻止发展核威慑主义核心的反导弹防御系统。

如果有效开发反弹道导弹（ABM,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防御系统，则配备镭射和各类型定向武器的 ABM 系统不仅可能非常有效，而且摧毁行进中的热核弹道导弹的成本可能降低不只数百千倍，甚至比制造和发射弹道导弹的费用还要低。如果两强经济实力不相上下，拥有防御体系的强国，几乎完全可以摧毁攻击方强权发射的导弹，之后攻击方强权对防御方强权几乎无能为力。例如，今天，美苏两强部署的（ABM）防御系统，可以摧毁另一方99%以上发射的弹道导弹，双方差距大约在五年内。此时，热核弹道导弹已经过时，而且，整个西拉德的“核威慑”观点就没用了。

但是，如果帕格沃什可以操纵两个超级强权，使之除了有限度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之外就禁止其他任何开发，那么，大约50%以上的热核导弹会发射击中目标，成为实际上的终极武器。因此，核威慑代言人认为，任何一方的超级大国发动全面战争，另一方都将以热核轰炸回击。这个论点意味，两个超级大国多多少少会被这类战争彻底毁灭。换句话说，“相互保证毁灭”，或是 MAD。

西方的 MAD 代言人或核威慑主义者认为，热核导弹的第一次也可能是第二次的全面齐发，表示破坏这两个强权，经济资源将不足以进行全面战争，也超出了炮火的拦截点。所以他们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是只能用于拦截热核导弹之后的军事权势集团，这种设施似乎也没必要维护。他们继续争论，军事上不再有任何理由促进这套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以支持全面“常规”军事能力所需。只要经济技术基础足以支撑核威慑力量所需，经济在技术上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崩溃到“常规”军事力量，流于“区域性”的殖民战争。

这是自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又译詹森)担任美国总统、麦吉尔·邦迪、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基辛格等人论点之后的战略原则。吾人同意，帕格沃什会议为东部权势集团第一次代言时，行事很谨慎。如果广大民众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至少不会突然出现的，大量防御能力和经济崩坏，传统军事专业人员还是会受到专业守则的牵制。 1964-68年间，美军因为越战旷日持久而日益不受欢迎，舆论也大为默许。 1972-73年，美苏关系缓和，这是1958年西拉德已经确立为其全面的政策和做法了，这么多年之后的政策只做了一些微调。

当时，麦吉尔·邦迪晋升为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福特基金会总裁。 1966年，美国政府最高机构已经被核威慑政策和新马尔萨斯政策锁住，转型为“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第一步，就是采用1960年代中期约翰逊的“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综合政策。简要背景说明如下：

罗素约在1927年提议，社会应进行三点改造。第一是停止所有基本科学进步的政策。第二，开发廉价滥用药物人口的方法，作为社会控制的措施。第三，颠覆但丁的语言革命运动，摧毁使用语言特征，使人们无法对重要政策问题进行严谨缜密的交流。

1938年，罗素在英国成立誓言和平联盟(Peace Pledge Union)之后，他和合作者赫胥黎联袂拜访美国。赫胥黎回到加州，恢复他早期促进使用大麻和散布神秘异教崇拜的工作。罗素与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进行深入的合作。罗素、哈钦斯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及其当时的丈夫葛列格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共同推出 “科学统一”的计画。罗素在计画提到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合作者，包括费边、德国的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洗脑者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博士，以及1930年代初即与科尔施合作的激进实证主义者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又译卡纳普），再加上其他来自各地的人。宾州大学接着引入语言破坏版本 “语言学”。不过，美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较完整的体验这项计画的效果。

大战期间，瑞士一间实验室开发出合成的麦角胺，LSD-25，一种会导致幻觉

的药物，使用者会产生偏执型精神分裂性的精神病症状。赫胥黎从伦敦的塔维斯托克（Tavistock）出发前往加州，参与 “MK-Ultra” 计画，与葛列格里·贝特森和其他人合作。这项计画以加州帕罗奥多（Palo Alto）市为例，兰德公司总部和斯坦福研究学院使用包括 LSD-25在内的精神药物，观察期效果及其催化或创造宗教和其他邪教的后效等一连串先导实验计划。

兰德公司和斯坦福研究学院都承传了高贵的谱系。兰德是战时战略轰炸调查的衍生性产品，由英国秘密情报部心理作战中心旗下的伦敦塔维斯托克诊所指导医师约翰·罗林·黎斯(John Rawlings Rees)博士和埃里克·特里斯（Eric Trist）博士建立。这次的战略轰炸调查不仅诞生了兰德，战后伦敦塔维斯托克研究学院的最高级官员也在早期阶段直接监督兰德。斯坦福研究学院也继承了塔维斯托克的血脉，成为推动威尔斯1927年所提“公开的阴谋论”宣言计画中心。

加州的这项计画与库尔特·卢因博士的网络机构有关，包括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卢因中心、密歇根大学和国家训练实验室(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ies) ，后者是一种教师协会的全国教育协会联络人。麻省理工学院卢因中心的业务就是兰德计画，包括由亚历克斯 •巴弗拉斯（Alex Bavelas）博士指导，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教授参与出席，政治学者卡尔·科尔施，以及宾州大学罗素语言学计画的产品。这些计画主要透过梅西基金会(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居间协调，该基金会是因创办梅西百货公司知名的贵格·梅西(Quaker Macy)家族的分支，亮点是葛列格里·贝特森和玛格丽特·米德等货色。乔姆斯基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包括与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人工智慧之父)教授的计画合作，由计算机(电脑)模拟所谓的“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乔姆斯基-明斯基程式在计算机上有效地模拟人类精神疾病。

直到1963年，与 MK-Ultra 等计画相关的先导计画成为业务计划。加州尤基亚谷（Ukiah Valley）开放了实验性的邪教组织，包括琼斯(Jim Jones)牧师随后臭名昭著的人民圣殿（Peoples Temple）。数百万剂 LSD-25分发给全国校园内知情和不知情的受助者，而塔维斯托克的实验性狂欢邪教计画，披头四(Beatles)，则引入美国。摇滚药物反文化计画至此全面展开。

1964年，罗伯特·哈钦斯接受福特基金会赞助计画，提出约翰逊“大社会计划”雏形的 “三重革命”。意味“网络化”自动化机器已经产生，生产力增长的速度如此之快（当时每年3%），越来越多的永久性失业人口逐渐累积，尤其是在所谓少数族群。哈钦斯的报告提出从投资生产性就业转向新的社会政策模式，将社会服务分配给越来越多大量无益于生产的穷人。

当时美国正在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 三重革命报告本身主导了1960年代初期的政策。随着约翰逊总统在1965年1月就职，新马尔萨斯政策的模式已经蓄势待发。

最后的催化剂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又译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研究开发计划的社会效应及伦敦塔维斯托克研究学院的“雷派波特报告(Rapaport Report，又译喇叭伯报

告)”。该报告令人遗憾的是，NASA 研究与开发的成就“过度”乐观诱导技术(开发)，高度重视人口中普遍的理性行为，必须停止和扭转这种赞扬科学造成的影响。约翰逊完全服从该项指令，并于1966 - 1967年开始大规模解散美国航空航太研究与开发部门，将资金转用于“大社会计画”，包括“消费主义”和“环保主义”。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转向“后工业社会“终于展开了。

1956-1958年至1960代中期正好与这段期间的另一个重要社会发展交织在一起：新左派计画，主要是工业民主联盟与国际社会主义经由国际协调、合作，先在西德，随后在美国发展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美国这项努力的共同点在于工业民主联盟（LID, League of Industrial Democracy）之前是英国费边社的傀儡组织，1930年代至40年代又成为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和戴维·杜宾斯基(David Dubinsky)的政治组织，后者领导国际女装服饰工会（ILGWU, 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杰·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 的战后营运基地。欧洲同样的政治组织由位于法国-瑞士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及产业工会联合会 (AFL-CIO,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国际部欧文·布朗（Irving Brown）代表。

这个国际网络，网罗了1950年代初到中期的“老左派”，运用他们的技能创造非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激进主义，最初则是以马克思主义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和姿态取得信任。基本上，这是一个存在主义运动，混合了沙特（Jean-Paul Sartre，当代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和伦敦塔维斯托克诊所莱恩（RD Laing，反精神医学的传奇名医）医师的思想。

美国从1930年代和40年代开始，以“重组” 托洛茨基主义、共产主义和第三阵营遗物的小圈子和小组为名，随之而来的是赫鲁晓夫在第20次党代表大会上谴责史达林，以及可预见的莫斯科-北京分裂登场。活动持续进行，1958年民权运动开始发酵，进入1960年代初的黑权运动，然后是1964年底东部权势集团领导层发起的反战运动。法国、西德、义大利等国，早期阶段彼此同时进行但是细节不同。随着反战运动的出现，彼此融合在一起，并于1968年爆发、融合。

前置作业到1968年，基辛格的时代终于来临。约翰逊当局发起的试点计画全面升级为基辛格的业务，北约则以马尔萨斯主义为其官方政策。 1969年，北约的“紧张局势”爆发，与西德、义大利、美国恐怖主义的时间一致。 1969年底，“环保主义”运动，同时在美国和欧洲自上而下风行草偃。 1969年，一个组织开始吸收男、女性同性恋的大型运动，随着新成立的“妇女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透过长期贬低他们的“灵敏度会议“，成为传播崇拜女同性恋的主要组织。

这就是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一切都和政府政策和群众行为由上而下操作范式转换(paradigm-shift，又译典范转移)一致，从而彻底改变人民群众的价值观。这是一般的文化范式转换，转向罗素推崇的“即使令人恶心也是必要手段” 的价值观。

“第三和最後的羅馬帝國”

這可能很誇張，但只是誇張，今天“西方”國家大學內部和周圍許多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甚至比目前蘇聯集團國家發現的還多。1956年以來在東歐已經引領風騷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大約在1960年代中期已經逐漸淡出，蘇聯本身的領導圈子裡尤其明顯。今天，蘇聯官員通常被列為“蘇聯實用主義者”，蘇聯教堂裡的人潮也不僅僅是坐滿，而是人滿為患。

想也不用想就知道，一些反蘇聯的重要人物非常高興，馬克思主義已經在經互會國家轉向實用主義和宗教。基辛格先生聲稱很開心，他的工作夥伴彼得·卡爾頓勛爵也是，基辛格在哈佛大學取代的布熱津斯基也同樣很高興。布熱津斯基後來也取代基辛格成為美國國安局局長。

布熱津斯基先生自己受惠於其在東歐和亞洲事務上巨大而似乎取之不盡的想像力。我們所有人的鄰居或其他有相似才能的熟人：例如，這位鄰居幾乎在任何場合都能及時發明一種論述，否則宇宙就無法存在。簡言之，布熱津斯基先生是西方非常典型的政策影響者，他們非常虔誠地希望蘇維埃帝國從內部摧毀自己，而且他們選擇靠完全想像的信仰，讓自己的願望在一臂之搖就能實現。我們希望強調布熱津斯基先生並非如此，而是他具有目前為止他所代表事物的典型特徵。

蘇聯帝國是否正如布熱津斯基先生及其同路人所堅信的，開始由內部摧毀呢？或者，有同樣想法的人，忽視了該帝國斯拉夫和伊斯蘭人口中許多文化的重要事實？他們不僅無視這些重要的事實，而且從英國教會領導層、威尼斯重要的文化研究機構，或者希臘阿索斯山修道院的學習圈子中都一樣無視。此外，布熱津斯基等忽視十五世紀末以來累積的大量文獻記載，以及目前流通的新學術研究書籍或最近在羅馬舉行的會議記錄。

關於我們現在所談的這個主題，我們採用事實的準確性和重要性，已經獲得我們所指出的各種專家承認，包括蘇聯國內本身最高級別知識最淵博、對此情況消息最靈通的學者。所有這些事實，如果布熱津斯基官方立場和關切此事的同路人不故意避開這些知名的專家，他們很容易就能取得相關資料。對於我們從這些事實中得出的結論，專家普遍認為，本書作者的評論不僅僅是“可能正確”，而且在最壞的情況下，本書作者的評論是目前值得研究和辯論的唯一假設。

目前為止，本章和前面一章中，我們已經從 “文化範式”的角度研究了西方馬爾薩斯主義的根源。亞當·斯密1759年《道德情操論》引用的加爾文主義者的論文，就是文化範式的例子，或至少是這種範式的核心。新英格蘭的埃塞克斯政治集團 (Essex Junto)家族和今日美國東部權勢集團的文化範式是另一個例子。從強調科技進步轉向“環保主義”和“後工業社會”是美國和西歐優勢文化範式的巨大變化，我們多數人都曾經經歷過。現在，我們關注的是蘇聯馬爾薩斯主義現象，已經在蘇維埃領導層和俄羅斯東正教階層中迅速發展。更有影響力的蘇維埃 KGB 官員和俄羅斯東正教宗主教(Patriarch Pimen)也是這種現象的例子，可能比伊凡·弗羅洛夫(Ivan Frolov)和其他與蘇維埃全球系統分析組織更狂熱的新馬爾

薩斯主義者。

我們今天對蘇維埃帝國內部文化發展的評論，應該與巴伐利亞西門子基金會代言人亞民·莫勒爾（Armin Mohler）博士的著作進行比較。莫勒爾博士早期是希特勒瑞士武裝親衛隊的志願者。戰後初期，他在瑞士納粹同情者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之下完成研究工作，1949年出版論文，隨後在1950年出版”保守革命”及後續的版本。這本書被視為對納粹的懺悔，這一點對今天的“新右派(new right)”更重要。這本書是產生納粹心理過程最詳細、大致準確的對照圖之一。一旦瞭解納粹思想的心智圖，人們或多或少就能夠準確預測他們的下一步和目標，以及納粹運動成熟時，這些目標將如何變化，等等。莫勒博士描述的是歐洲十九世紀流行文化的轉變，導致二十世紀法西斯主義全面出現，特別是納粹主義，與今天蘇維埃帝國的發生過程最相似。本書或多或少足以替代俄羅斯19世紀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和德語瑞士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這僅僅是比較後較為重要的部分。今天蘇聯的 KGB 被精確地描述應為“納粹國際”的組織包圍進而進行密切的大規模合作。這是一個富有而強大，遍布全球卻集中且一致的網絡，由某些西方情報部門採用納粹，特別是納粹國家安全總局(RSHA, Reich Main Security Office)第6處(Amt VI) 的機制，共同組成，作為戰後反蘇聯的戰力。同樣的，蘇聯國家安全機構也深入滲透和控制同一網絡，並應用於對抗西方。與此同時，納粹國際在1943 - 1950年間重新聚集，由強大且戰後也仍然對納粹十分狂熱的瑞士銀行家支援和控制。國際恐怖主義幾乎完全是由這個納粹國際建立和穿針引線的。它是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或伊斯蘭世界蘇菲運動中的主導組織力量，也是今日印度、中東、西歐各種世俗形式“一體化”（“分離主義”）運動中的主導力量。它與歐洲和美國的蘇菲共濟會網絡重疊，是一個名為伊斯蘭、西方以及馬爾薩斯主義者的羅馬俱樂部內部的主要力量。

西方自稱“右翼” 的人士，包括一些在官僚情報機構內部或與其相關的高級官員，堅稱納粹國際是他們反蘇維埃帝國的資產和盟友。西方某些類似立場的所謂自由主義者認為，納粹國際及其附屬單位是反蘇“即使噁心也是必要之惡的手段”。如果他們比較了莫勒爾博士保守革命與蘇維埃統治時期爆發的特殊種類法西斯主義風潮和蘇維埃帝國人口某些相關社會潮流的影響，卻對顯而易見的事視而不見。蘇維埃馬爾薩斯主義的出現，只是蘇聯帝國指揮這一趨勢的人口特徵，也是顯而易見的診斷證據之一。

除了他所有的錯誤之外，卡爾·馬克思博士其實是充滿激情的反馬爾薩斯主義者。

早在1820年代和1830年代，他與同事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就慧眼識得英國潮流中著名的自動計算機設計師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他們也與愛丁堡和劍橋學界共同與巴貝奇結盟。他們的努力產生了英國科學促進會（BAAS,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和美國分會 AAAS。BAAS 圈子不是哲學上的反馬爾薩斯主義者，但是確實認為，牛津大學、倫敦皇家學會的馬爾薩斯主義者和黑利伯里(Haileybury，又譯海利柏立)，在阻止科學研究和技術進

步方面已經做得過分了。他們與20世紀初的米爾納係數俱樂部中的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英國的科學及發展速度已經遠遠落後於美國和歐陸，戰略上陷入險境。因此，與恩格斯家族企業有關的「劍橋使徒」(Cambridge Apostles) 圈，對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之間的政治經濟學，和馬爾薩斯等人明顯的反科技狂熱完全切割。

1840年代中期，马克思在这方面受到恩格斯的强烈影响，到伦敦后，又受到帕尔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 主要情报部门的英国秘密情报局监督及大英博物馆的大卫·乌尔哈特(David Urquhart)监督。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Aveling)博士的案例强调了乌尔哈特圈子的本质。艾威林曾经是布拉瓦茨基夫人(Helena Blavatsky， 以 Madame Blavatsky 知名)旗下的神智学领袖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的情人，他与马克斯的女儿结婚前，曾经受贝赞特指引到大英博物馆与马克思一起工作。在一份幸存的文件中记录这位全能的恶棍艾威林负责编订马克思第一版资本论，并将之归功于达尔文，马克思鄙视之马尔萨斯主义者。艾威林因之与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又译约翰·罗斯金），包括哈默史密斯协会(Hammersmith Society)结交。尽管如此，1840和1850年代，马克思的观点一直都是巴贝奇及各种英国反马尔萨斯主义者的观点，在他余生和文字中也一直如此强调。

大约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反资本主义的主要论据之一，就是资本主义抵制技术进步，对世界人口造成很大的伤害。列宁也极力自称持同样的观点，他们对苏维埃俄罗斯工业技术发展的承诺，可能与早期“西方人”（如沙皇彼得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或世纪之交的谢尔盖·维特伯爵(Count Sergey Witte，俄罗斯帝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政策制定人)的形式有异，但是大方向则无不同。读者也可以回顾苏维埃1920年代的 “工业化辩论”，史达林时期的五年计划，人造卫星史普尼克或史波尼克(sputnik)等。

因此令人相当意外，首先发现前苏联工业家阿列克谢·柯西金(A. Kosygin)的女婿哲曼·格维希阿尼(Dzerhman Gvishiani)，曾经在国防部首席科学顾问索里·朱克曼勋爵(Lord Solly Zuckerman)之前担任过极端的马尔萨斯国际应用系统研究学院（IIASA）负责人，或在苏联 KGB 控制下出版的官方刊物中，阅读过伊凡·弗罗洛夫和他的圈子的极端马尔萨斯胡言。又或者，有人注意到，1982年5月10日，俄罗斯 KGB 最高阶官员东正教宗主教，于国际莫斯科和平会议发表政策演说，攻击本书作者1982年2月提出美国新战略原则，取代 MAD 并行的美苏发展部署战略防御系统(ABM,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以结束热核恐怖时代。由于其他的特征，皮门的论点十分显著，是典型的极端马尔萨斯耶稣会代言人的论点。皮门和耶稣会士以及极端马尔萨斯方济各会代言人的论点，直接照抄自伪经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创世记之书“诺斯替圣经”。

1982年5月10日皮门的教义很有趣，不仅因为他在这个位阶攻击本书作者，梵蒂冈罗马教皇科学院院士也同样发表一份声明，其中包括法国遗传学家杰罗姆·勒琼（Jéréme LeJeune）教授等人于1982年9月签字后的一个月，爱德华·泰勒博士于华府新闻记者俱乐部举行会议后，在1982年10月25日回应本书作者提出的战略学说。所以，罗马教皇科学院的耶稣会士们仅仅是攻击本书作者提出的新战略学说。另外，1982年，勒琼教授与罗马教皇科学院组团前往苏维埃拜访高层官员。

勒琼教授遵循1982年9月的声明，在法国、美国和其他地方对本书作者加大力道、不断的攻击，以同样的拟议战略原则为由，控诉本书作者是苏联 KGB“代理人”。这就是勒琼教授 - 表面上是右翼天主教徒，在遗传学中具有非常右翼的观点，实际上是苏联 KGB 的代理人？

后来，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在1983年3月23日宣布本书作者早先提出的新美国战略学说的重要部分为美国的战略理论，苏维埃自总理安德罗波夫以降大肆攻击里根的说词，与1982年5月10日宗主教对本书作者的攻击如出一辙。同样一条苏联 KGB 的线索，呼应帕格沃什会议的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巧合。苏联方面，这些发展反映出苏维埃领导层内持续不断且深远的范式转换；西方世界，部分反映了苏维埃 KGB 与耶稣会、日内瓦新教徒间的深度合作。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 又译普世教协)则和苏维埃和瑞士的纳粹国际间有深度合作。

耶稣会领导层和苏联 KGB 之间的密切联系都有书面证明。双方的来往始自威尼斯家族与俄罗斯和俄罗斯东正教统治集团的深层联系。 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教皇下令禁止双方交流期间，耶稣会士曾经在俄罗斯居住长达十年。双方的关系一部分是透过俄罗斯的耶稣会教会，即所谓的“拜占庭仪式”或 “正教徒(Uniates)”维系，而正教徒是苏维埃 KGB 与遥远西方美国联系的重要管道。耶稣会和包括苏联 KGB 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内的东正教会统治集团，共同连结东西方的“统一”网络。这是通过维也纳积极维护重要日常事务的纽带，包括诸如德国的优势力量和其他人智学者作为“异教徒”配套的一部分。

然而，虽然西方情报部门的所有上层人士（其中一些人也参与行动）都知道这件事，但安抚观点仍然保留在这个圈子里，是西方一次成功、大规模的渗透东方。压倒性的证据证明，KGB-耶稣会的交流可能完全错误；这些情报部门完全不明白威尼斯、瑞士、耶稣会以及拜占庭式斯拉夫文化环境。他们依赖当时西方没什么“可信度”的大众媒体文化，只能透过包装盒上单、易于阅读的说明传播。

这个问题的本质，西方情报部门的高层人士都知道，苏维埃领导层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不是一般所称的“苏维埃民族主义者”。根据一些最高层的情报来源显示，这些苏联圈子经常使用“第三和最后的罗马帝国”的术语。这是一个预言，从普斯柯夫的斐洛德奥（Philotheos of Pskov）致瓦西里三世(Vasilij III)（1503-1533）的信中，预言俄罗斯沙皇将统治第三和最后的罗马世界帝国。这封信是伊凡四世采用沙皇头衔的基础，俄罗斯东正教会基于此，坚持所有的俄罗斯统治者都用沙皇头衔。真是难以想像，苏维埃领导人应该是现代的无神论者，怎么可能会根据十六世纪初的宗教预言设定其现行战略？

显然，如果苏维埃政策是准确的，那么美国和大多数所谓的西方领导人，对苏联今天战略问题的看法就很荒谬，他们忽略了马尔萨斯主义思潮不断在苏联领导层和人口中增长。也许这些西方被误导的领导人已经十分依赖“打击无神论共产主义”的想法，只能紧紧抓住过去不言而喻现在已经成为神话的说法，反而拒绝承认其他更危险的来源？这不就是累积了包括勒琼博士的案例在内，诸如此类

微小但是具指标性的证据，迫使我们重新评估帕格沃什会议、达特茅斯会议和东西方“秘密外交”的宗教形式操作中，究竟是哪些人影响了另一些人？如果宗教已经成为苏联战略政策的主导手段，那么经互会本身的国家政策，是否是可靠，实际可证的事实？如果真是这样，是如何发生，如何产生效果的？

假设利用俄罗斯教会拜占庭传统的文化资源，东方斯拉夫人口坚信不移的传统，以及苏维埃 KGB 与纳粹国际的合作，能够控制包括沿着苏联边界在(欧洲)东方爆发的伊斯兰“分离主义”叛乱，现在都转而有利苏维埃？再假设苏联领导层与纳粹国际密切合作，使自己成为一种新型国际亲苏联群众运动的中心，取代旧式崩溃的共产国际？假设西方宗教领袖本身深受马尔萨斯文化范式转换的影响，他们会不会很容易被这种新的苏维埃国际宣传手段所操纵？这些问题与累积的大量事实吻合，完全契合。因此，从统计学上来看，最可能的结论已在眼前。然而，他们不仅是可能，而且可以证明是真的吗？

苏联沙皇统治世界，是最近几十年来兴起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引领我们的终点吗？这是实现罗素1920年代提出的“国际社会主义”，以及他试图为“原子科学家公报”1946年10月号撰述的内容吗？

从罗素1940年代后期提出的观点，和利奥·西拉德1958年的演说内容来看，我们很容易总结事件的总体战略。这是俄罗斯内部的事，完成苏联特色与政策的范式转换，需要更多关注。

如果参考帕格沃什会议来看目前的情况，以及我们已经知道(帕格沃什)会议的含义，我们可以公正地描述现状。当苏维埃接受帕格沃什会议的建议，以“秘密外交”形成国家战略政策，莫斯科一开始就把世界政府的观点纳入帕格沃什会议的设计、启动和组成。从1950年代末到现在，整个会议的主题特色，就是将世界分成两个，也可能是三个波斯罗马帝国模式的 “帝国”，有时称为“世界联邦主义(world federalism)”。二或三个这样的帝国应该是最多了，当然，其中一个世界政府制度会在西方出现，另一个在东方，就是俄罗斯帝国，如果有人坚持，那就是苏维埃帝国。 1972年至1973年，情况已经很清楚，即使会议外部和相关形式的“秘密外交”行动本身，在两个主要帝国之间制定控制冲突的战略方针，“缓和政策”是世界政府统一制度长期而明显的趋势。

然而，西方决策者的思想中显然尚未忘记西方精神，我们可以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UNRRA，1943-1946）时期的东欧和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波兰危机中看到。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尤其是重要的提醒。西方打算提出“新雅尔塔” 协议条款欺骗两大拟议中的帝国，将苏维埃帝国分割成小国，并借助今天所谓的“分离主义”从内部破坏。两大拟议中的帝国之间不可能有长久的“缓和政策”；其中只有一个才能成为世界霸主。

苏联领导层并没有忽视这个“缓和进程”的相关特征，且已有前例循其本能回应。

1927-1928年，随着几乎灭绝俄罗斯东正教及其他组织的消灭富农运动，当时称为“契卡(Cheka)”的苏联秘密警察拉拢财产大为减少的教会领导层成为契卡的资产，两者之间联结似乎直到1943年才受到明显的影响。当时纳粹正在为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的东征整备，俄罗斯教会已经为纳粹的攻击提供金援，一小部分尤其是乌克兰地区的苏维埃人民，首先视纳粹为解放者举双手欢迎，史达林等人对弗拉索夫(Vlasov)将军率领苏维埃军队叛逃的事态发展十分害怕。 1943年，史达林在莫斯科散步进入圣巴素教堂（St. Basil's Cathedral，又译圣巴索大教堂)，与俄罗斯东正教牧首相谈数小时，并达成协议。史达林这一方，立即定义战争为从德国罪人手中保卫圣土和祖国俄罗斯人民的” 卫国战争”。反之，教会动员人民支持战争，犹太苏维埃宣传部长伊利亚·埃伦伯格（Ilya Ehrenberg）定期投稿《真理报》(Pravda)，为狂热的种族主义者，比之于纳粹宣传头子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s）有过之无不及。

战后，史达林与教会继续相关协议，并充分结合契卡和教会的力量，试图将东正教总部从君士坦丁堡迁往莫斯科。 1952年，美国杜鲁门总统在英国协助下，阻止了这一切行动。教会在苏维埃政府中发挥作用的时期，似乎在契卡头子贝利亚突然死亡和赫鲁晓夫时代就停止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东正教会的作用在西方各机构的大力鼓吹下加快速度。西方，特别是美国，这种观点似乎毫无疑问广为各方接受；因为宗教与“无神论共产主义”相抵触，苏维埃帝国宗教组织的权力崛起和影响力无甚进展，只取得”反叛苏维埃祖国”的结果。

面对 “分离主义”叛乱的威胁，苏维埃的反应与史达林1943 - 1952年的行动如出一辙，但是操作更细腻。这些苏联领导人的意图为何，或者一些不可避免亦不可预见的后果，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不那么深刻的转变，还是留待日后由专家决定。事实是，1960年代中期至结束，苏维埃帝国领导层早已知道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力已经崩溃，所造成的意识形态真空将由1917年10月之前的残余填补。一开始只是打算利用宗教作为苏维埃内政、外交政策的文化武器，主要是接管苏维埃人民和主要国家机构，包括苏维埃外交政策机构和 KGB，形成的文化环境。

整个苏联战略是目前最清晰可见者。

因此，苏维埃领导层在军事政策方面，遵循索科洛夫斯基（VD Sokolovskii）元帅在1962年《军事战略》第一版中发表的热核战战略，其中的关键是开发大功率雷射器等“新物理原理”的 ABM 防御系统战略，是1962年索科洛夫斯基将军即已订定，也是苏联今日相对发达的系统。同时，不同于北约组织的是，苏维埃将在深层次、大规模“常规”战力维系获胜能力，陆空部队则进行核子、细菌和化学(ABC）武器部署；值得吾人特别注意的附加功能则是，大力集中建设苏联海军战略潜力。

到1990年代，靠西方不断退步到“后工业社会”，甚至伴随军事的部分一起退步，苏联的战略是为空间部署及 ABM 防御体系创造全面战略能力的条件，也为北约与盟军的胜利创造了无可挑剔的世界霸权条件。

苏联领导层的首要军事问题是，西方可能在苏联(U.S.S.R)部署战略性 ABM 防御

系统之前，就对苏联发起先发制人热核攻击的风险。西方发生这种袭击的可能性取决其中一种情形，即西方在 ABM 系统发展战略中失去了与苏联竞争的机会；另一种情形，是西方看到其未来军事防御能力已失去存在的意义，过度的绝望可能使西方不惜发动热核战，以防止苏联继续其军事建设-而不是冒险继续蒙骗。

因此，苏维埃（大概）于1980年代很关心麻痹西方政府和人民的政治心态，在这种心态影响下，西方将不得不在1990年代的某个时期，通过没有实质性的行动，来阻止苏联巩固其世界霸权。

针对后面这一点，核子冻结、和平及纳粹指导的“环保主义”运动成为苏联战略的主要资产。正如我们平日不断观察得到的结论，苏联 KGB 主要是透过新教和天主教会腐败的领导层，安排这些西欧和美国的群众运动。这个行动还有其他特点，只不过教会是苏联 KGB 影响西方群众运动的主要管道。拜占庭仪式教会负责为主要的 KGB 管道搜寻西方腐败的教会领导人，包括透过位于希腊圣山阿索斯山修道院与拜占庭仪式沟通。后来 KGB 在1970年代大规模扩充阿索斯山修道院的战略力量。

苏联目前的战略似乎没有把马尔萨斯主义推向国内，只是由 KGB 向西方出口。他们到底是真正的马尔萨斯主义者，还是 KGB 心理战剧本的一部分？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深入研究所谓的“俄罗斯灵魂”。俄罗斯马尔萨斯主义的根源，与我们熟悉的现代西欧和美国的经验、历史略有不同，两相对照更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欧洲历史，包括更深入了解产生西方版马尔萨斯主义的心态。

俄罗斯的宗教，文化和马尔萨斯主义

北方的斯拉夫部落是拜占庭一直以来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甚至超过988年基辅大王公圣弗拉基米尔(St. Vladimir the Great) 建立基辅罗斯国名义上的基督教传统。弗拉基米尔改教之前，采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主要是军事方面。最终占上风的第二种方式就是创造合成形式的伪基督教，成为在拜占庭领导下斯拉夫人民名义上的基督教基础。

为斯拉夫人编制的合成假基督教一般是诺斯替教(又称灵知派或灵智派)形式。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到帕里奥洛加斯王朝(Paleologues)，帝国法庭试图从上而下强迫人民信仰伪基督教邪教的拜占庭教会，一种罗马帝国万神殿的异教崇拜。君士坦丁任命阿里乌斯主教(Bishop Arius)是其后几个世纪的典型过程。基督教的宗教信仰普遍局限于东方使用希腊语的人口，这群人寻求维护古典希腊文学和语言，特别是柏拉图的学说。帝国法庭强制反希腊语，甚至有一段时间，还禁止教授古典希腊语，禁止帝国内有人自称希腊人或被指定为希腊人。尽管基督徒中的希腊人抗拒此事，但是顶级的教会统治集团却是狂热的诺斯替教徒，利用亚里士多德作为诺斯替伪基督教教会的官方哲学。东西方基督教会之间的真正问题，始自圣杰罗姆(St. Jerome，古代西方教会领导群伦的圣经学者，约340年－420年)和圣奥古斯丁(354年-430年)，再到1439年的佛罗伦萨理事会。

诺斯替教最危险的是一个称为(希腊正教)静修士(hesychasts)的派系，最初由君士坦丁大帝在西奈半岛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建立。伊斯兰教的兴起促使帝国的主要静修士中心转移到今天通称圣山的阿索斯山修道院。这个保持传统至今的静修士中心，目前是全球所谓“分离主义”运动的中心，包括耶稣会士指导下创造的各种 “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和“灵恩派(charismatic)”邪教。

这些异教宗教的静修士(例如，肚脐冥想者）以母神（Mother Goddess）的邪教模式为斯拉夫人建立灵恩派的伪基督教；母神今日已经在以下地区得到确认-耶稣会重复泡制的“部落主义者(tribalist)”和类似伪基督教崇拜的地区。（耶稣会士说，“嘿，伙伴，你也是以人为祭品祭拜，”实际上，“你可能不知道，这与基督教的教义一致。”）

“母神”有时称为西布莉-西比尔(Cybele-Sybil)，迦勒底人称为伊斯塔尔(Ishtar)，埃及人称伊西丝(Isis)或古哈拉帕（Harappa，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原拉维河流域、属印度河流域文明）称沙克蒂(Shakti)。这部分的异教宗教中，母神与一名男性形像有关，男性通常是阉割的冥神，如奥西里斯（Osiris），或哈拉帕的湿婆(Siva)，或埃及的三位一体伊西丝、奥西里斯和荷鲁斯(Horus)，或用于基辅罗斯伪基督教的模型，酒神(Phrygian Dionysus)（相当于奥西里斯或犹太撒旦，阿波罗也称为路西法）。随着加入静修士的神秘元素，这个异教模式就是拜占庭结合现存基辅罗斯诺曼王朝的异教文化环境。

一般诺斯替教的模式如下：以圣家族为伊西丝(Isis，玛利亚），奥西里斯（Osiris，若瑟）和荷鲁斯(Horus，耶稣）提供新名字。与异教信仰相关的传说和其他神话则归功于圣家族成员。因此，他们选用神秘的“祖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人民从祖国俄罗斯的土地神秘跳出的异教信仰，和人民集体意志表达的祖国意志：祖国俄罗斯的圣血和土壤。

虽然斯拉夫拜占庭式的教会花了大约一千年的时间转换信仰，但是所谓的老信徒（洛斯可尔尼基教派 Raskol'niki，教会分立派）反抗人数在沙皇彼得一世(1672出生，1682-1725年在位)期间第一次达到高峰，这说明俄罗斯圣母邪教崇拜十分有效地渗入不属于任何教会，甚至自认是无神论的人群。 17世纪晚期，教会领导人提出要清理俄罗斯圣经中最腐败的思想，导致老信徒群起反抗。当时彼得一世拒绝当罗马、拜占庭二大帝国之后的第三帝国(俄罗斯帝国)沙皇，试图“西化”俄罗斯，从上到下开始清理教会统治集团的腐败，包括洛斯可尔尼基教派爆发大规模自杀的宗教冲突，大概四分之一以上的俄罗斯人口卷入了这个野蛮、怪异的邪教现象，使得臭名昭著的吉姆·琼斯牧师(Rev. Jim Jones)率领的人民圣殿教出现大规模自杀(900多人)似乎有一点小巫见大巫了。

十九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又译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著作，特别是他的《罪与罚》，对本世纪洛斯可尔尼基教派的环境感知图有深入的描述。洛斯可尔尼基教派传统的另一位使徒托尔斯泰(Leo Tolstoy)伯爵，更是直接呈现马尔萨斯主义洛斯可尔尼基教派版本的意涵。人民意志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刺客、虚无主义者，描绘了洛斯可尔尼基教派另一场暴动，犹如本世纪民粹派的所作所

为。莫斯科俄罗斯社会民主运动基本上是洛斯可尔尼基教派重返该市，与当地轻工业建立关系的产物。布尔什维克饱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就像波格丹夫(Aleksandr Bogdanov，俄罗斯科学家)、克拉辛(Leonid Krasin，苏共外交家)和别尔佳耶夫(Nikolai Berdyaev，俄罗斯政治宗教哲学家)的情形一样，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苏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列宁评价他是苏联共产党中少有的理论家)也如出一辙。布尔什维克关于解决农业问题的方法主要是采用邪教公社的形式，直接从俄罗斯圣母“血与土”的洛斯可尔尼基教派理论流入俄罗斯。

1905 年的俄罗斯革命，其中威尼斯帕尔乌斯的代理人，托洛茨基，扮演重要的角色，整体上是洛斯可尔尼基教派形式、内容和灵感的暴动，一个十八世纪凯萨琳二世时虚构的洛斯可尔尼基教派普加乔夫一连串农民暴动(Pugachev Revolt, 1773-1775)的复制品。同样的文化环境是 1917 年革命释放的群众力量，由列宁引导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国家的初始形式。

仔细观察“第三罗马预言”的情节和内容，表明这样的宗教预言可能持续以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方式存在，以大约五百年的时间深深地埋入拜占庭文化的斯拉夫部分。

俄罗斯第三罗马邪教组织在 1439 年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第一次表明立场之后爆发。君士坦丁堡帕里奥洛加斯王朝大公宗主教前往俄罗斯报喜，拜占庭通过“尼西亚信经”版的和子说已经愈合东西教会的大分裂(Great Schism)。他的俄罗斯同袍几乎对他处以私刑。他们指控他与腐败的第一罗马签署叛国协定，而第二罗马(帕里奥洛加斯王朝的拜占庭)也接受了这一现实，表示第二罗马现在和第一罗马一样烂。

且先跳过宗教教义片刻。问题的症结是拜占庭俄罗斯对西方仇外心理的暴力与种族主义。这种在二次大战期间从伊莉亚·艾伦伯格(Ilya Ehrenberg，俄罗斯作家)邪恶的嘴里吐出的仇外语言，在纳粹般俄罗斯圣母神圣血脉和土壤邪教教义中有其宗教基础。这是俄罗斯神秘主义的精华，当洛斯可尔尼基教派经过好几代之后，其抗议者仍然提到“俄罗斯灵魂”时尤其具有特殊含义。这是俄罗斯的浪漫主义，与德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产生纳粹现象具有相同的涵意，都深深地依附于任性、非理性的感官生活。

洛斯可尔尼基教派是狂热的唯物主义，也是狂热的享乐主义。他们的神（女神）是土地神；他们的神秘主义、灵性最终是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 连结不可知的个人非理性意志，和某种不可知、全能之物，随机连接个人的行动和非理性意志，终致成为一个宏伟的设计。即使史达林也不能以政治领袖的身分统治俄罗斯，只能像他之前的沙皇，以“小父亲”的身分统治。克拉辛等人将列宁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是认为未来的科学会使列宁重生。

因此，洛斯可尔尼基教派的暴动也不令人惊讶。布尔什维克主义从一开始就适应了洛斯可尔尼基教派是反对沙皇“西化”倾向、维特(Witte)等人的一种群众力量。列宁等人试图“节制”洛斯可尔尼基教派的影响和意识形态，使布尔什维克版本的“西化”可行。与洛斯可尔尼基教派相关的意识形态从未缺席。由于马

克思列宁主义被削弱，洛斯可尔尼基教派所代表的古老文化环境就浮出表面了。

从这个角度看，小罗斯福总统对史达林的态度或许很巧妙。他基于苏联急需西方技术援助，提供苏联向西方开放的机会，取得苏联完全的合作。罗斯福突破拜占庭斯拉夫人因仇外心理而陷于隔离的状态，允许俄罗斯以他们自己的速度和时间，以列宁提出的“美国方法” 执行“电力加苏联”的建设。西方不用罗斯福的长远观点，反对罗斯福的做法，加深了俄罗斯对西方的孤立和仇恨，玩了个“黑脸白脸”的游戏，而这个“帝国”游戏-罗素的游戏- 提供苏联领导层早期进行热核战为唯一可供替代的状况。

这就是西方，罗素等人设计邪恶游戏，玩弄俄罗斯拜占庭式文化环境中的千年发展潜力提出了洛斯可尔尼基教派浪潮之后，酝酿出布尔什维克良知的第三罗马潜在能力。他们的努力非常成功；西方在罗素等人的影响下，成功地在苏维埃人口和领导地位发挥了第三罗马的潜在能力。

马克思主义文化环境的列宁主义者是我们可以成功谈判的对象，长期而言会有好处，因为他们反对马尔萨斯主义和“西化”。列宁本人，通过他个人信任的密使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在 1922 年签署了拉巴洛条约(Treaty of Rapallo)。诚然，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认为牌就是列宁和契切林在玩：关我啥事！这本来就应该就事论事，不是因为各种直接、间接的威权身份而挑东捡西的拒绝。查理曼时代以来，西方文明最为强调的问题就是打破东欧、巴尔干等拜占庭文化环境的力量。一旦东方接受并融入了技术进步，作为合作的基础，东西方彼此互利，我们也可能从东方获利。

实际上，我们做的一切就是精心安排苏联周围的环境，制造《怪物》（Frankenstein's Monster）。我们盲目愚蠢的支持一个“宗教”只因为它是“宗教”，不曾检验该宗教的内涵，或者人类历史迄今是否曾经出现- 诺斯替式的伪基督教形式，以及异教徒的前身- 我们摧毁了一个弱势、无能的对手马克思主义，以一个强大、更致命的对手，俄罗斯围绕第三罗马的教义动员。

他们讨厌我们，因为我们是“西方人”，就像普斯柯夫的斐洛德奥在 “第三罗马”预言中所述。他们利用我们自己西方教会的诺斯替潮流，帮助他们从内部摧毁我们，并与苏菲共济会网络和纳粹国际结盟，形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我们认为是对付他们的有效工具。我们创造的这个《怪物》，藉由向其他国家提出新罗马帝国的问题，此提议正好凸显“第三和最终形式罗马帝国”的全球规则。

因此，我们即将结束罗素世界帝国梦想的“国际社会主义”宏伟梦想。

4. 火星上的森林和城市

想像一下，从现在起六十年的火星，每一平方公里土地的树苗，每一棵树都有一米高。这是“科学小说”吗？除非热核战争摧毁文明，或是新马尔萨斯政策造成饥荒和流行病，否则2030-2040年代之间，人类应该会开始大规模殖民火星。

1960年代末期之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又译美国太空总署）已经掌握在火星进行人工探测所需的知识和科技。今天或者在十年内，已经解决了殖民火星的两大难题。

第一个是改善能源供应，为空间飞行提供动力，同时提供每个人充沛的能源，维持附近行星类地球的人造环境。目前为止，载人飞行器到月球，或机器人卫星到火星和更远的星球，弹道轨迹已经做了轻微调整；星际载具在大部分时候都以惯性(滑行)行进。反之，假设做一些调整，让航太旅客旅途中更舒适，为他们提供产生地球重力效应的空间载具净加速度：假设地球到火星旅程前半部，宇宙飞船速度每秒增加32英尺；或者，略作调整，只加速前述的一半。载具大约在行程中点，以相同速度减速。则旅程可以从几个月或更久到目前的数周。

如果提供每千克空间载具的加速度不大于汽车每小时从0到100公里的行进，并且每秒、每天、每周都维持这种加速度，则该空间载具速度称为“相对速度”。空间行程越长，载具行进的平均速度越高。问题是，如何取得恒定的动力来源，提供持续数周以上的加速度？这是1960年代就已知，今天已经将近实现的答案，就是受控热核聚变。本章一开始就已表明注意到这项科技。

受控热核聚变是所需能量的来源，以保持月球、火星或其他地方的类地球人造环境的诸多特征。

受控热核聚变还有其他任务：成为高能源通量密度，激发和放大高功率镭射及相对论电磁系统的来源。今天更强大的雷射器需要建筑物大小的配件，是因为可用能源的能源通量密度非常低。例如，以能源通量密度小的核裂变爆炸为 x 射线雷射器供电，就大为降低大功率系统所需的镭射系统。在人类操作者受到充分保护之前，不十分建议以小型核裂变爆炸程式作为动力来源；只有在太空中操作机器人设备时才会使用。透过受控热核聚变获取更高的能源通量密度，与核裂变情况相比，人类的隔绝问题相对微不足道。

大功率雷射器和相关类别的器材在太空殖民中，几乎不可或缺。雷射器的三种属性，可以提供所需的极大优势。首先，和一般电气室的电流一样，雷射光束是单色的：光束传输的能量不是数个混合在一起，而是仅由一个频率的波束传输，波束的振荡峰、谷值一致。这种连贯的单色光束是可用能量传输的最佳组合，也没什么浪费。因此，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光束，雷射光束可能具有千倍或更高的效率。第二，雷射光束不会像一般的电磁辐射扩散，光束透过介质（例如空气）传播时，频率可以调到几乎没有消耗什么能量，却几乎可以将所有能量传送到选定的目标，产生类似冲击的工作。第三，雷射光束具有“自动聚焦”的特征。以与无线电台广播波束调律相关的方式，将雷射光束的波长调到与其撞击物体共

鸣。一般来说，频率越高（波长越短），雷射光束共鸣目标的面积越小。

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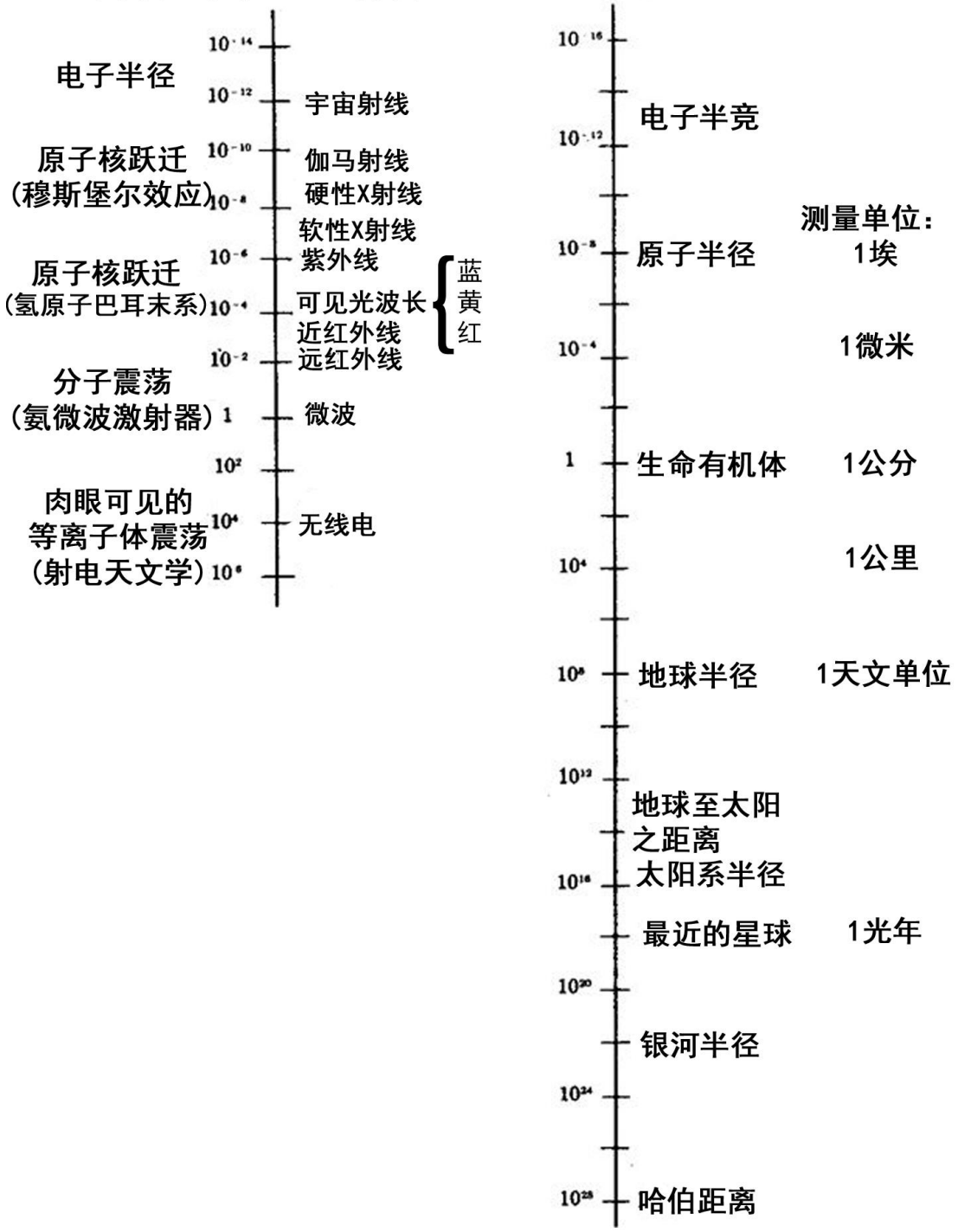


表 4 中，假设类雷射光束输出的功率相当于每平方米 1 瓩(千瓦)。如果同样的功率集中在较小的区域，会产生什么变化？大致上，可以用放大镜聚焦阳光后，点燃纸张比较其效应。接着，聚焦到更小的区域以提高阳光的温度。因此，不禁会问，当每平方米 1 瓩的功率集中到越来越小的区域，直到电子半径时，温度会升到多高？然后，如表 3 所示，重复比较光束的功率相当于每平方米 10,000 瓩燃煤工业能源的能源通量密度；最后，比较已知温度最高的太阳和恒星。

表 4
雷射光束聚焦提高的温度

	1 瓩	10,000 瓩
雷射光束在每平方米 1 瓩和 10,000 瓩之温度	90℃	3,000℃
光束聚焦在 1 毫米之温度	11,000℃	110,000℃
光束聚焦在原子的原子核上之温度	36,000,000℃	360,000,000℃
光束聚焦在电子半径(4.6×10^{-15}) 之溫度	8,000,000,000℃	80,000,000,000℃
比较恒星的温度：		
太阳表面		6,000℃
太阳内部		15,000,000℃
爆炸的超新星		2,500,000,000℃

这二张表相当粗略，但是从大功率高频雷射器和称为相对论粒子束的器械得到相当有用的初估数据。宇宙中没有已知的材料足以抗拒进而传输功率这么集中的光束。原则上，人们可以利用这种科技，利用太阳或恒星打洞，效果不输宇宙射线。更实际的是，随着这种科技发展，有能力控制物质转化，为人类提供了最有用的工具。

热核聚变和类镭射科技，在许多方面非常相关。受控热核聚变的指示装置，系经正确聚焦、适当调校的相对论性射束(relativistic beam，天文学专有名词)产生，而受控热核聚变又是这种光束的理想能量源。使用这种组合科技的趋势，是从取得热核聚变的总能量中减去生产热核聚变所需能量，并使用以相对论性射束作为生产基本工具的净能量，等等。一个为人类开启融合束(fusion beam) 科技的新时代于焉展开。

除了融合束科技本身，物理科技的突破加速了医学和生物科学的进展。空间旅行、在遥远的行星生活、不同重力、人造地球环境中的条件，创造了医学新领域，以及在这些旅程中陪伴人类的各式动植物的生命；副产品就是加快医学进程-达到模态预期寿命120-140岁，却没有今日组织老化的退化。

即使空间旅行者离开地球轨道航太站到达火星之前，他们搭乘的太空载具，抵达目的地前，也有许多人造地球环境的特色。对于长达数周和数月的空间旅程，进入了无法解决现有生命支持系统，以及存放月球旅行用品的工程和物流问题。旅客吸取的空气必须以处理二氧化碳地方式制造。供水和食物必须在太空载具上制造，至少是消耗大部分食物的最大部分。

表5列出一名成人每周平均消耗的氧气、水和固体食物所占的重量和空间。

表6比较升到太空轨道的人数及每人搭乘太空载具的重量，并比较火箭发射系统升空前的重量，及进入地球轨道及登陆月球的载具及乘客数。最后，该表比较100公斤的载具，从地球轨道往返月球轨道和回返地球所需燃油重量，加上从地球进入地球轨道，以便展开前述往返行程所需燃油的重量。殖民火星，或者往返火星数周旅程补给的生活必需品，不同于二战期间向南太平洋的美军运送物资。

表 5 太空旅行者每周基本消耗氧气、水和食物量	
氧气…….……...	5.6 Kg
饮水…….....…	15.4 Kg
其他用水…….……..……..……..…..	14.9 Kg
食物...……..	4.5 Kg
每人每周总消耗量…….…	39.5 Kg

表 6 地球至月球所耗用量	
單人搭乘水星航太艙的重量	1.3 公吨
3 人搭乘阿波羅登月火箭（包括指揮艙和登陸載具）的重量	45 公吨
土星五号火箭发射阿波罗登月火箭的重量	2,740 公吨
向地球轨道发射 100 公斤载具所需燃料	约 2 公吨
往返地球-月球的 100 公斤载具所需燃料	约 6 公吨

前文提及，人类已有足够的能源供应和融合束科技时代所需特殊的工具。以这种科技加上 1960 和 1970 年代已有的技术，可以在月球上建造太空载具解决部分殖民的后勤问题，并前往火星。定居火星的准备阶段，最佳方案是在月球上建立开发和制造过程，并建造太空载具，例如从地球轨道前往火星轨道。克服月球重力的代价远小于等重的太空载具前往(地球)轨道时所需克服的地球重力。

假设 1990-2020 年间殖民月球，建立大约一百万人在月球上生活和工作的水准，则地球轨道和月球轨道上的载人航太站，随时都有数万人执勤。在月球工作的初始阶段，将透过融合束时代的科技，以月球上的可用资源生产、开发和扩展月球本身的生命支援系统。 2010 年左右，月球的工作重点应该可以转移到生产在太阳系旅行的载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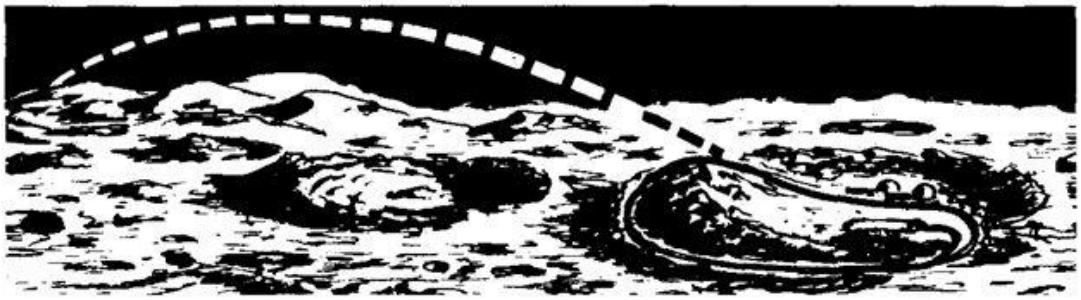
在月球工作的最初阶段，必须掌握生物科技，生成月球上殖民者所有的食物需求，并以之作为改进的基础。这段期间，也要开始在月球上种植包括树木在内的各式植物，以及老鼠、鸡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动物。

进入更深层的空间之前，必须对月球和地球轨道站彻底研究，探讨殖民附近空间时应考虑的各种生物学可能性，包括空间旅行和远方殖民时，可能出现的医学特殊问题。最重要的是，深入研究空间生活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动物在低重力状态人造地球环境中的妊娠和生产的相关问题。

由于大量使用进步的科技，能源供应相对丰富，科学家和管理人员最苦恼的事项之一，则是利用更大的能源通量密度方面的生物进程不佳。这不能怪地球的植物物种表现不佳；本章一开始，就指出太阳能是相对非常不利的能源。太阳能的质量差，地球植物本身却不得不适应。尽管植物在太阳下受苦，必须庆幸地球植物“发明”了叶绿素，人类才能透过整合叶绿素，建构生物圈。现在，人类必须以某种方式和植物沟通一个好消息，也就是人类会提供友善植物所需任何形式的能量营养，提供植物更高的能源通量密度，。简而言之，必须加快有用生物质的繁殖率，特别是食物。施韦特·李比希(Schwedt G. Liebig)和巴斯德(L. Pasteur)等化学家，已经在 19 世纪上路了；如今进入融合束科技时代，必须沿着同一条路向前跨一大步。

殖民火星的第一步应该从2025年至2035年左右开始，如果科学和经济足够进步的话还可能早一些。 2025 - 2030年的融合束科技和生物物理科技，定居火星的准备工作会比三十年前殖民月球更省事。一方面，火星已经有了一层地球标准的稀薄大气层，还有一些原料供殖民工程师展开。适当的时候，还可能建立火星的大气层，但是可能从人造气泡覆盖的农工业综合体环境开始，农业则主要是无土种植的水耕法

来自地球的殖民者不会因此满意。人们想要听到孩子的声音：”但是，爸爸，树木在哪里？”并预知孩子的提问。火星上会有一、两座森林，只因为人们喜欢树木，真正生活在一起，唱歌的鸟儿等等，把奇怪的星球经营得更像个家。这一切也许对太空殖民者来说，有点奢侈，但是不是浪费；如果经过适当的选择和生物学训练，树木对环境非常有用。无论如何，人造大气层大约需47%的标准相对湿度，气泡覆盖的人造环境是控制降雨的极好条件。



大部分殖民火星所需要的东西都会在月球上预先制好。
由于月球的重力很小，从月球运输到火星消耗的能量很少。

以目前地球的标准，在火星建立农工联合企业将会非常昂贵。不过，不用担心，成本是相对的概念。从社会的角度看，真正的代价，是满足特定消费性产品的总劳动力百分比。五十年后，成年人完成工作的平均能力应该增加约十倍。以美国为例，全面引入镭射科技，西元2000年之前应该有三倍的飞跃。虽然某些领域可能会改用成本相对较高的材料，但是人类增加的劳动生产力将是只赚不赔，因此，从现在开始的往后五十年人类应该可以支出今天的八到十倍。五、六十年后，地球应该有一百万人左右移民火星。这段过程可能在二十五年后就会发生；今天其实不需预测确切的时间间隔，和确切的人口。

地球-火星间的移民规模，应该就是十九世纪移民抵达纽约艾利斯岛的规，过境点是十九世纪中叶海洋航行的范围，旅客感觉最舒适的状况。为这项大规模的移民组装太空载具的月球子组装厂大概就是远洋邮轮的大小；由于经济原因，这应该是理想的规模。

从地表经济的角度看，移民的主要成本，就是将乘客从地球表面运送至地球轨道上空间终点站的费用。地表经济的另一项主要成本，就是结合核心生物科技，运用融合束科技生产资本财＊后，再送入太空。地球-火星移民过程的余料，则可建于月球上的轨道实验室工厂或火星本身，成为有条理的先驱。

火星殖民者的工作一开始就相当先进，会让自己处于最佳状态，扩充人造环境和设施，以适应地球的下一波移民潮。如果问这些殖民者为什么要移民，许多人会引用纽西兰探险家艾德蒙・希拉蕊爵士 (Sir Edmund Hillary)的话。他回答人们问他为什么攀登珠穆朗玛峰时，说："因为山就在那里。" 至于他们的工作，答案将会是："乐在其中"，其他人可能会说，殖民火星是前往更远大目的地的垫脚石；这应该更贴近真相。

初次抵达火星的地球人将是探险家，提醒我们之中最老的人，回到五十年前，美国海军少将理查·伯德（Richard Byrd， 20世纪航空先驱者，极地探险家），从一个叫做"小美国"的小小定居点传出他的声音，他在南极待了一整个冬天。一旦地球上的人收到来自火星的第一个影像广播，许多人的希望和想像力就会转向火星。第一个定居点将由月球上为此制作的预制组件主导，然后随着勘探范围扩大，殖民地的人造环境扩展时将开始自给自足。

殖民地移民扩张的速度是劳动力函数的规模，同时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人均成长率也会随之增加。换句话说，火星殖民地吸收新一轮移民的速度将以健康的有机体方式呈几何成长

本书作者将在今日已知的基础上为火星设计定居点，并检视暂定设计的重点，以为说明。

设定火星定居点应该参考今日地球，兴建城市或城镇的地方：像蛋糕一样一层一层，人民居住和工作场所在上层，运输和基层服务在下层。城市或城镇从下层往上建造；所以，建筑商只需在一个多世纪后维修。和月球上的情况一样，在某些情况下，整个城市或城镇都会建在地下。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太多变动，城市的蛋糕层设计会继续下去。

如果不考虑彼此相关的物理和拓扑理论，城市或城镇整体的基本设计是循环的。城市或城镇的中心是森林公园，园内有科学和相关的教育中心，沿着公园的圆形边缘，是城市的主要行政和文化功能。圆形区域的外缘则是"在地表工作"，服务对象将沿着大街，以半径方式，从公园向边缘分布。

在目前可预见的情况下，太空殖民地的人民都生活在人造地球般的环境，所以兴建城市首应考虑安全原则。假设一个泡泡覆盖一个城市，必要时，一个城市

可以建第二个泡泡，中央公园区可以主泡泡与一般居住环境隔绝。每个住宅结构和居住单位都能够独立进行集中维修，如果一般服务临时中断，单位内有临时备用的紧急生命支援系统；城市交通和地下服务层也设有紧急应变区。城市应该尽可能具有防火功能，以内建、方便和有效的方法，避免当地火灾和和其他可能临时污染人造环境的影响。

火星殖民将以这种泡泡的网络形式进行，泡泡间透过两层纽带联系，上面一层运输人员和货物，下面一层提供服务。一些泡泡适合设计成住所、科学、教育，管理和栖身中心的城市，包括纳入人造城市“工作区”周边的行业。除了城市泡泡之外，也有工业和农业泡泡。每个泡泡都是一个活体器官，会与其他泡泡多重累叠。

磁悬浮载具是交通系统的主要特色，无论是单独或连结都能自给自足。

未来的殖民城市设计师可能会设计出与此不同概念的城市，但是与书中所述理念相似。人类仍然是人类，社会也将继续是社会：基于这些考虑的原则，变化不会太大。除了精益求精的方向，精进在几何物理学的知识，其基本原理也不会有大变动。太空殖民地即使现在不是以这种方式建立，未来的城市将与今天地球上的城市类似。

因此，2100年之前，火星上可能会有好几千万人口。在此之前，人类可能越来越忙于一个更具挑战的可能性，土卫六「泰坦」（Titan），大约是地球大小的土星卫星。

表面上，分析航海家(Voyager 又译旅行者)号传回来的报告，现在如果住在泰坦将会很不舒服；不过，这里有理想的重力，相似的大小和大气中的化学成分，不过目前可能还不适合人类呼吸，却是希望转换现状非常好的地方。在能源密集、高能源通量密度等方面，到21世纪中叶，才能够按照想要的方向，开始转变泰坦的大气和地表，因此称这个行星“与地球十分相似”。从今天的来看，21纪中叶发展并提升融合束科技和生物科技水准，似乎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转换泰坦成地球可能是下一世纪比探索附近的星球，金星，更有吸引力的议题。

对这个计画来说，转换泰坦成地球的后勤行动基础可能不是火星，而是地球附近的好友，月球。当然，火星比靠近泰坦，但是月球和火星的重力差异是决定性的经济因素。此外，21世纪中叶时，月球的采矿和制造业将会发展良好。也许，地球的宇航员主要都是从月球上的众多殖民地和月球、火星周围的绕轨站招募而来。上述都是一些知识性的假设，也可能是今天可以提供的最佳假设。

也许会有一些笑话，它们将太空客轮的船员描述为“疯子”，也指的是生活在低重力环境中的植物、动物和人实体被拉长。至少，这符合今天到21世纪中叶民众流行习惯的延伸。

不久，地球应该会以大约两位数的飞跃方式，部署机器人探测器到太空。也应该有能力组装核动力机器人探测系统，探测太阳系星际及行星轨道上方平整表

面的邻近空间。理想的是一个宇宙飞船，将机器人观测站部署到轨道上绕行的行星和卫星。附近的月球及地球轨道空间站，每天将从探测器收集资讯，传输到地球的接收站。

随着融合束科技的发展和生物科技的进步，太阳系和其他星系也会成为人类的后援基地，月球的工厂可以协助组装近乎小行星的太空载具。每一个载具都可以加速到极高速，前往固定的目的地，或者沿着太阳系定义的核裂变发电空间站的行星和卫星轨道运行，形成自给自足的空间探索小社会。虽然通讯会延迟，但是与人类的经常性沟通还算有效率。

这些太空船将成为探索空间的载具，是著名的加斯帕·蒙日伯爵（Gaspard Monge，微分几何之父）和拉扎尔·卡诺(Lazar Carnot，法国数学学家)领导下的巴黎综合理工大学(École Polytechnique，法国名校中的名校，也是法国重要的工程师学校) 时代空间版，是生物天体物理学探险，也是在附近空间指定路线移动的生物天体物理实验室。探险家将研究任何可能是地球形式的行星或月亮，利用机器人探测器一探究竟。

这些太空船将由数十名科学家、宇航员，及他们的家属组成。每个人都是飞往空间的大学社区一员，与人类文明的主要中心进行直接的或中继的交流。旅程可能长达好几十年，所以探索载具可以是二车或三车一组，彼此之间的距离在几天之内。这是已知的推定，不是肯定而快速地预测；不论是否假设，要为同样的目的，在载人探索领域尽力。

就像其他开创的事业一样，太空时代的先驱是年轻人的职志，届时将从地球上选取具有开拓所需的教育和技能且有前瞻思维地年轻人，前往月球和火星展开殖民。早期阶段每年选取几百到几千人，之后，就是好几十万人，再更后就更多人。月球、火星，探索性的太空旅行，以及与地球十分相似的土卫六「泰坦」和金星等诸多挑战将日益增加。 21世纪末不久的将来，生活在地球以外的人类将占人口的最大宗。

为什么要这么做？ 21世纪往后如此发展的目的为何？因为艾德蒙·希拉蕊爵士认为“山就在那里”而登上珠穆朗玛峰？因为好奇、爱冒险？还是就能力所及，希望在荒芜的行星和卫星之间传播生命，让地球在宇宙中不那么孤独？不再热爱生命？当然，在很多情况下，也许可以享受不必待在“过度拥挤”的地球，征服一个不太拥挤地区的挑战。

科学家中最深刻的思想家，会将这一空间力量引向宗教目的，与圣奥古斯丁坚持在尼西亚信经†中插入和子的重点一致。[1]

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同样的心灵创造力，人类在地球上可以增加三位数的潜在相对人口密度，使人类能够更加完美地发现宇宙是以一个整体组成。对于接受

[1] 381 年所頒訂的「修訂版尼西亞信經」，是東西方教會的共識，具有大公性及普遍性，也是教會在基督論教義上的典範。

和子学说的宗教思想家来说，道(Logos)是反映宇宙合律的更高准则，有人翻译为“圣灵”。道不是修士在修道院避静冥想后的智慧；而是指导采取行动或劳动的知识。对于引导进行劳动的知识，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

人类没有必要事先知悉”道”的引导在太空的作用。太空探索后，才觉察到，只在这个星球表面，无法有任何新发现。才知道对宇宙合律的认识有缺陷，也是宇宙探索的实际原因。从 NASA 的成就来看，在准备探索空间的过程中开发的一切，对地球上的生活条件各方面都有直接的好处，对某些人来说，就有足够的动机。至于其他人则会受到需求驱使，想要看看人类因为探索宇宙的努力，所增加的能力和知识，会为人类带来哪些作用。

天文学在人类文化史上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从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的时代开始，到后来的高斯（Karl Gauss，1777-1855，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大地测量学家）尽其一生，已经知道，类似印度吠陀（Vedas）经典，从口头传说的史诗到书写形式，都包含20多万年高度精密计算的天文周期。开普勒的太阳假说是库萨枢机主教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前提出太阳假说的改进版，这个假设已经在但丁《神曲》的“天堂”中发现，也是建立详尽的现代数学物理学的基础知识。当谈论根本的真理时，讲的是更高的真理，向上指向星辰。

可以从哪里接触到星辰？

个人的生命短促。如果像休谟、亚当·斯密、边沁和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等人，坚持将生命沉溺于个人的苦、乐，那么生命的苦、乐回忆，除了与死亡一起埋葬之外，还留下什么？这些人在道德上像野兽一样来去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他生活的意义也无益后世。

有利于后世的本质是什么？是建筑物吗？良好的建设可以为后人服务，并贡献更高的目的。然而，一旦建筑物随时间腐蚀之后呢？还有什么是持久的？如果持久的不是”物质”，那是什么？

持久可以提升文化，进而改善后来者的创造力。向上的心灵力量，可以提高潜在相对人口密度。虽然培育道德可能要诱之以利，但是物质利益的进步不是道德上的根本提升。潜在相对人口密度随之提升的重要性，在于这种潜在进步的一致性，证明了创造性发现和决策，提供人类实践变化的方向，与宇宙合律一致；也说明运用某种不断演进的方法于创造性发现的方向与宇宙合律一致，在某种程度上与道一致。心灵的创造性过程是青出于蓝的传承，显然是文化的与时并进。

尽管期望后来者超越，也希望同时取代陈旧、过时之物。凡是贡献这些基础者就是度过了有意义的人生。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乐趣呢？真正的乐趣，不正是人死后知道其生前作为有助于人类的生活吗？真正的乐趣不正是秉持良心，凭良心做事的时候吗？

这种乐趣有许多种形式。发挥孩子或青年的潜力，是一种重新发现的乐趣，

也是孩子或青少的初体验，是从发挥能力成就善事中取乐。此外，如果教育过程是基于学习发现的原理，儿童和青少年正是创造性判断的可靠指标，也是他们学习理性的喜悦。工厂工人可能从事重复性的工作，但是也有可能透过创造性的努力，参与令人开心的创造性工作。养育有创造力子女的父母，将会更开心他们的子女对人类创造更大的利益。

人类文化无论其贡献为何，都有好处，尤其是影响社会制度。社会更能促进和培育每个成员的善行，若是没有价值，则会滞碍难行。因此，社会进步可能保存了这个人贡献的一千种善行。

在离开这个话题之前，不得不以严格的方式重申同样的观点。未经严谨证明之前，没有对全人类一体适用的原理，然则，前面所提创造性发现的原理又是怎么回事？

所有严格科学形式的发现都以三种可能的形式展现。每一种都是实证的假设。以下是这三个不同的假设水准：

1. 简单前提(Simple Hypothesis)。形成简单前提时，假设现有的科学知识大体上正确，而且与科学相关的特定知识总体上也正确。另外，假设有人对新增事务提出合理的解释，则其说词不能与相关事物的现有知识，出现原理上的矛盾。有人制定了前提应该可以广泛描述为与现有科学知识严格一致。

2. 大前提(Higher Hypothesis)。与简单假设相反，大前提是与科学革命相关的前提，人们认为科普知识的基本假设有一些明确的根本性错误。有人选择一些实验测试，适足以证明该项假设确实有误，反而另一些假设正确。

3. 假定前提(Hypothesis of the Higher Hypothesis)。首先假定连续的科学革命与可证明为知识的进展连结，然后展开以发现为目的的研究，找出一些共同的发现原则。这种过程，适用于现有科学知识水准的发展，预期会产生假定的前提，引导科学革命成功。

就目前所知，柏拉图首先提出其间的区别，并将假定前提加入他的著作《蒂迈欧篇》[2] 的方法论原理。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苏格拉底将上帝命名为“作曲家”，并向参与对话的哲人提议，请他们审视已知的宇宙原理，进而了解宇宙是以现今感知的次序呈现。柏拉图以大前提的前提处理几何的基本原理，在对话结束时，将大前提的前提原理与道同等看待，并说道是作曲家的意志，与作曲家同质，是基督教神学众所周知的同构原则。

例如，若望福音中，上帝对道的方程式是太初就有的，是同质的。圣奥古斯丁后来强调，道从基督流出，就是从神流出。如果西方文明对人类有积极的贡献，那么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受圣奥古斯丁强调和子说的影响。

[2] 蒂迈欧篇(Timaeus)以对话形式，阐明宇宙的真理，是古典哲学中有关宇宙论的重要著作。

如果要实践神学，人们的核心要旨必须致力于“效法基督”，就应该要发展和应用他的潜力，以使道通过人流向指挥行动。这就是人的概念，也是六合之内对人的概念，从而达到了西方文明的发展高峰。这说明人的生命神圣，注重发展每个成员的潜力，也提供个人机会，充分发挥潜力展现丰富的成果。

在此并不要您改变任何特定的宗教信仰。只是说明基督教中对人的观点，也是人在六合之内的观点 - 至少是基督徒接受并实践的信仰。更广泛地说，这表示第一，认识到生命优于无机物质；第二，人类生命神圣，绝对高于所有其他形式的生命。最后，这种高度认可人类心灵创造力的神圣品质，与透过道有意识地发现和有效管理。

除非接纳和分享人的观点和人在宇宙中实际行动的观点，否则只是道德的野兽，尤其当接受休谟或亚当·斯密要求道德上漠不关心的更高准则或者是亚当·斯密1759年”道德情操论”所述内容，就更像野兽。

为了满足假定前提理念中的原理，必须不断地开发大前提，相当于人类知识中，科学不断革命带来的进步。因此，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为文化贡献一些持久的价值。这个活动是乐趣，也是最大的喜乐之源。

这种喜乐不是枯燥乏味、蛋头学者般对拥有知识财富的沾沾自喜。这种喜乐与人类全力培育未来世代内部的神圣潜能的努力有关，这是热爱人类的快乐作为。没有爱，知识就是死的。

这种对生命的热爱也适用于每个出生的孩子，更及于整个人类的生命。

有人低声说道：“医生说他病入膏肓，十分痛苦。”

另一个人可能会说：“为什么只是为了活几个星期，就让他继续受苦？”

这些傻瓜！谁会扮演神，拿人类的生命开玩笑呢？他们怎么知道剩下的几天，濒死者可能会为生命如何奋斗呢？即使家人或朋友一句关爱的话语，都可能对人类发挥很重要的效果。

“但是，他不只是感觉到痛苦，而是很痛苦。”

他正与疾病奋战。他正在为生命奋斗，决心为全人类征服这项疾病，以增添拯救其他同病相怜者之知识。他是所有士兵中最勇敢的，甚至将他最后几天的痛苦，转化为对全人类长久的价值！

“也许你说的是真的，但是谁会记得他小小的部分？他微小的贡献值得他忍受的苦痛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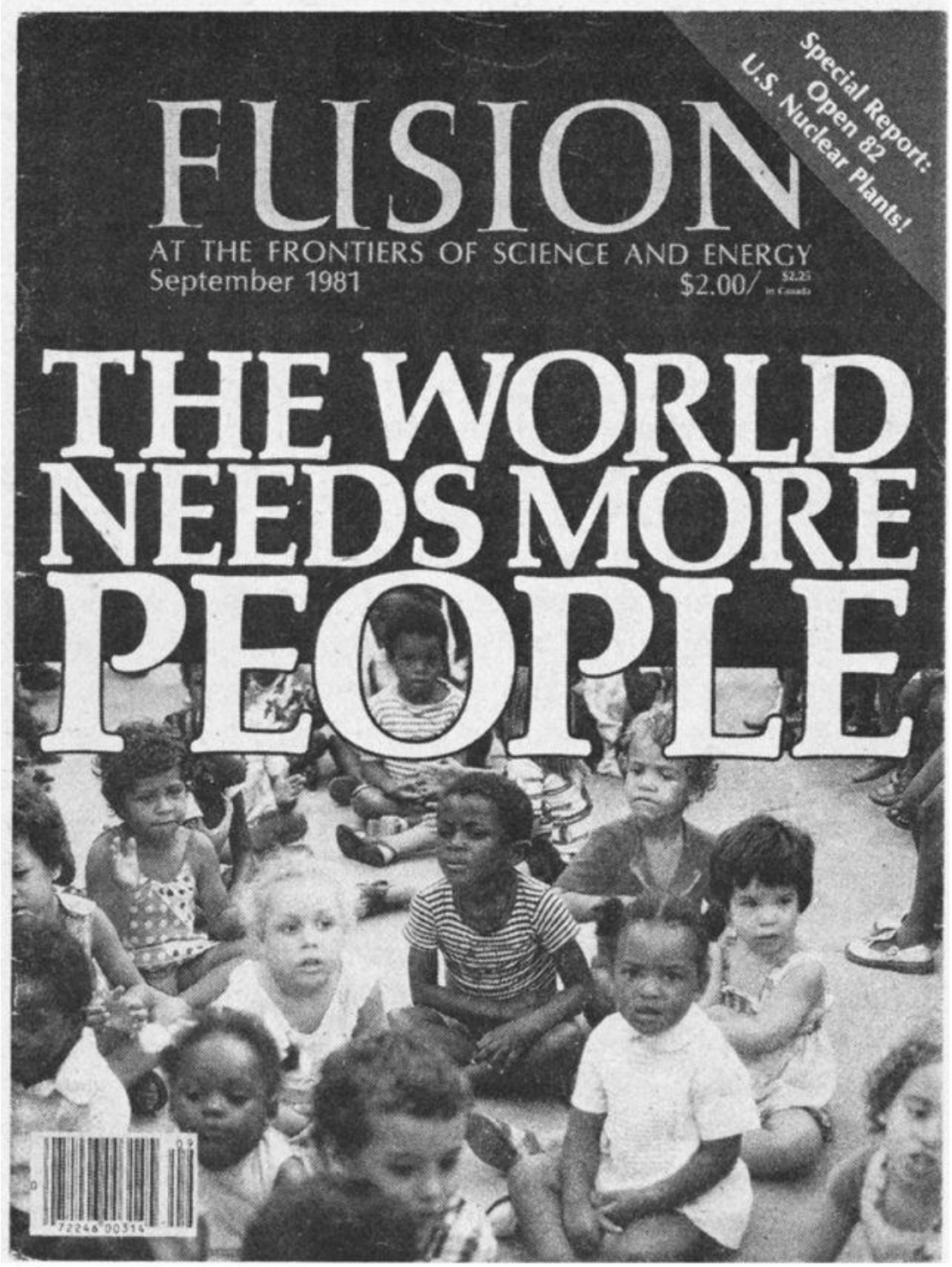
人类存在的长河中，很多人都非常渺小，但是可以因此杀害大部分出生的人类吗？他们生命中微小的善行是否值得忍受这些痛苦？人类大部分口耳相传的

善行，一直以来都是小人物的小小的善行。这个人最后的善行可能和许多人的一生一样美好。你是谁或者如何被评断，有何不同吗？你是何时成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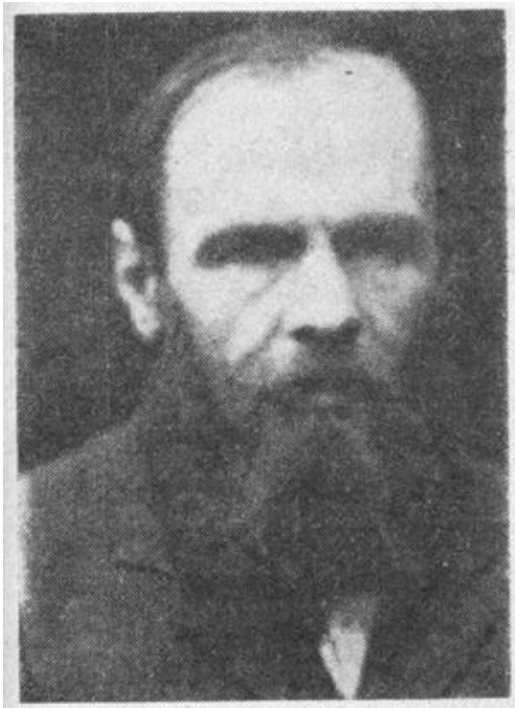
从不同角度看这个问题。这个人真正的痛苦是否来自他的痛苦和其他不适，或者治疗不受到尊重？又或者，不幸的是，一点都没有享受到乐趣，他觉得自己没有用，只是造成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他是否认为自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继续活下去的必要？他此时的思考能力和沟通能力不再重要了吗？他的无助使他的心无地自容吗？不是认为自己的想法毫无价值，心中暗暗的认为自己的一生在最后一刻并不重要？这才是他真正的痛苦，他从来没有机会发现如何真正的活着，只是跟随外界苦乐的标准活着，十分痛苦时，生命不再对他有价值。为什么允许事情导致这种发展呢？

让每一个人死时都能面带微笑的想着："这是个美好的生活，当我有办法活的更久的时候，我不会放弃这样美丽的生命。"唯有别人和善行才在死后留存，才有必要冒死亡的风险。只有为了生命的原因，以及为了生命所必须成就的善行牺牲自己的生命。

因此，上火星种植一片森林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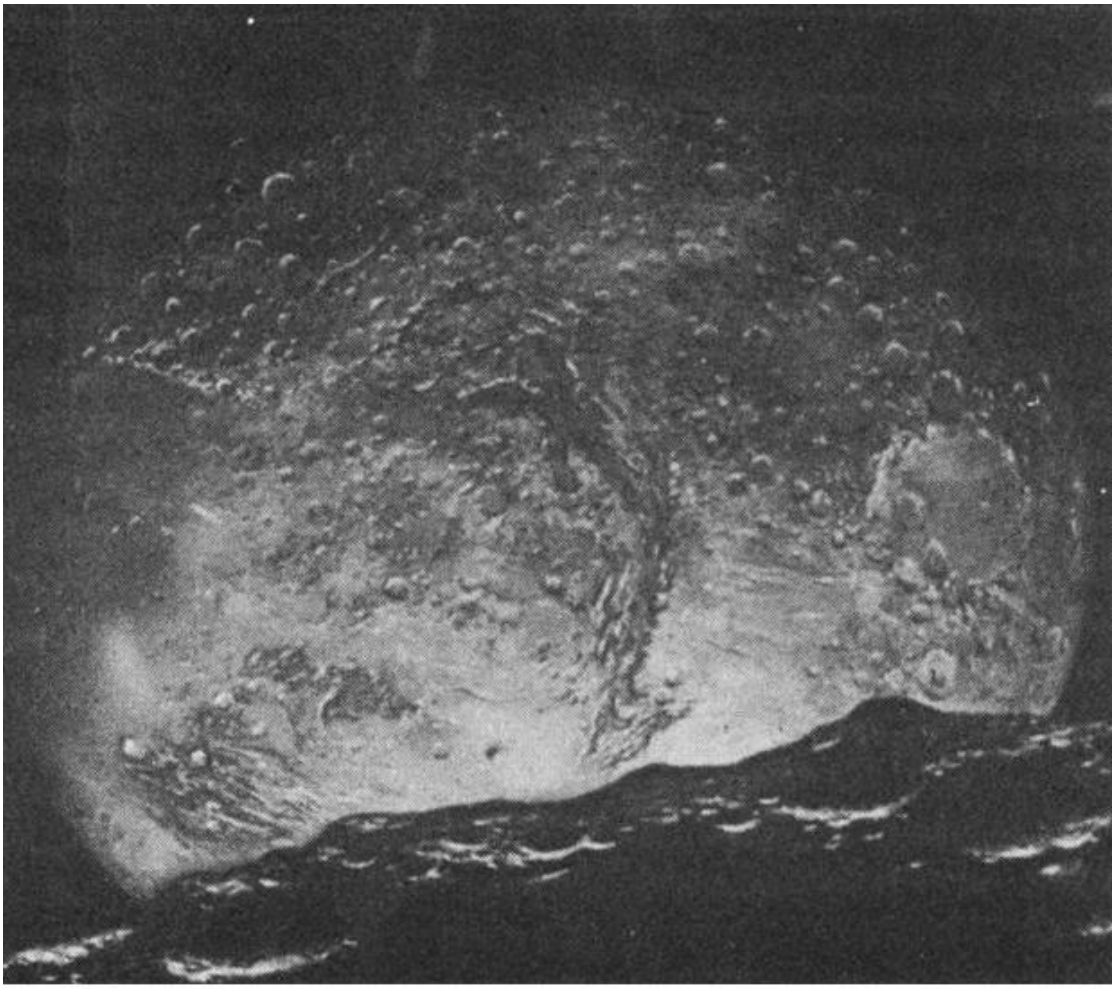


融合：科学和能源的先锋
1981年9月
世界需要更多人口
融合能源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显示，发展并维持以热核聚变发电为基础的经济所需劳动分工，1000万人口组成的世界至关重要。这项能源将使人类能够进行空间殖民，消除地球上的饥馑、疾病和苦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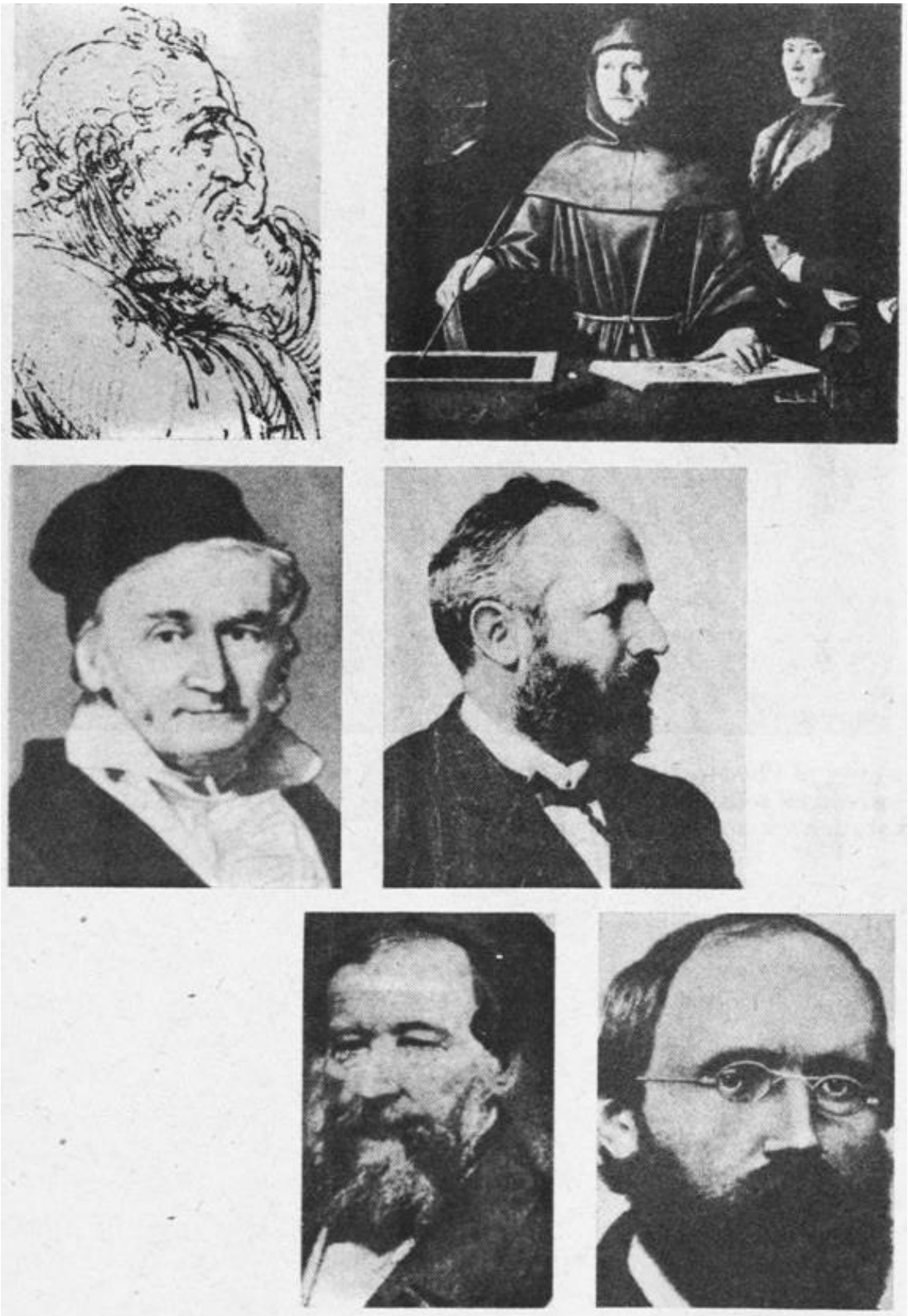


19世纪三位20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左上）、尼采（右上）和托尔斯泰

列宁在俄国革命时期对工人演讲。列宁的政策是“社会主义就是电力加苏联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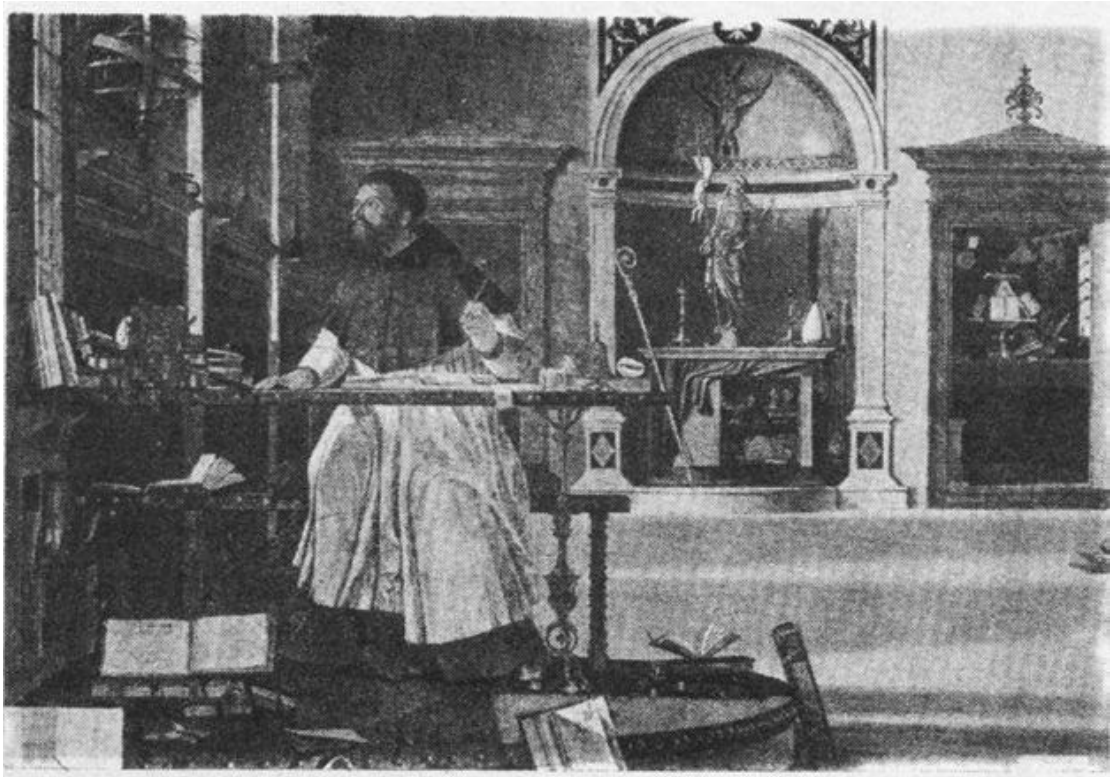


从火星表面看火星的卫星，火卫一(火星两颗自然卫星中，距离火星较近且较大者)。宇航员很快就会用火卫一作为登陆火星的中间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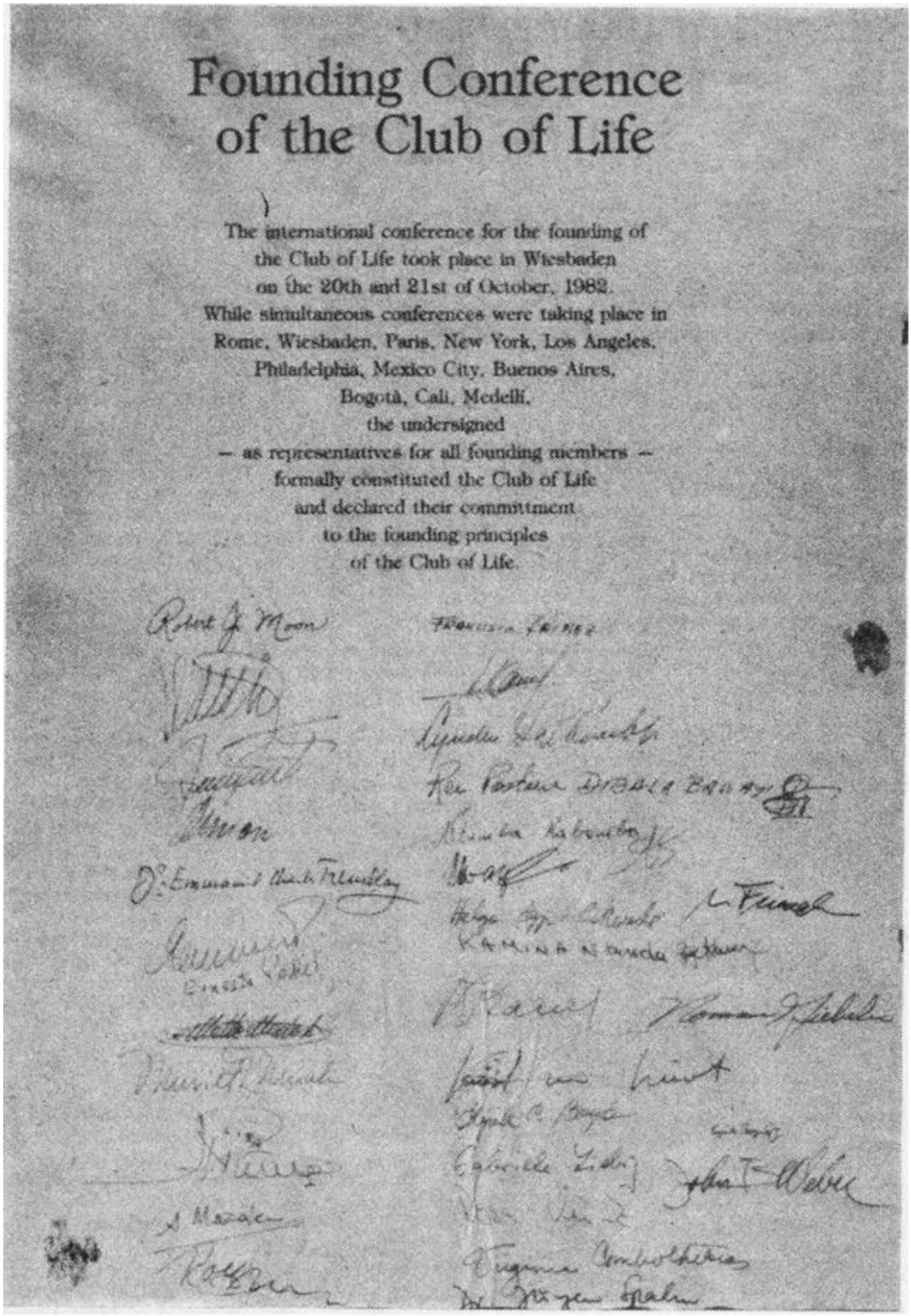
从左至右：达芬奇(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又译：帕西奥里，义大利数学家、现代会计之父)、高斯(Karl Friedrich Gauss，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大地测量学家)、乔治·康托尔(George Cantor，德国数学家)、斯坦纳（Jacob Steiner，德国数学家）、黎曼（Bernhard Riemann，德国数学家）

顺时针从上到下：
康德（Immanuel Kant）、
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上) 卡尔帕乔(Vittore Carpaccio,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笔下的圣奥古斯丁正在研究;
(下) 画家Domenico di Francesco笔下的但丁

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拉斐尔（1482-1520）的基督显圣。图中代表了人类知识的三个层次。在右下方痛苦、哭泣的男孩体现了感官的水准，中间的使徒体现了单纯的意识，而耶稣基督是人类神圣的创造力。



Founding Conference of the Club of Life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Club of Life took place in Wiesbaden
on the 20th and 21st of October, 1982.
While simultaneous conferences were taking place in
Rome, Wiesbaden, Paris, New York, Los Angeles,
Philadelphia, Mexico City, Buenos Aires,
Bogotà, Cali, Medellí,
the undersigned
— as representatives for all founding members —
formally constituted the Club of Life
and declared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founding principles
of the Club of Life.

生命俱乐部创始会议

5. 人口法则

人们可能认为一些马尔萨斯狂热分子为“真诚的”，但是，你能想像 “真诚的”马尔萨斯人下面的谈话吗？

你询问一位真诚的马尔萨斯人：“你能证明，人怎么会太多呢？”

他回答：“当然。以我家那位懒惰、一无是处的叔叔为例……”

很夸张吗？且将这个例子与马尔萨斯人引以为傲的罗马俱乐部前创始人，也是前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主任亚历山大·金（Alexander King，苏格兰科学家）博士的真实案例比较。金博士说，他的动机是摆脱世界上他认为过多的黑肤色种族。就像罗素一样，金博士在自行出版的书中透露了他的种族主义动机。两人在精神上都追随塞西尔·罗兹（Cecil John Rhodes，英裔南非商人与矿业大亨）和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帝国主义的始作俑者)二位种族主义者。

迪尔克曾在《不列顛》（Greater Britain）一书写道：

> 我们在美国看到了高贵种族对抗低贱种族的斗争 - 英国人为了保住自己而对抗爱尔兰人和中国人。无论是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到处都见得到较低贱种族阻碍英国人民全面统治产生的冲突.....整体而言，较高贵的种族会战胜较低贱的种族。 .....萨克森王国将从这场以小博大的斗争中崛起。

以下是从罗素1921年《中国之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书中引述的话：

> ..... 必要时，人口较少的种族对抗人口较多的种族，将不得不用更恶劣的方法防御自己。

这就是亚历山大·金和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哈里曼家族的观点。他们在1932年的会议和现在的德雷珀基金会/人口危机委员会上赞扬希特勒的“种族优生”政策。这绝对是狄尔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从纽伦堡悬挂纳粹旗的做法中可见其动机。

根据他们自己一再陈述的事实，以上都是“真诚的马尔萨斯人”的动机，也是罗马俱乐部作者的真正目的。然而，如果这些人在大众传播新闻媒体头版的显著位置上刊登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诚意”，就无法招睐到这么多自栩为自由派的人。宣传更是外交的事；简而言之，他们说谎，罗马俱乐部的“极限成长”说明这一切都是骗局。

以禁止滴滴涕为例。

禁止滴滴涕和其他杀虫剂的运动，始自已故的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美国

海洋生物学家）所著《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美国政府后来的决策，已经“证实”滴滴涕会杀死鸟类和做其他可怕的事情。也有人认为，滴滴涕并没有分解多大量的东西，却可能持续毒害自然界达数百年之久，毒性会越来越集中在植物和动物 - 美国政府共同谋画的画面真是十分可怕。这一切是个大谎言。政府官员引用的科学报告，每一项令人恐惧的资料，都完全和这些官员所说的相反。他们在说谎。

滴滴涕的开发和使用几乎能够消灭整个社会的流行病，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抢救大量百分比的作物，也因为抢救平均单位面积的产量，粮食供应增加了。自从禁止使用滴滴涕以后，如果不以更精确的程序处理，农业不得不使用杀虫剂时，某种情况下将危及农场劳动人口。自1970年代初禁止滴滴涕以来，由于广泛使用取代滴滴涕的不安全物质，之前消灭的旧流行病已经以加快的速度死灰复燃。作物损失加剧，与疾病有关的死亡人口上升，特别是罗素所憎恶的“更多产民族”。

换句话说，美国环境保护署的狂热马尔萨斯主义者本身，就是发展“1960年代中期大社会（Great Society）”范式转移”的产物，诉诸罗素所提”即使必要时(使用)也很恶心的方法。 ”

自从马尔萨斯全面抄袭嘉玛利亚·欧特斯抨击富兰克林博士的说法后，就使用这种标准的欺骗宣传伎俩，支持马尔萨斯主义。基本上就是不断坚称人口呈几何级数增加，但是，据说，世界的矿物资源有限，人类所需的动植物却仅呈等差级数增加。这是大学教授常说的谎言；如果他们被抓到利用这种言论说谎，他们会辩称自己的观察不是一般非专业的说谎，而是学术上杰出的“科学撒谎”法。

本书已经以最普遍的临床证据指出，马尔萨斯教条的专业论证根本就很荒谬。人口已经增加了两位数以上，并且已经濒临原始“狩猎采集社会”三位数 – 1,000多倍的人口潜力。如果矿物、动、植物资源的供应，没有跟上人口“几何”扩张的步伐，这一切就无法发生。

这方面的错误观点，并不是马尔萨斯或嘉玛利亚·欧特斯的原创。这个论点最初是十八世纪早期由西欧的耶稣会士推广，当时引入此说是为了支持法国重农主义教条的公理假设。根据笔者同仁研究，杜哈德（Dhalhalde）爵士是第一个根据这个目的写作的耶稣会士，他撰写的《中华帝国概述》（*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资料来源看起来都是来自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著名的魁奈博士所写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Despotism in China*）。

近两千年，中国的官僚制度使人口在饥荒时期发生振荡，最高水平大约为六千万，略少于现在的泰国人口，大约是现在的日本人口。这不是中国人的固有特质。我们知道，中国在汉代崛起之前，人口和文化就已经相当先进，即使杀掠大批学者、烧毁大量书籍，中国仍能发展高度文明，并在企业赞助下，拜访笈多王朝兴盛时期的印度。不过，负责及时向当局报告 “陌生人”到达村庄的官僚间谍系统，使中国陷入了专制制度，农业则以相对“传统的”劳力密集型方法进行。

估计今日(本书写作时)中国大陆人口约为十亿左右。中国拥有大规模的基础

建设项目，其中有些已经使用近2000年，加上现代核子、定向光束和生物技术已经证明可行且合乎需要，中国就能够维持20多亿人口。当然，中国需要特殊意义的合作来完成上述所有的计画，技术上也都没问题。且不谈外部因素，中国最主要的困境，引述最近中国官员向笔者同仁说的话："中国用两条腿走路，一个是中国传统，另一个是西方科技。"中国领导人执行重大政策的问题，在于平衡农村及其相关传统，又采用"西方"科技提升劳动生产力。

耶稣会士16和17世纪在印度次大陆和远东的角色并不是很光彩，既不是为了增强耶稣会士自称代表的基督教的声望，也不是让西方人更喜欢这些地区的人民。耶稣会士曾经在中国推翻过一个王朝，是他们在中国宫廷中的地位非常有影响力及说服力的证明。他们还费尽心机进入印度莫卧儿皇朝，为他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至于他们的宗教活动，这些基督教结合旧式非基督教的实验太过骇人听闻，不得不提交宗教裁判所。

不应指控耶稣会把毒品贩运到印度洋地区、东南亚和中国；贩毒的交通工具由阿拉伯商人提供。不过，耶稣会士却负责后续事宜，荷兰东印度公司则大大地将其提升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亚当·斯密时代接管的水平。这些就是耶稣会传教士从远东带回西欧的启蒙，特别是与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Denis Diderot，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以及重农主义者有关的网路。毕竟，耶稣会士是源自圣约翰修道院的"肋骨"[3]，为威尼斯封建主义靠收租为生的资本家家族基金的秘密情报部门。基本上，查询时都要回归到圣约翰修道院，其主要政治惯例亦然。

重农主义者认为整个社会的财富都来自于土地，可提取的财富数量是"造物主的恩赐"，不但数量固定，且有上限。这项假设是伴随着第二项论点的胡说，这项耶稣会的论点是由亚当·斯密的上司休谟提出，再由亚当·斯密本人以加尔文主义（Calvinist）的形式重述。亚当·斯密坚称，人必须把自己局限于追求个人享乐，而不是关注运用人的能力完成"自然界伟大造物主所期望的良善目标"。休谟、亚当·斯密、边沁和其他人曾经为非洲奴隶贸易、中国鸦片贸易和毁灭性的高利贷大力辩护，理由是人们必须服从追求快乐的本能，不需考虑任何更高道德或者宇宙天理。虽然耶稣会士自称信仰宗教，但是宗教只不过是一种随你讲的原则，无法证明的原则。

笛卡尔的例子就是耶稣会士对数学物理学中对空间一个"点"的看法。笛卡尔的钟摆宇宙中，任一"点"可以无端的在空间中出现，也是休谟、亚当·斯密和边沁对道德的看法。笛卡尔的数学物理学认为上帝的存在只能作为钟摆宇宙两端的创造者，不再能干涉创世以来的宇宙事务，否则就是耶稣会士无法证实的存有，却被说成(和上帝进行)电话交谈。对笛卡尔来说，上帝并不是自然界显而易见的，因此，耶稣会士唯有以其丰富、欢快的不一致以及坦率的机会主义，凭空想像。对耶稣会士来说，上帝就是个人享乐主义"本能"中的神秘原则，一如亚当·斯密所言"看不见的手"。

[3] 取自旧约，上帝自亚当身上取一根肋骨造夏娃

耶稣会的方法就是这种眼见为凭的经验主义法，禁止从自然过程中引用一致性的更高原则，也禁止将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塑造个人的策略和行为。所有的证据，无论多么庞大，只要违背诸如重农主义假设之类的霸道假定，都会被排除在外，纵使这些证据的前提，仅仅涉及检验一些经验上可证、普世的、更高原则。这些事实证明，人类已经故意禁止人口潜能增加两位数以上。

如果加尔文主义者杀死一个人，这不是加尔文主义者造成的死亡；根据亚当·斯密1759年的论述，这是造物主建立在加尔文主义作恶者的本能机制导致的，而死亡的发生是造物主的意志嵌入加尔文主义者本能倾向的神秘结果。我们必须检视、警觉这种亚当·斯密明确禁止我们本能的胡说八道。

我们是否夸大这一点？我们是否仅仅指责亚当·斯密反对道德论点的含义，扩张到他们逻辑的极限？我们以下的论点能否站得住脚：加尔文主义者实际上不会把亚当·斯密的论点带到这种极限？

不仿看看“环保主义”运动的发展。根据布兰德（“北南”）委员会的提议，对罗素“更多产民族”国家提供“适当的技术”，必然会导致这些国家的潜在相对人口密度远低于其现有水平。这些都已出现且证实了。我们只需要考虑归因于农业中劳力密集型“适当技术”模式造成的土壤枯竭速度，并检视其他生产中劳力密集型模式的人均产出即可。世界银行的专家，布兰特委员会辖下机构，以及有关责任方的其他领导层都熟知这种事实。强加这种政策给国家，是彻头彻尾的大屠杀，再没有其他可说的。

支持“适当技术”的人，至少不是能够获得科学信息的重要支持者，也为自己辩白，说并不知道“增长极限”这个论点是个大谎言。他们强行对“更多产民族”施加大规模谋杀，不为了任何原因，只因为他们高兴。相对于一贯反对他们行事只管自己高兴，不顾道德的人，这些人是恶毒的狂热分子。

为了满足他们的快乐，他们习于以经济方法对数以亿计的人进行大规模屠杀。

这与“环保主义者”是一样的。他们说出了最疯狂的谎言，最终坚持他们的论点是发现“工业社会和”技术进步“会造成心理压迫。为了满足他们的非理性欲望，他们要求世界事务重新排序，即使这意味以经济方法谋杀数十亿人口。

哪些科学真理是耶稣会士、重农学派、加尔文主义者和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拒绝考虑的？正是这件事的积极面，我们且把注意力转移到本书的其余部分。

“几何增长”的意义

两件事最直接证明这项简单的事实，即人类的人口潜能已被蓄意提高了两位数以上，部分证明了马尔萨斯主义的论证，即人口呈“几何”增长。同时，这种增长的事实不容置疑地驳斥另一种说法，即，满足人类需求的方法只是“算术地”增加。显然，1798年以来的人口增加证明，人类能够创造比几何增长的人口增长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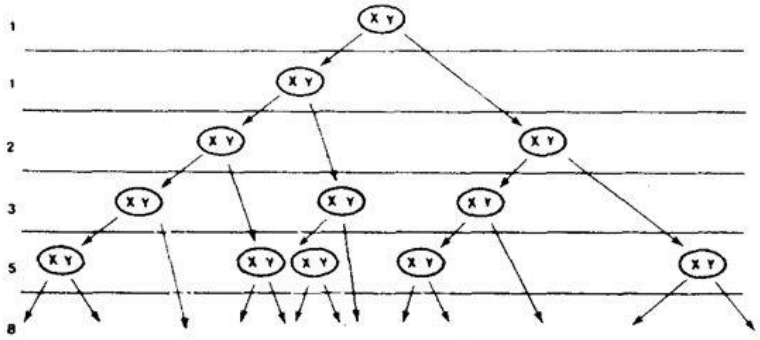
快的方法，满足人均增长水平的需求。

证据证明，我们必须聚焦于完整的人口 “几何增长率”法则研究上。由于人口增长是人类蓄意改变而实现，所以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定义人口增长几何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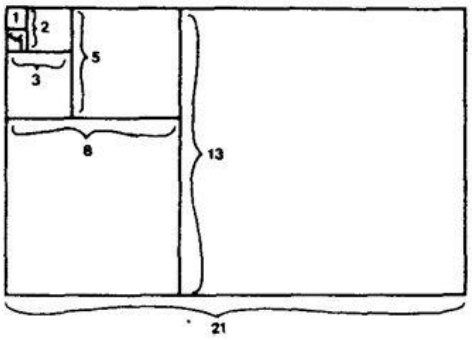
几何增长率是十二世纪第一次出现的一种算术计算，称为斐波那契数列(Fibonacci series)。这是为计算兔子等动物的增加数，不考虑其死亡率的算法。如果从出生总数中减去与同时段的死亡数，斐波那契数列是个很好的初始近似（图1）。

图1

斐波那契数列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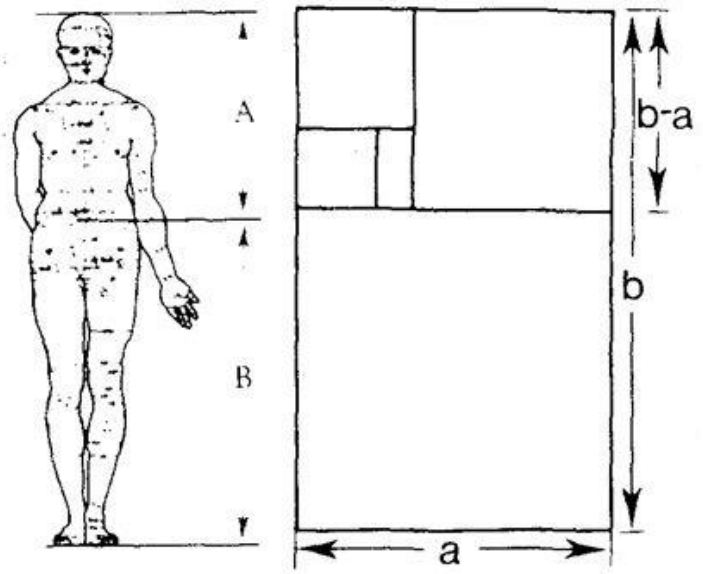
斐波纳契系列动物的增长数：在简单的情况下，假定每一对（xy）的第二代都是一对，第一代和父母会再各生一对，所以第一代生另一对时，父母也同时会生另一对年轻的幼仔(见红圈)。他们之中，每一对都在生第二对之后过世。此外，如果每一对新生代都由雌雄幼仔组成，则又会再产生两代幼仔，那么这个动物的繁衍就相当于斐波纳契系列。



斐波纳契矩形：
长方形长短边的比例接近黄金分割比例。

代	新生代	死亡对数	总对数
1	(1)	0	1
2	1	0	2
3	2	1	3
4	3	1	5
5	5	2	8
6	8	3	13

黄金分割



黄金分割是所谓的“黄金长方形”长短边之间的比例，其具有独特的性质，如果去除短边形成的正方形，则长方形剩下的部分会产生相同比例的矩形。代数上，这个他们的对应关系是 a：b =（b-a）：a.

十五世纪的最后十年，达文西和好友卢卡·帕乔利在米兰证明了斐波那契数列是几何而不是算术数列。随着人口不断增长，连续几个时期后，各阶段人口比越来越接近黄金分割的几何比率。达文西和帕乔利通过自己及其合作者的广泛观察，发现动、植物和人类等生物体的生长速度和形态特征与黄金分割一致。

这就是“数字学”，一点都不神奇。黄金分割以两种方式出现在初等几何中，都有相同的起源和基础，一个聪明的十二、三岁小孩就可以掌握这些结构，理解并证明相关的原理。

黄金分割通常与圆内接正五边形的结构有关。图2以两种方式描述这种构造，一种是圆圈本身的简单构造，另一种是以三角形构成：图3是第二种方法产生的黄金分割。这是第二种引导我们注意“几何增长率”更深层意义的方式。

用圆形做成圆锥体，例如，先做圆的扇面，再透过拓扑折叠(topological folding)的方式，以微分拓扑产生内置扇形，就是锥形。从锥体底部，沿着表面画一条恒定间距的线（图4）。观察从锥体顶点沿着锥体表面向圆形基底移动的线，就是圆锥半径，沿着圆锥表面与围绕表面绘制的螺旋臂相交。现在，比较螺旋臂和半径横切面的长度。这些长度之间的关系如下：线段 a 与线段 b 的比例与线段 b 到线段 c 的相同，称为自相似 (self-similar) 关系，以各种方式呈现，彼此之间都等值。这个螺线称为对数螺线(logarithmic spiral)。

想像锥体是透明的，然后从底部看圆锥体表面的螺线，而不是从侧面观察。三维螺旋投影到锥体的二维圆形底部是一个阿基米德螺线(Archimedean spiral，亦称等速螺线)。现在，从圆锥体顶端向底部绘制半径线（图4）。该半径线的线段长度不与黄金分割成比例。

图2 圆内接正五边形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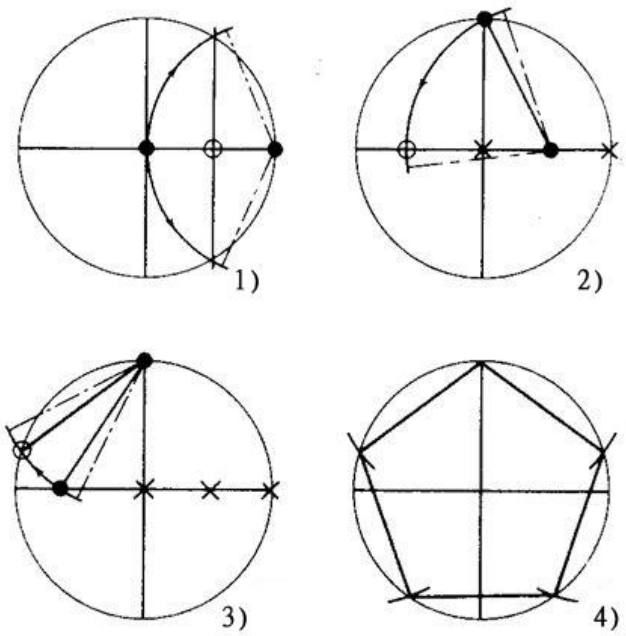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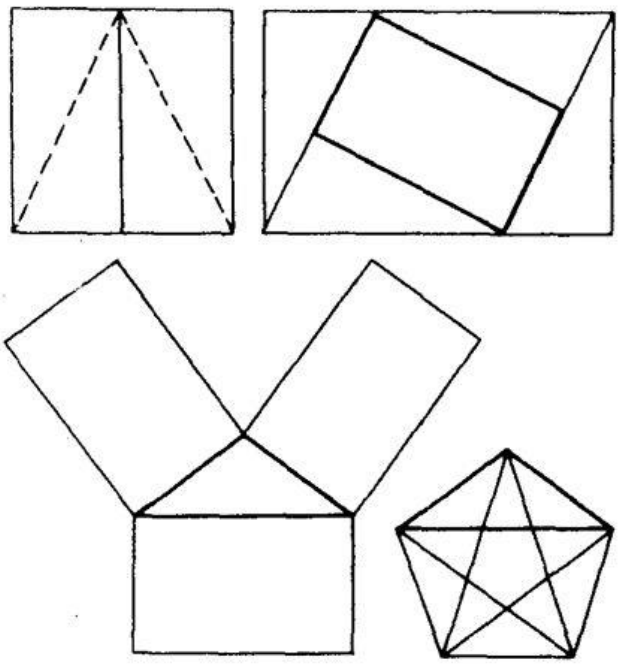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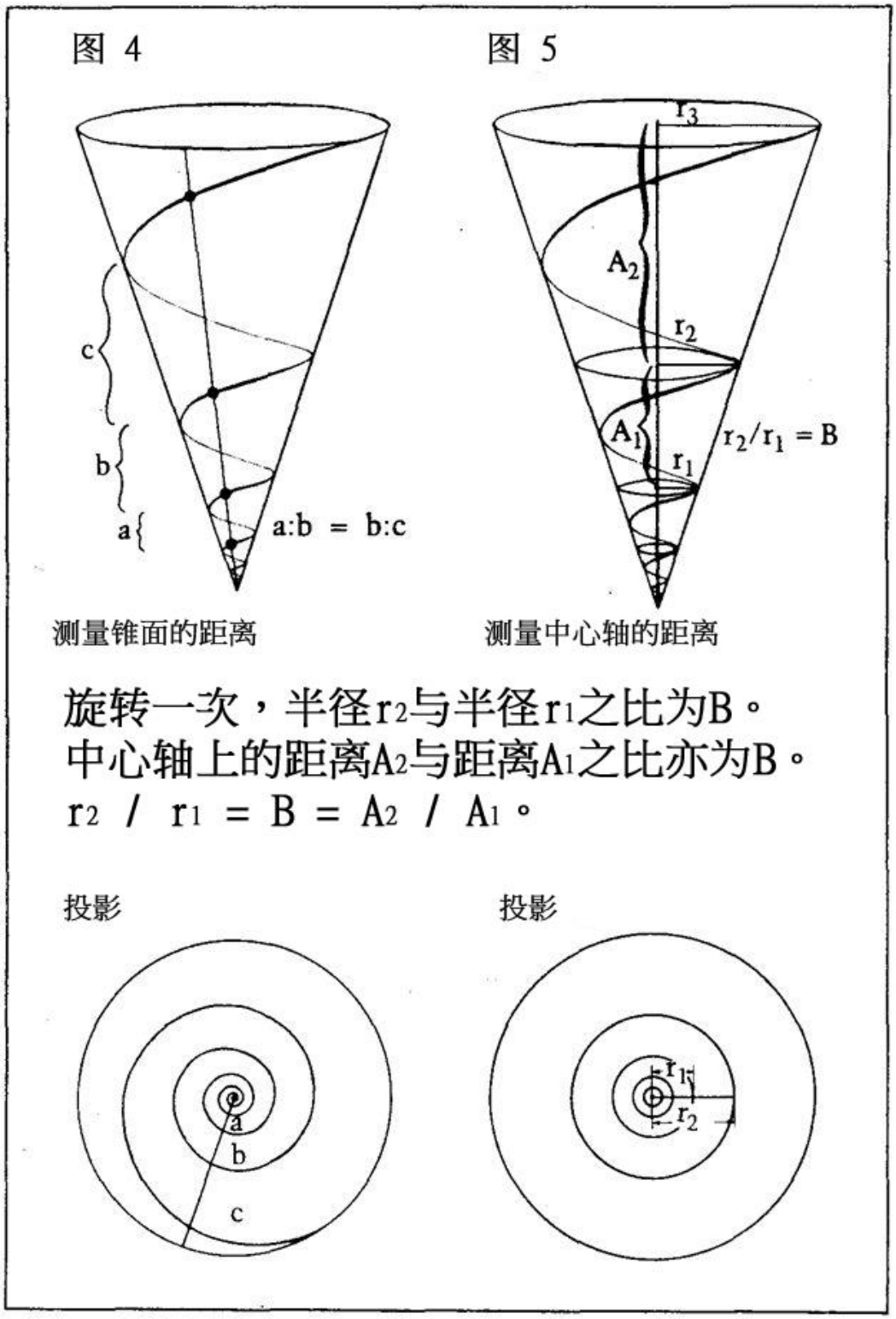


图3 从三角形构建五角形





现在，以不同的方式得出相同的锥体。在锥体中心轴（图5）近尖端处任选一点，然后绕这条线旋转，想像圆锥内侧相对那一点的运动，使得旋转半径以一定的连续速率增加。图五中，A 沿着固定方向连续不断移动，旋转半径按 B 的比率增加，完成一次完整的圆形旋转，形成锥体表面的自相似螺旋。当锥体(半径)不断增长，以及锥体每次完整的螺旋旋转的增长量，因此，每完成一次螺旋旋转之后，我们就有圆锥逐渐增加呈自相似比例的圆形底部。

这一步结束就完成了复变函数论的基础。产生这种锥体的圆锥函数是复杂函数最原始的形式，涉及三种超越数。第一个是用于旋转的超越数(transcendental number) π (pi)，第二个是自然对数底(transcendental, logarithmic number base) e，第三种是螺旋从三度空间向二度空间投影的侧视图，是最容易想像的三角函数。这三种超越数本质上显然一样，如同相同的物种有共同起源，是最复杂功能的最基本特征；而且，都是几何的基本方法，未经算术计算；因此，十二、三岁的学童应该都能掌握基础的复变理论。

上述所有物种的功能称为负熵函数(negentropic functions)，其过程称为负熵过程。所有这些函数的投影，都和阿基米德螺线投影一样，都是黄金分割的自相似投影(self-similar projections)，一如达文西、帕乔利和后来的开普勒所坚持者。反之，所有这些投影都是反映负熵过程。

前述圆的投影是每一个螺旋进行连续、完整的圆形旋转，是一套有共同圆心的二维投影同心圆，这些同心圆的周长和面积将会互成调和比。这些由连续增长周期决定的调和比是人类、动植物等物种增长率的理想（正常）比例，是“几何增长率”的初始近似值。

人类的需求和动、植物的总数之间，尚不存在任何内在的原因，我们不能迫使动、植物的总数，以几何增长，甚至更快的速率配合人口增长的速度。事实上，“农业革命”以来，这种可能性已经得到最有力的证明。

“哇！”马尔萨斯主义者和重农学派人物一致坚持，说“啊！但是需求矿物的增长呢？你刚刚不是承认达文西、帕乔利和开普勒坚持'几何增长率' 仅限于生活过程？需求矿物的限制又是什么？“

抬头看看星际，亲爱的同胞！看看螺旋星系！如果不相信天文学家手中丰富的照片，不妨拍个照，测量一下几何状的谐波螺旋。黄金分割？惊讶，还是生气？我们不是说过整个宇宙其实是由与生命过程一致的原则所支配？ “那是万物有命一元论！我在学校里读过，知道他们都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这些是什么样的古老哲学，不科学且（为掩盖事实）含糊其词？” “亲爱的同胞，这不是新的，也不是苏格拉底之前具深度的科学文献。开普勒创立了现代数学物理学，证明太阳轨道的谐波是唯一确定的方式：行星和卫星在椭圆轨道上的谐波近日-远日率取决于黄金分割原理。“但是，这与能量守恒定律矛盾！ ”你会惊呼。

亲爱的同胞，难道说宇宙整体，至少是矿物的部分，都是由熵定律控制，负熵只是例外吗？我看到你在点头同意。难道这个所谓的熵定律不须证明，而生命过程中，不会出现所需天然生长的矿物资源吗？你耸耸肩，同时又点点头：你大致都同意，却又怀疑我是否在耍诈，所以要对这个问题表态，感到有些警惕。难道不能证明人口增长超过两位数吗？ ”这是骗人的。现在，你是耶稣会！现在只不过是接近这些限制。”啊，但是你同意我所描述有关你的反对意见，你刚刚定的条件？谢谢；我们都同意这一点。

开普勒和五种柏拉图立体

柏拉图一生中的合作者之一，在昔兰尼加[4]的阿蒙神庙工作，发明并证明，只有五种正立体可以在可见空间（欧几里德空间）中得出。柏拉图认为，这限制了空间中可见形式的范围，即在可见空间下的一些几何原理，只会出现有限范围的几何形式。因此，柏拉图以此作为他《蒂迈欧篇》的主要特论，这五种正多面体通称为柏拉图立体。

达文西的合作者帕乔利，运用库萨枢机主教在十五世纪中叶发现的几何学，重新证明了五种柏拉图立体的独特性。达文西关于流体动力学、声学、透视革命（投影几何学）、生物学和解剖学研究以及他的机器设计理论的核心都集中在库萨和帕西利奥的几何，达文西一生的工作自此展开。开普勒结合库萨和达文西的成就，奠定了数学物理学的基础，法国的加斯帕德·德萨格斯（Gaspard Desargues，1593—1662，几何学家和工程师）也因为和开普勒同一时代而\发展出严谨的几何学基础。

开普勒知道他在数学物理方面的两个主要论点并不完整。他先概述了微积分发展的具体情况，指出他的椭圆函数理论尚需修改。莱布尼兹在1676年提交给巴黎出版商一篇论文，主要根据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17世纪最具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微分等差级数的几何条件。帕斯卡是费马（Pierre de Fermat，1601-1665，法国律师、业余数学家）的合作者，也是德萨格斯（Desargues，1593～1662，法国数学家和工程师）的追随者。高斯证明了开普勒的椭圆函数正确，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椭圆函数的问题。

牛顿对微积分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虽然牛顿实验室的论文在莱布尼茨的书出版那段时期仍然进行，但是里面没有微分学的内容，牛顿也是在莱布尼茨的书出版十几年之后才提出。总之，牛顿以伦敦皇家学会成员的身分出版他的著作之前十几年，莱布尼兹在微分学方面的成就已广为人知。尽管如此，牛顿的微积分甚至没有抄得很好，是以等差级数为基础，与开普勒或莱布尼茨所谈的基本原理没有任何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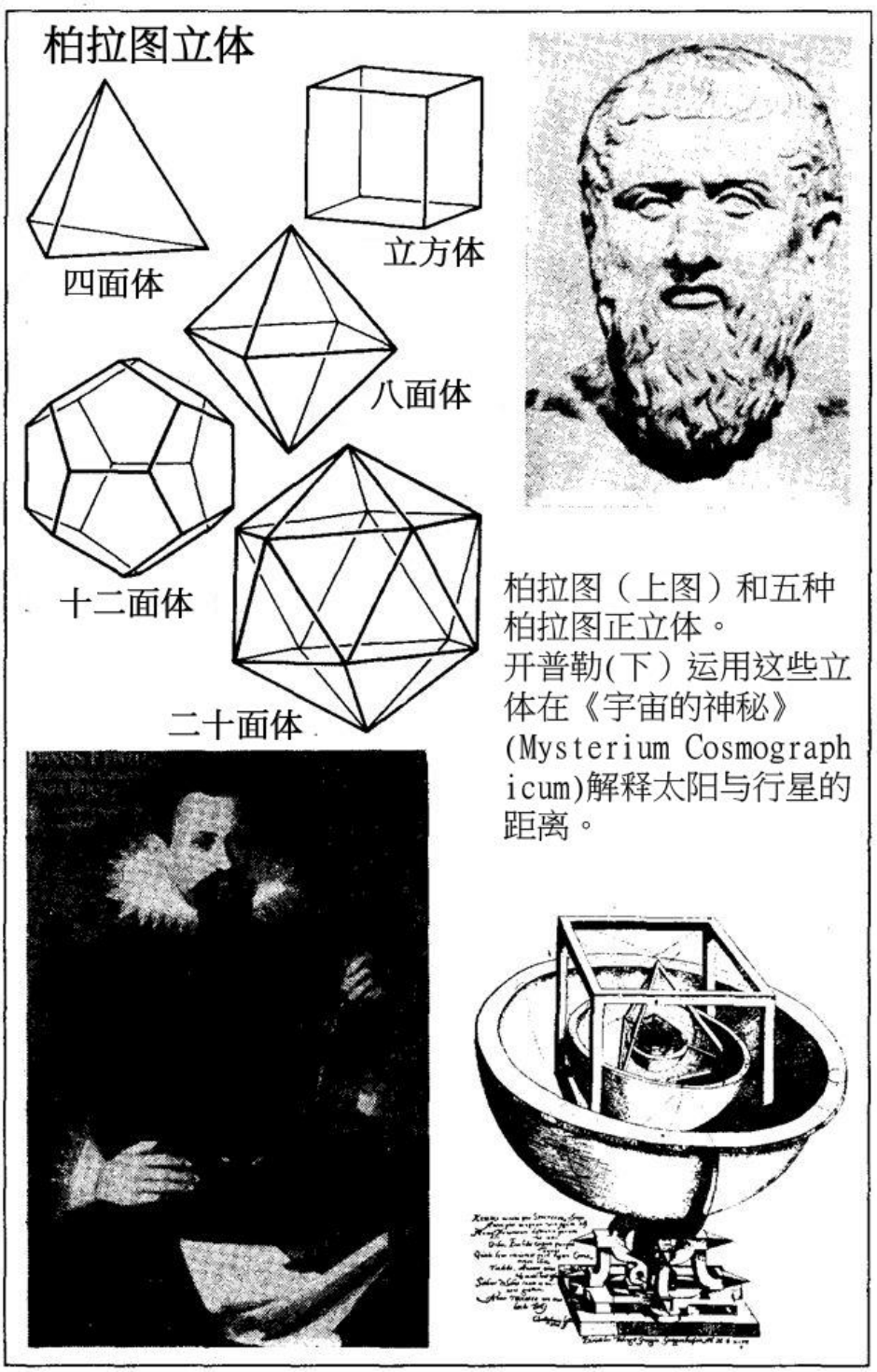
现代“柏拉图立体”的证明源于十八世纪莱布尼茨的追随者欧拉（Leonhard Euler，又译尤拉，1707-1783，近代数学先驱之一）的严谨证明。现代微分拓扑学（Differential topology）比莱布尼茨的拓朴学（analysis situs，现代拓扑的旧名）或欧拉拓扑更为精确，但原理相同。

三位德国数学家黎曼(Bernhard Riemann)、魏尔斯特拉斯（Karl Theodor Wilhelm Weierstraß，1815-1897，现代分析之父）和康托尔（Georg Ferdinand Ludwig Philipp Cantor，1845-1918，创立现代集合论作为实数理论以至整个微积分理论体系的基础），基本上在十九世纪秋季完成前辈们累积的成果。就基本原理而言，今天处理这些问题的现代数学物理学都参考黎曼、魏尔斯特拉斯、康托尔以及勒让德(Adrien-Marie Legendre，1752－1833)、高斯和狄利克雷（Johann Peter Gustav Lejeune

[4] Cyrenaica，位于利比亚东部海岸区，是该地五个希腊城市中最古老、最重要的城市

Dirichlet，1805-1859，创立现代函数的正式定义）等前辈的著作。自十九世纪秋季以来，几乎没有多少变动。[5]

到目前为止，就有这么多的历史描述。现在，且专注于这件事的内容－如何根据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来关联生物和非生物的过程？柏拉图、阿基米德、库萨、达文西、开普勒和莱布尼茨的大作中，已经解决了所有原理方面的基本问题。而且，证明这些事一点都不难，不需一个门外汉以令人困惑的代数迷宫来画蛇添足。



柏拉图（上图）和五种柏拉图正立体。
开普勒(下）运用这些立体在《宇宙的神秘》(Mysterium Cosmographicum)解释太阳与行星的距离。

[5] 以上除了勒让德是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外，均为德国大师

柏拉图以五种柏拉图立体攻击上述问题的方式，是将这些正立体相对应一面的正多边形框在圆内。柏拉图视圆的周长为乐器的弦，并聚焦于三角形、正方形、五角形和其他将圆周分成相等弧长的几何图形。他认为，这些由不同多边形分割的弧，与今日的十二音列、八度音程产生相同的调和比例。开普勒后来以这个结构作为证明椭圆绕日轨道的基本结构。

柏拉图和开普勒的谐波值并不完全正确。阿尔法拉比(al-Farrabi，872-951，伊斯兰黄金时代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天文学家、逻辑学家同时也是音乐家)、札利诺(Gioseffo Zarlino, 1517-1590，义大利音乐理论家)主教和巴赫（JS Bach，又译巴哈)调节为等程音阶的24键复音音乐系统，才是正确的数学物理学的值。然而，只有藉由柏拉图和开普勒都不知道的初级圆锥函数才能得到正确的值；因此，他们推演的结果仍是一个不错的近似值。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的推理，直到古萨的作品出来之前，中世纪的欧洲人并不了解柏拉图时代雅典学院的几何学。因此，很难理解柏拉图将多边形嵌在圆里，就可以证明所有的事情。这是怎么回事，只凭五种正立方体就可以在（欧几里德的）可见空间中构建？

这主要是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十三世纪中叶以前，除了阿拉伯的评论外，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西欧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在逍遥学派弟子（peripatetics）的影响下，希腊几何在埃及重写了。就像众所周知的十三本《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一样，大多数的雅典学院几何都在埃及完全改写了。

从《蒂迈欧篇》本身和其他来源，已经证明也确实如此，库萨在十五世纪中叶再次发现的几何原理，与古典希腊学院的原理一样。我们已知的古典希腊几何，和十九世纪德国数学家斯坦纳（Jacob Steiner，1796～1863）教授研究的综合几何(synthetic geometry)非常类似。这种几何学方法是以下各位大师科学发现的基础：库萨、达文西、开普勒、德萨格斯、费马、帕斯卡、莱布尼茨、欧拉，加斯帕·蒙日伯爵和拉扎尔·卡诺领导下的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高斯、雅可比（Carl Gustav Jacob Jacobi，1804-1851，普鲁士数学家，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狄利克雷、黎曼、魏尔斯特拉斯和康托尔。这种几何方法的初级理论就是发现的原理，也因此很容易被聪明的新人跟上，毋须深入到复杂的物理数学理论，只要专注于几何的初级理论就可以充分证明。

命名为 “综合几何”就是因为抛弃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所有公理和假设，并由范例证明一切，不须以其他方法证明。综合几何最重要的特色就是跳脱教科书之外，点、线（不证自明）的公理。所有的几何中，只有圆以旋转的方式构成一种不证自明的存在。

接下来要说的是所有数学物理学中最困难、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部分：圆形旋转是可见空间中唯一不证 自明的存在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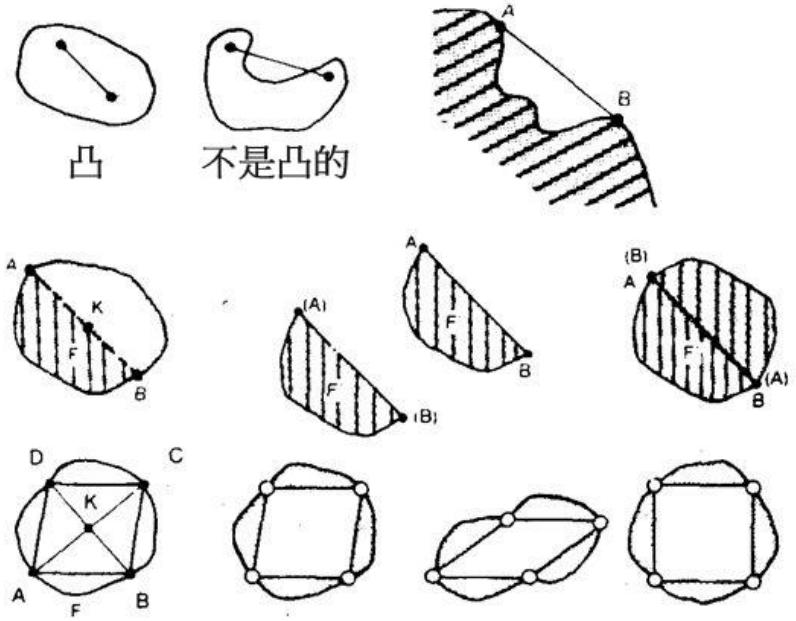
图6是藤能宝博士提供微分拓扑学基本定理的总结。所有严谨的数学物理学都始于掌握这个基本证明，也是教学有序的教育机构中，十三岁的聪明孩童就能

轻易掌握。读者可以借助相关图说，掌握此证明论点。

下一步就简单了。折叠一次后，出现一条线，此处不是要证明这是“直线”，但是将圆对折就会出现直径，然后分成两个面积相等的半圆(周)，并因此定义了直线和(直径的)笔直特性。几何和物理学中，没有比这定义更严格的“(笔)直线”。接着，半圆再折叠一次，出现的点就是圆心。这是在严格的几何或物理学中唯一定义的“点”。

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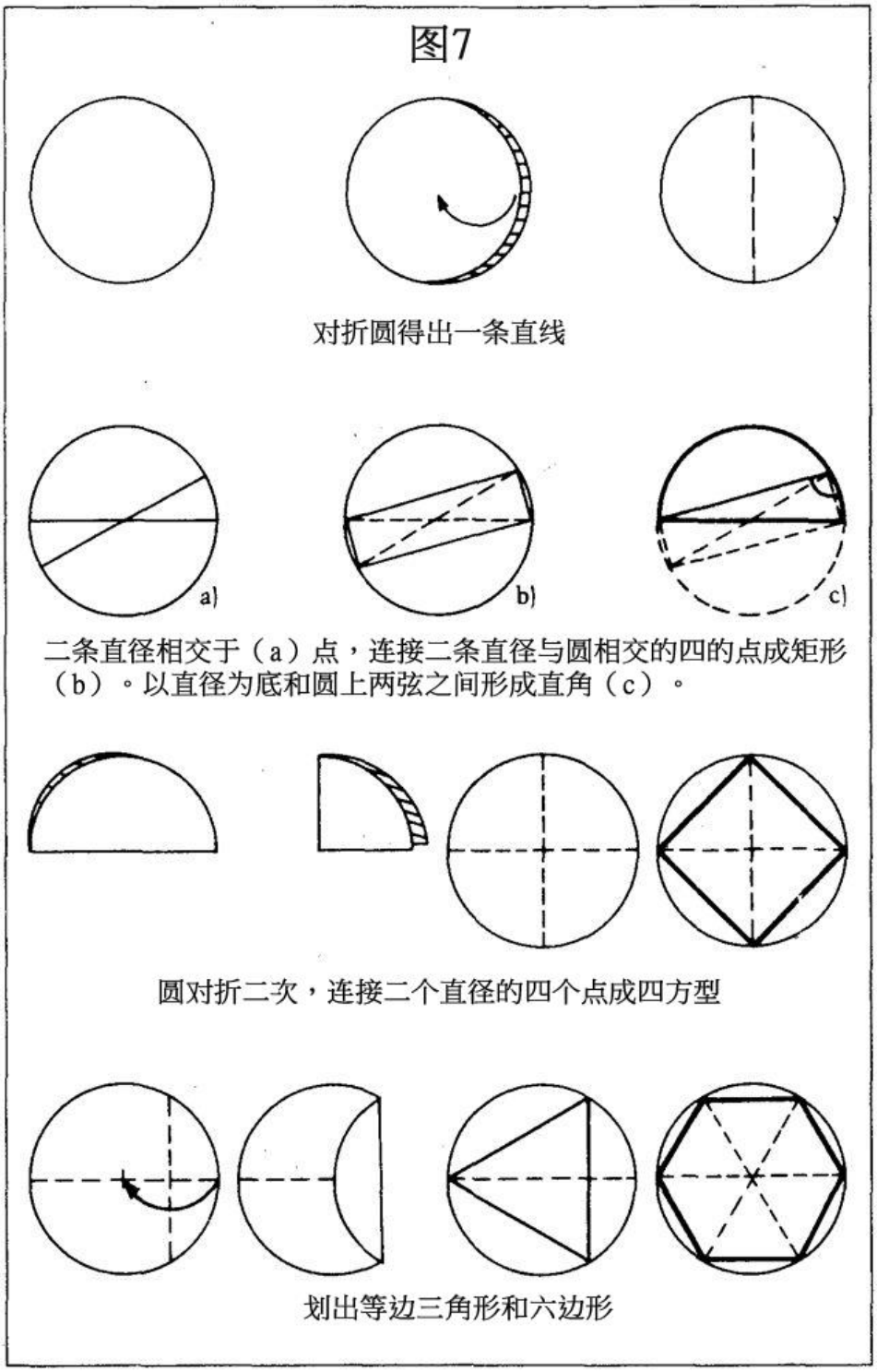
微分拓扑学的基本定理



斯坦纳未用任何代数公理，就证明周长固定的几何图形中，圆面积最大。假定有另一个有相同属性的图形，这个图形必然是凸的，否则只要连接A、B二点，图形的面积就会增加，周长减小(因为AB直线较原本的曲线短)。如果将凸形图的周长分成等长的AB和BA，然后图形沿着连接A、B二点的直线分开。假设F取其中较大的部分，再以AB为中线对折，在原图的另一边产生对称图形。如果新图不是凸的，可以用前述步骤修正。(如图所示)连接A，B，C、D四点,形成图中的菱形，将菱形“拉直”为正方形增加图形的面积，周长不变。继续这个过程，图形慢慢地接近一个圆，是唯一无法用这种方式再调整的图形。

如此定义的点、线是圆的初级奇点-宇宙起源研究中，最初的点和线，第一级第和二级圆的几何衍生物完全因圆的出现而存在。严格的几何或物理学中，不会出现其他的“点”或“线”的定义，如果引入任何其他的定义，如公理或假设，都很荒谬。

用公理定义的点和直线测量圆的几何问题，不再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悖论。几何学的问题就是用圆明显可见的存在度量线和点。这是所有严谨的数学物理学基础，让我们得以重新发现库萨的一个重要发现。



就从圆及其奇点开始，不求”助”任何假设完成整个过程。因此，从正三角形、正方形和正五边形开始，都可以用圆和它的奇点得出，再加前述根据这些原理得出的图形。

和《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一样，一旦包含可见空间（欧几里德空间）的平面和立体几何范围，我们就必须从自相似螺旋的圆锥中，继续推导复(数)域几何基本原理。一旦后者完成，数学就足以解说物理的成果：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在复(数)域的复数中得出圆锥函数，将图像投影到平面和可见空间的立体几何。这种流形之间复杂、可见的投影关系，引导我们至复杂的微分拓扑数学领域。

如果说柏拉图时代的人，对近代复(数)域几何学有所理解，除非在可见空间观察到的现象都是柏拉图参考文献的合律含义，否则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作者及其同事的知识无中生有。

柏拉图坚持眼见是扭曲的现实世界影象，只能以扭曲的反射形式出现，就好像真实的宇宙到处都嵌入了扭曲的镜子。

投射一个自相似圆锥螺旋到圆锥体的圆形底座上，是调节为等程音阶键的一个好例子。该投影是黄金分割，三度空间的投影有正五边形的正立体特征，然后将锥体的圆形底座分割成十二个相等的扇形。螺旋臂的弧长是由圆形底座分成十二个相等扇区的半径切割而成，界定了等程音阶键的二十四调、十二音列、八度音程的比例。这证明这些和声音程和柏拉图立体（第五，四，三）及其互补图形界定的间隔，是宇宙中有音乐家出现之前，唯一的自然音阶和谐波。任何其他音调都是扭曲的，任何其他原理构成的谐波都不是音乐。问题是，音乐家要多接近那些认可的音调权威？他们演奏那些只存在于音乐的谐波序列原理时，又多棒呢？

以五种柏拉图立体遭扭曲为例，说明扭曲感性知觉的图像。边界几何原理中界定了可见空间中感受的图像，无论发生何事都会扭曲现实，以符合可见空间中有限的几何原理构图。这是又称为“柏拉图实在论（Platonic realism）”的基本特色：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类似现实的扭曲形象，广义来说，是一丝火光照到黑暗洞穴墙上看到的阴影。阴影相对于真实的东西，并未反映真实形式。

只有圆形旋转在可见空间中不证自明，可见空间中的任何构图都受限于此。因此，柏拉图坚认在可见空间中只有五种正立方体，也只有从圆而出的正多边形，才能建构相对应的正多边体。

换句话说，只有正晶体结构的形成过程，是由圆与其导出的正多边形之间独特的关系，适用于可见空间。这种关系直接反映了圆在可见空间中的限制。

这就是本源且正确的含义，可见宇宙有其边界却变化无穷，在某种意义上也有限度。

由这种方式证明的数学物理问题有两种。首先，我们必须证明复值函数

(complex functions，又译复变函数)的复域几何如何在可见空间生成，同时投影符合五种柏拉图立体独特含义举证的和声原则。其次，投影几何中，取决于（可见空间现象中的）实验观察结果，哪些可证/反证复域几何的特色?

自库萨重新发现圆形旋转原理，到黎曼等基本原理的现代物理学所有进展，都是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详尽说明。

最小作用量原理

圆形旋转是可见空间中唯一不证自明的形式，也是太空中实体活动的唯一原始形式。如果一个区域代表已经完成的工作，则此区的圆形旋转就是完成此工作的最小作用量。这是现代物理学基本原理 - 莱布尼茨的“最小作用量原理”。虽然这个原理与莱布尼兹有关，但是其实已经隐含在库萨、达文西、开普勒等人的物理原理中，而综合几何和物理学隐含着同一个不可分离的主题。

人口法则是连结几何与物理的核心问题。最小作用量原理是唯一衡量可行技术的方法。因此，如果技术没有进步，人类潜在相对人口密度不可能增加，人类文明也不可能存续。

尽管莱布尼兹的时代已有许多经济学领域的先驱，但是从美国开国先贤到卡诺领导下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德国等等，都从莱布尼茨1671年出版的简要论述生产劳动成本的《社会与经济》，而知晓莱布尼茨所奠基的经济学。正是莱布尼茨定义了功(work)和功率(power)的概念，这些术语同样适用于今日的热力学和经济学。莱布尼茨在同一基础发展了科技的概念，称为十八世纪法国的工艺学院(polytechnique)。

热动力机械是莱布尼茨经济学的重点，他认为，如此则“一个人可以做一百个人的工作”。比较生产同类型产品的情况闇，操作机器与未操作同种机的差异，使吾人将“功”及功率的概念联在一起。另一种情形则是两台机器使用同量燃媒的功率，则有不同的产出。其间差异决定了技术的根本概念。

所有机器的核心特征都是旋转，不仅是旋转运动，而且所有机器都是经由分析等效旋转减少周期时间。供给机器的热功率在空间中提供新的运作方向，并且通过，例如齿轮和锥体，改变工作表面的周长，我们可以将连续作用的能通量密度提高到为机器提供动力的原始能通量密度之上。

电磁作用仍然维持旋转运动原理。电磁波是本章前面所述圆锥函数的圆柱状近似(cylindrical approximation)。电流、激光或无线电载波等是理想的电磁辐射正弦波。这个正弦波应该视为圆柱表面上的螺旋，从圆柱体的三度空间投射到示波器的阴极射线屏幕的二度空间上。这是圆锥函数的自相似螺旋，其负熵显然是零 - 直到将其压缩在一个屏幕产生谐波共振，此时，静止的光束因此成为最活跃的光束，并开始做功。

目前发展最弱的化学加工是几何概念最需增强做功的领域之一，也是最终的电磁，但是并未适当的将其连接整理出来。因此，将化学加工所做的功等同于机械等效（或当量）或电磁铁等效，运作得相当不错。

原则上，所有作功的动作都等同于最小作用量原理，并以圆周运动的功当量衡量，视之为可见域中的圆周运动，相当于相应复域中和谐有序的圆锥运动。

到达功的技术分析点时，并非把热功率作为卡路里测量。因为测量不同功率的技术会完成投入相同千瓦(瓩)小时[6]的功。在此比较的是完成输入和产出所做的功(manifest power)，而非输入功率之视在功率(apparent power)。

一般情况下，每一度工业热能或电流，很大程度上比所耗燃料少。这是经济上最令人不满意的安排，尽管表面上消耗的度数较少，但是，耗用的功及功率都大于供应的量。其实，热量并非做功及功率的关键，输出热功率的技术、物理几何、输出技术才是关键。

尽管应优先关注热能的物理几何原理，但是如果先初步计算系统投入和产出所耗的度数相对于完成后所耗的功，说明社会投入的功从而定义所需解决的问题会比较有用。现在就简述如下。

检查热力学过程的一般程序，首先是定义过程中的可用能源，其次是用流量的两个分量函数分析生产率。先将能量的定义限制在特定的方式上，构成了该研究采用的物相空间(phase-space)，接着确定过程本身所消耗的能量，以免出现停转的情形，某种意义上讲，“停转(running down)”可能发生在机械时钟的主发条。如果系统能量消耗之后尚有可用的能量，就是剩余的自由能过程。

接着，要研究有问题的过程。这是检视一段时间内的连续周期。一般认为，受到性质不变的物理定律支配，研究区间内，这个过程将会对自身的发展作出反应。这只是一般假设连续过程的简单情况，我们研究连续循环中的过程，主要是根据系统能量与自由能比的变化。

过程中自由能为负，或自由能与系统能量比下降，使其比值为负，此程为熵(entropy)，比值上升，则为负熵(negentropy)。

本章前面已经以最简单的方式说明负熵的过程。倒转圆锥函数即可呈现理想的熵。情况好像变得更复杂，但是这种最简单、理想的情况，足以满足眼前的迫切需求。

以社会经济为例，能量系统是社会对自然做（物理）功的一部分，直到供应所需的一切，以免社会潜在相对人口密度下降。所做的功超过表面上是社会努力的自由能，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净营业利润。自由能的价值受到社会“再投资”影响使得潜在相对人口密度增加。

[6] 简称为度，即功率为一瓩的电器使用一小时消耗的能量

这种方法很快就会证明有用，但是还不够。

潜在相对人口密度以人均值说明自然界进行实体改良的操作人数；呈现包括行政和服务在内的整体劳动力；也显示了整个人口，各项数字都彼此关联。社会生产“再投资”过程中，人口规模和活动范围都会扩大，人均相对人口密度也必然增加。

至此，问题来了。假设技术水平固定在某个范围，则以此方式增加的人均潜力，将使人均系统能量随之增加。社会会有一段时间的增长，进入熵的阶段：这似乎是经济固有的膨胀、崩溃循环。一旦技术相对固定，能量系统所需的人均比例增加，资源减少，经济和社会就会陷入崩溃。

要克服这个问题，唯有以今日较高的技术水平(每小时平均劳动时间产出的资本财)，高于前次生产及再投资的技术水平(每小时平均产出资本财的价值)。

因此，一旦认知经济获利能力暂时上升的虚幻，如果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够快，我们就必须了知投资改进技术和保持潜在相对人口密度之间有直接的关系。衡量平均劳动的标准不是量，也不是每度的值。唯一合宜的措施是改进技术。

前文的圆锥函数适用于以负熵衡量技术是否进步。负熵所做的功是人均的负熵也是同心圆投影的定义。

也就是说，人类生存所对应的知识层面和形式，就是负熵功能之类的技术进步，需要一系列相应于大前提(higher hypothesis)的科学突破。社会在一段较长时间内的存续，取决于假定前提(Hypothesis of the Higher Hypothesis)的发现原则。完美的假定前提，即人类执行时与生存一致的知识水平，是人类活动与生存所在的因果关系，也是人类改善了发现原则，从而产生连续的科学革命，即人类的活动与人类在宇宙内存在的有效排序一致，并且不会更低。

假设发现原理的严谨概念- 假定前提 -并不存在于社会中的高效知识，则社会可能无法完成下一个科学革命以延续其存在，使得社会因此往“下坡路”发展。

假定前提上的知识，与人类掌握宇宙的方式相关，人类的知识 -支配的知识 - 与确认的人类永续生存一致。因此，不应接受科学知识以外的定义。

宇宙唯有在执行假定前提的命令时，才会不断回应，也必然是直接对应于宇宙合律的有效“层次”。因此这个层面构成了明确的经验性证据，唯有在此层次，人类才能真正明了宇宙的合律程序。

黎曼教授从这个角度阐述了数学物理假说的基本原理，正是罗素如此狂热、非理性仇视此假说的立场。

相对于数学和数学物理学，罗素的观点和论点纯粹是无稽之谈，如果不摧毁那些容忍罗素等人观点者的科研能力，将会严重损害他们的思想。罗素不只是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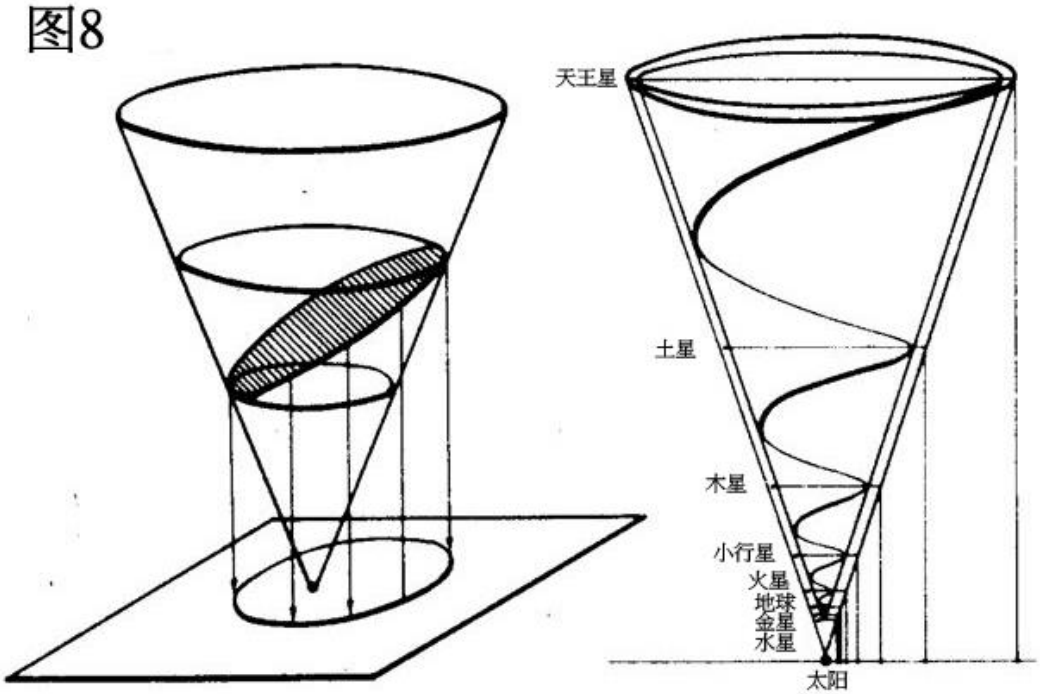
鄙、心怀恶意、充满忌妒的男人，他小气、嫉妒、有仇必报，激发他对黎曼、魏尔斯特拉斯、康托尔、高斯和菲利克斯·克莱因（ Felix Klein，1849-1925，德国数学家）教授大发谬论，其中的争点是黎曼的道德观认为人类对宇宙有义务，使之成为宇宙之道更完美的工具。黎曼一生中的出版著作并未明确提到此点，但是他在1854年著名的德国大学教授资格论文“关于几何学的假设”的基础科学大作中，熟悉此书的人都很清楚他的观点，这本著作也是罗素对黎曼单挑进行疯狂、非理性攻击的第一本著作。

黎曼1854年的出版品中，引用高斯在他自己的算术几何平均值的发现，及椭圆函数的相关作品中，毫无保留的呈现相关内容。

再参考一次圆锥的负熵行动，聚焦于(圆锥)两个连续圆形底座之间锥体的体积。从下方圆形底座的任一点开始，从圆的对角线往上方的圆切下椭圆形的切片（图8）。椭圆的主要拓扑意义在于比圆多一个原始奇点，系统中从 N 到 N + 1的负熵行动中会增加一个奇点。

(1)天文学中的黄金分割，以及(2)从太阳泛音原理推导出所有开普勒定律的几何原理，二者都与与谐波特性有关，也和宇宙中包括星体规律轨道在内的所有运动都是负熵一致，表示整个宇宙的时间方向是负熵，与科普中宇宙的时间方向是熵的假设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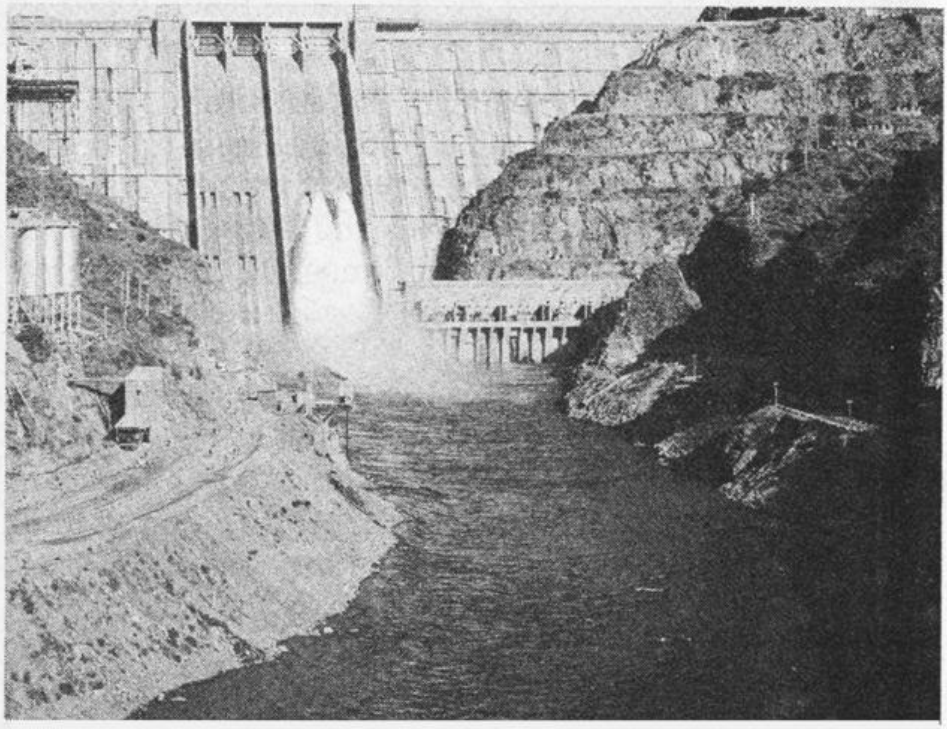
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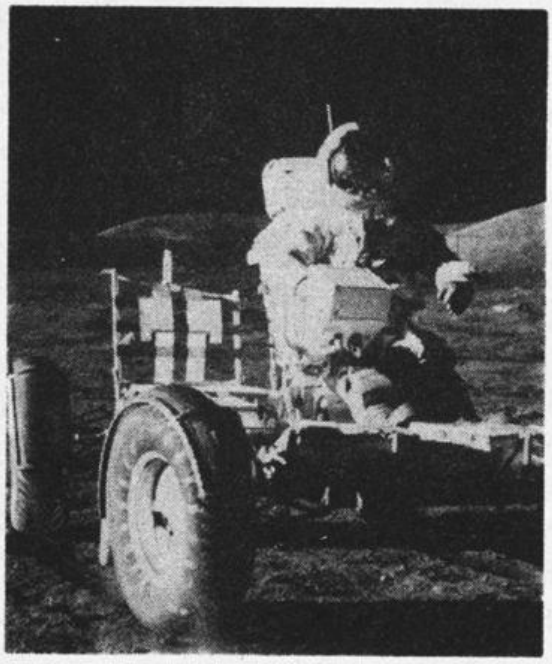
这表示宇宙中包括星体规律轨道在内的所有运动都毫无疑问是负熵，与一般天文学中与黄金分割有关的谐波特性占主导地位，以及从太阳泛音原理推导出所有开普勒定律的几何原理一致，表示整个宇宙的时间方向是负熵，与科普中宇宙的时间方向是熵的假设直接相反。

正如人類能夠生存的知識特徵是負熵，所以整個宇宙的合律程序被認為是負熵。 人類經由與宇宙之道的合律程序完成協議，並依之執行、掌握宇宙，成為道的有意識工具。

人生而神聖，增加人口就是實現宇宙法則，人類的做為一旦不能與此法則一致，社會就會崩潰，遲早會有另一個滿足(宇宙)法則的社會出現。這就是人口法則。



第三世界國家的大型開發項目，比如印度最大的巴卡大壩（Bhaka Dam，上圖），如今與探索、殖民太空同樣重要。下圖，月球探測器。今與探索、殖民太空同樣重要。下圖，月球探測器。



6. 例如，英國選擇擔任積極的角色

本书一开始就强调从人类的角度探索和殖民空间的观点。我们从几个角度引用这个观点，并以此为可能的参照点。因为现有技术的组合使人类有可能进行空间探索和殖民，也会在不久的几十年后，引入规模显著且不断增长的过程。随着我们在未来几十年弥补国与国之间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人们很快就会理解，人类生存的目标似乎就是殖民太空。与此同时，试着把想像力提升到太空后，再回头看看发生在地球上的琐事和其他愚蠢行为，也许应该客观地看待现在所执行的政策，对平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采取更宏大、更有意识的批判性观点。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对于那些蛮子说某些人口的生物特征是“民族特征”的满口胡言，更不值吾人费心鄙视。

整个人口中，政治和相关差异的质量只有一个区别，就是“文化”。

一些与 “文化”差异有关的问题，从太空殖民的高度来看并不重要。例如，饮食、衣着、风俗等的差异，对美国人来说，就是指“最喜欢的中国餐馆”。我们拓展了经验，也满足了探索其他类似的习俗。文化范式中唯一真正的重大差异，就是“对”“错”思想的差异，是传达人在天地间的意义及人在宇宙间行动的分歧。

人类有各种“错” 的文化范式，其共同特色就是与人类为敌。各国透过战争等手段传达了与人类为敌“错”的文化范式；种族灭绝，或者仅仅是对被征服人口的野蛮掠夺、人类奴隶制、种族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都是“错”的文化范式。霍梅尼在伊朗的崛起是“错” 的文化范式，同样的德国纳粹主义或意大利墨索里尼治下的法西斯主义，或根据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erg，1891－1967，苏联犹太作家）的莫斯科宣传指示--杀害和强奸被征服的对手--都是错的文化范式。

对于 “错”的文化范式，只有两种作法：指定机构进行强制检查，或者转换特定人群的文化。此时，只要不是只用强力或诱导转化，使用武力或强迫文化转变不算“错”。只有机构本身代表”错”的文化范式所实施的行为，或者新的文化范式本身是“错”的时，这种纠正措施才是”错”的。

无可否认，许多人初听这些话似乎相当“不民主”。今日普及的“民主”激进版本在1936年或1938年会以下列问题判断纳粹主义的优点，例如，多数合格选民是否真诚地拥护纳粹统治，或者“民主威权” 政府在国内受到相当规模的民众支持，却犯下残酷镇压国外人民的恶行。同样的，今天，人们根据短暂支持的“民意”百分比来论证或反对马尔萨斯的政策建议，却无视于辩论的政策是多么残酷、不道德，甚至无可挽回。

“民主”的概念纯粹是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边沁的论点：无视于对人类可能会造成何种后果，都以提出各式意见为“乐趣”。这种“民主”过去曾经出现许多非理性暴政，是少数人直接针对多数的暴政，比如古代雅典时期波斯资助

的“民主党”暴政，或法国的雅各宾恐怖统治。

不可测的意见暴政，经常成为满足少数意见的暴政。由于“纯粹的民主”是由不道德的原则定义，通常会导致不道德的后果。

政府的原则必须是依法订定民主共和国目标。政府管理人类的活动或大众多数人同意都无法弥补人类的痛苦，如果法律本身是”错”的，也是以法律的形式表达了 “错”的文化范式。民主的共和政体，必须根据“对”的文化范式的法律“订定。这项法律和以之成立的政府，受到人类不可侵犯的生命约束，政府有义务促进个人发展神圣的潜能，并提供机会实现发展潜能。

在适当的法律约束下，人类根本无权对多数人的任何意见说东道西。对此持相反意见的说法本身就很邪恶，为此辩解的人也很恶毒。我们有权也有义务缉拿凶手，捍卫国家免受致命的破坏。除非是符合尊重个人生命神圣的法律出现这种情形，否则没有一个人、政府或普遍多数有合法的权利，夺取任何人的生命，或破坏其生活条件，而且此点绝不容妥协。我们只能为了维系(人类或国族的)生命而终止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可能为了推翻暴政，或者再无其他方式打败“错”的文化，而在战争中杀人。只有拒绝或严重违反人类在宇宙中是神圣的原则时，我们会以战争或相关手段反对该暴政或”错”的文化。

我们可以正确地使用武力，使“对”的文化范式畅行，遏制“错”的文化范式，并且也可能仅仅为了同样的原因，由同样的威权向人民推动“外来”文化。

不，我们的观点被不正确地描述为“不民主”，却是我们捍卫的个人神圣权利。关键是，“民主”的定义决不能与“对”“错”分开。

根据定义，在社会上进动“对”“错”的定义会引起派别冲突和其他困难。由谁和什么方式决定“对”“错”？不能由任何威权推动。也不可能仅仅是因为教会教导“对”“错”，或者因为教会传统上普遍为多数人接受，就由教会教导。不行！教会在“对”“错”上的教义尚须进一步厘清！

这不表示教会就是错的或是高于一切；教会的宗教使命是引导个人走上正确的道路，因此，教会为这个目的而受敬拜。此外，科学证实了圣奥古斯丁和柏拉图的上帝，阿蒙和摩西的上帝存在；宇宙整体是持续、创造性的自我进化过程，具有生命存在的基本特征及明显的意志，有效地与假定前提反映”道” 这个普遍的生命体存在一致。人的意志因着基督的爱而与道一致，库萨红衣主教十分了解圣奥古斯丁和圣约翰福音是有科学证据支持的。因此，某种宗教教义和体现教义的教会是有权力的。我们无论个人和万物生灵与道之连结的责任都很重要，意见也都一致。

问题在于那些表面上遵守这些原则的教会，会有意或无意地否定实践。我们不应容忍表面上坚持正确教导的教会执行神权统治。宇宙中已经有一本活生生的上帝圣书，其他的书只是引导我们正确地阅读宇宙时才起作用，或者让我们个人与最伟大的祖先和他们的作品沟通。

人类的大家庭中，其中有许多宗教，正处于探索和殖民空间的边缘。因此，制定国家法律只能融合各大宗教和宗教文化，这些文化对个人生命神圣性有共同看法，也对释放和发展人类内在神圣的潜能负有义务。哪本书中可以读到这项法则？哪本书中的律法可以让我们一致通过成为国家的法律呢？哪本书中有大家都同意的“对”“错”之别？

笔者同意许多教派的教义是不可动摇的真理，是社会实践的基础。然而，他不会试图把相关宗教经文并列，仅仅因为经文内容碰巧一致而建议大家将经文作为共同遵循的法则。我们无权制定这种普世法则，也无法提出这个法则。我们必须向世人证明对、错。除非担心自己的宗教信仰可能有错，否则任何宗教信徒都不需要对这个程序的正确性心怀恐惧。

令人安慰的是西方文明遵循创世纪的命令，人类必须不断增产，繁衍生息，填满地球，统治自然及其中的一切。笔者和许多人一样，完全同意此点。更令人安慰的是圣保禄传教的著作和圣约翰福音书一致，或者库萨红衣主教在佛罗伦萨议会的议事上与别无其他的前提一致，与《论信仰的和平》（De Pace Fidei）一致，或者与亚历山大的菲洛[7]和伊本·西纳[8]的形而上学一致。能够与梵文学者坐在一起也很令人欣慰。不过，这还不够。我们必须藉由上天在人类面前证明“对”“错”的律法。我们将这一切归功于这些书的作者和书籍本身，以及以此为生的人。我们也应该从他们身上及人类争取掌握宇宙合律程序的历史中学到，并从中引申出人类即将进入诸天的成文法。

生命之书－“创世纪” -嘱咐人类要提高潜在相对人口密度。我们已经有些不情愿地拖延服从这一嘱咐，使人类的潜在相对人口密度比人类的原始状态高出两位数以上。书中叮嘱我们，在劳动过程中掌握自己的命运，进行连串的科学革命，从而找出共同的发现原则，使之有效地安排并继承这种革命；这种发现的原理其确切的性质接纳我们知识的完美性。正是这个原则、这种能力使我们有别于禽兽，我们里面是神圣的潜能。

我们的责任很清楚，就是使这些知识日臻完善，不仅仅是因为物质优势，而且是为了完善本身。我们从最后的分析中可知，知识的目的不是追求物质需求，而是满足引导我们进步的需求，透过劳动完善我们的知识，逐渐与道合一。

我们做的每件事，无论是在生活中劳动，还是判断律法的问题，都渴望进一步完善假定前提的原则。道是宇宙的规律，自然律。在“道”这本书中，我们必须向所有人宣读律法。现在是翻开下一页往前走的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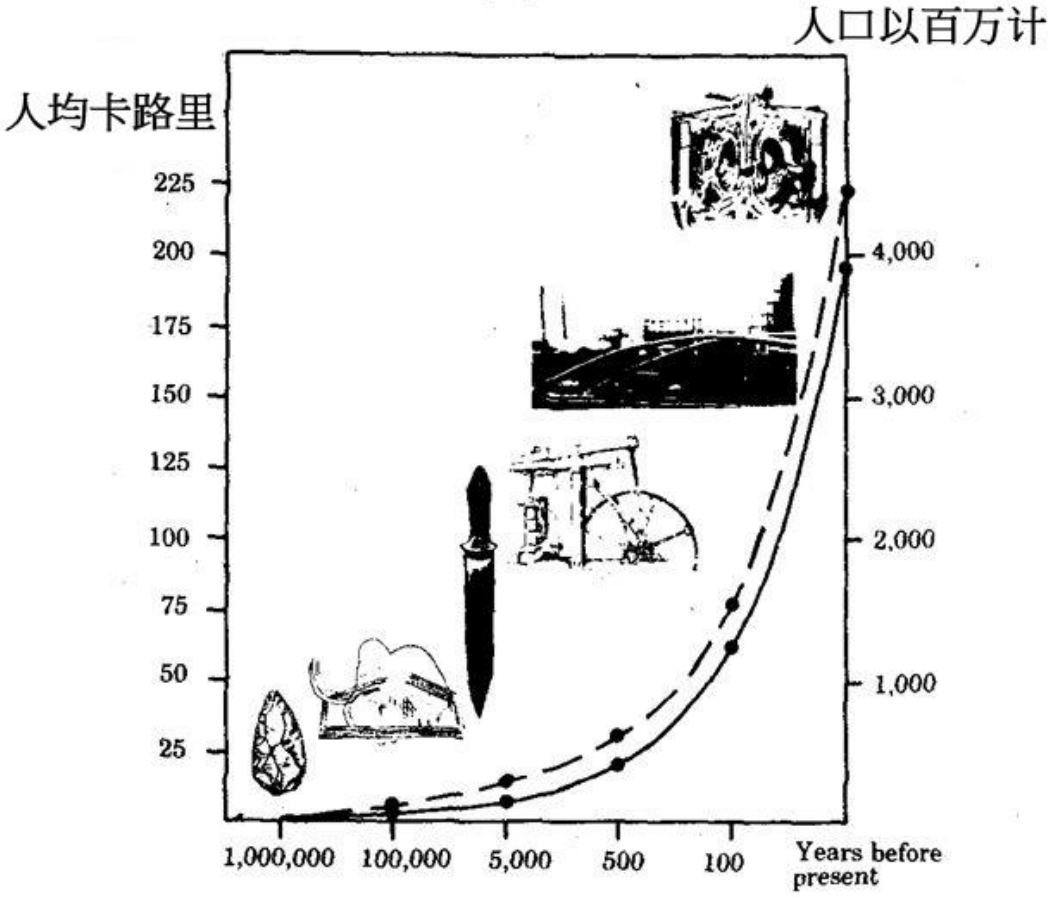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进步就是律法。

---

[7] Philo of Alexandria，约西元前 25～40 或 45 年，是生于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哲学家和政治家

[8] Ibn Sina，又称阿维森纳，西元 980—1037，为中亚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医学家。塔吉克人

图9



显示人类历史主要时期的时间线。从二、三百万年前到大约五千年前的古生物史，特点是石器和逐渐改进的狩猎和收集食物的方法。考古发掘中，大约5000年前青铜器时代开始发展农业。之后的2500年一直到现在，引入石化能源和原子能使相对潜在人口密度增加了三位数。

柏拉图、圣奥古斯丁和但丁

反对意见认为："技术进步未能证明有助于其使用者更有道德"。没错，它提供职业刺客更佳的武器，提高他的专业度，却无法诱惑他提升道德。

这一点都没错，个人技术进步的经验，至少和人类的共同经验，增加理性思想和社会行为的附加价值相关。人们因此越来越理性，其实就已经更有道德了。其相对的一面却更真实。技术悲观主义，无论技术停止进步，还是缺乏获利，都会导致文化的悲观主义。因此，文化悲观主义或多或少会把全部的人变成魔鬼；纳粹就是一个例子。同样，贬低一个国家人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殖民行动"之类的手段压制技术进步，占领者对另一个民族，无论是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持藐视人类的观点。

然而，尽管技术进步对道德和物质都有利无害，也无可争议 - 如果采用我们在前一章中定义的技术进步，这项事实却未回答反对意见暗示的各种观点。我们必须考虑技术进步如何提升道德。

因此，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柏拉图、圣奥古斯丁以及但丁的神曲提出最著名的问题：人类道德有三个不同层次，分别是但丁的"地狱"、" 炼狱"和"天堂"。这三种道德水平是人类社会状况的自然选择，是产生和吸收个体潜能原(始)根(源)的文化范式。正是这些过程，技术进步的经验或缺失才会影响道德观（文化范式）向上或向下发展。

我们都生于"原罪状态"，天生就是非理性的享乐主义者，但也随著成长而拥有神圣的火花，克服天生的道德堕落。社会上的邪恶来自(1)幼稚、非理性的享乐主义发展失败的过程，或(2)儿童、青年或成人退化到婴幼儿的(非理性)状态。

例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边沁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9]的道德哲学基本上就是道德上的婴儿。婴幼儿渴望"我想要"的，对社会整体的影响毫不在意。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存在主义的本质，以及个别纳粹者流的哲学根源，也是但丁的"地狱"。

大卫·休谟因此得罪了康德，他写了几本影响广泛的书，驳斥休谟不道德的"哲学(信仰)无差别主义"。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一书中以"实践理性辩证法"总结。对于出现个人道德决心的定义提出了"人"的概念，其中或多或少都是但丁"炼狱"中"人"的状态。

弗洛伊德可能对康德的观点不以为然，不过康德认为社会在婴幼儿心理状态行事，"压抑" 婴儿冲动的特征，以免产生令人讨厌的后果。个人对父母和社会的爱与这种"压抑行为"有关，对"压抑"经验的依恋促使个人视"压抑"为"积极"。因此，"压抑"的负面性被爱抵销，受压抑者甚至对此冲动的变化引以

[9]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著名哲学家及经济学家，十九世纪深具影响力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为傲。透过“一再的否定”，个人因此确认自己是有德者。他将无所作为，性格变得孤僻，至少在这个过程中非得因恶心受苦不可。

康德对爱情并不关心，在个人生活和作品中，显得枯燥无味。有人可能指责我们为康德加料，其实我们是在纠正康德。

席勒注意到了康德的无趣，强调康德的贫穷造成他的不足，枯燥无味的老康德无法掌握伟大艺术构成的积极原则。康德是个光明磊落的老人，即使受制于错误的假设，他也保持一致的特殊美德。康德的优点是把他的假设推到极限，并如实地报告他所遇到的情况。他的作品《物自身(Thing-in-Itself)》和他与先验综合知识斗争的直白报导，都足以为证。有人担心可怜的老康德死后不但会被送到炼狱，还会顽固地拒绝离开。他相信有天堂存在，但也顽固地认为没有合乎逻辑的方法进入天堂。康德羡慕天堂的想法，但是他不会想要这里；如果圣彼得(天堂的守门人)问笔者的意见，笔者会建议就把康德留在炼狱，那里的风俗和气氛都适合这位老人出了名的牛脾气。

事实上，康德限定的“先验综合知识” 具有假定前提(hypothesis of the higher hypothesis)的形式，因此不仅存在，原则上亦足以为人类自觉的理解并接受。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康德困境的视角上，然后从席勒(诗人、古典戏剧家、历史学家)的角度审视。这种探究不仅与康德无法进入天堂有关，也与多数社会道德人士普遍存在类似的困境有关。

前面略述当代数学物理学中，从几何物理开始，宇宙中只有单一的作用量原理。相对于想像的可见空间，这种单一的作用量原理是圆形旋转的形式，因为微分拓扑的等周第一定理定义了圆形旋转。第一次旋转并非藉由衡量标准或准绳定义圆平面，而是圆本身的动作从无到有创造了宇宙。在此之前，没有衡量标准定义平面，也无法指出圆的大小。

这是物理空间的第一个定义。我们已经在无形、无量的宇宙空间中引入了一个范围。接着，对创造的圆执行同样的动作得出“直线”，这是从圆的同样动作中，平面对折减半时，从上一步动作中所定义。现在，我们已经为整个宇宙引入第二个定义。然后再将圆对折一次，就出现“点”了，这是第三次加于原本无形无量虚空的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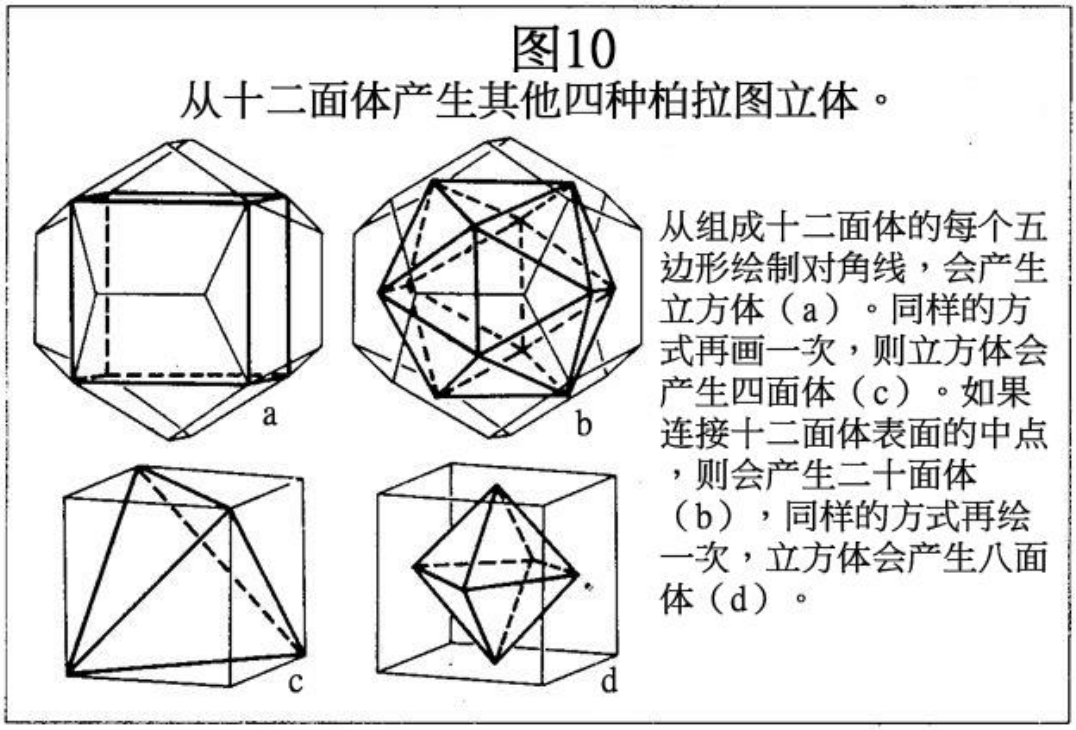
我们用这种方式，详细地创了造宇宙。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用任何东西，只是从原来的行动中创造出来。

我们在采取动作时须提醒自己不是造物主。我们会思考创造，并将创造定义为神造宇宙中一可能的动作。然而，我们只是想像创造，其实并未创造宇宙。一旦提醒自己这个重要的事实，我们就是物理学家了。我们权且比较一下自己想像创造与创造自己是其中一部分(既有)存在的事物。我们研究发现存在的事物就是创造的过程，而且衡量创造原理与创造过程相反。

在这种开悟的状态中，我们想起了柏拉图立体。柏拉图立体的中心是五边

形：在神造的可见空间中，一切都从圆上推演的十二面体与五边形有关。 （见图10 其他四种柏拉图立体对十二面体的依赖关系）。

然而，可见物理空间的几何有界性说明可见空间是现实的扭曲反射，并将我们引导到复(数)域的圆锥函数，充满可见物理空间的谐波特性和其他明显特质。复数圆锥函数在复域中的连续域，一切都直接与创造最小作用量原理的单一原则(我们为最小座用量取的名字)一致。实验上证明，这符合造物主构成宇宙的律法。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正确地发现造物主创造原则的基本特征。现在，我们已经学会开始阅读”道”这个伟大篇章在天堂的序篇。



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乐园，条件是我们完全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创造的原则是创造的概念化，宇宙中行动本身就是创造，因此是可知的原理，其中暗示我们只要掌握这个原则，只要我们遵循造物主实践创造的方式，我们就能创造。我们渴望掌握他创造的方向，成为造物主的工具，掌握这个原则。当这成为我们的荣幸时，我们已经通过门户进入乐园。

康德在这个问题上错了。

古典诗歌和戏剧创作的本质，或者理解宇宙历史，都是以有限的方式思考，也就是思维本身成为对象，想要理解我们（和其他人）为什么认为我们可以被观察到。只要根据决策的实际后果调整反思的对象，我们就能够在自己的想法中孤立那些有重大影响的假设，以免为社会或者为我们自身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科学普遍存在的基本假设进行严格审查，为影响科学革命做准备，我们愿意改变自己一般决策的内在假设成为更好的人。

埃斯库罗斯[10]、莎士比亚和席勒所特有的古典戏剧是意识思维最集中的表现。以席勒为例，他后期的悲剧作品系植基于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尽管他在舞台上用戏剧性的自由来改变历史，但是舞台上所有的问题和行为都忠于历史，是历史上实际发生的问题，也是真实历史上领导人和人民真正悲剧的集中体现。因此，他的每一出悲剧都与大前提(higher hypothesis)的原则一致。席勒一生除了是德国最受欢迎也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和剧作家，他大约在1850年左右也是政治领袖，在包括歌德、康德和年轻的洪堡[11]在内的魏玛古典主义圈内更是无人出其右。席勒在莱布尼茨之后形塑了施泰因男爵[12]、洪堡和沙恩霍斯特[13]在1809 – 1813年发起的改革。特别是法国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可怕景象之后，他致力于确保十八世纪莱布尼兹和富兰克林早期创造的伟大时刻，德国人民不会发生类似法国“小人物”的悲剧。虽然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1815年之后在维也纳国会背叛德国，使德国人陷入沮丧和浪漫主义的文化悲观主义，1809 - 1815年席勒的戏剧塑造了许多德国人成为伟大的民族，是近代史上人民文化范式最高贵、最迅速的转变之一。

席勒在对可怜的康德美学错误观念提出令人震惊的批评，激发伟大艺术的创造性原则，其效果与我们前述的创造性原则一致。

所以，我们确定了已经上天堂的人有双重身份。他对自己劳动的智慧享乐，就是领会创造性原则，积极地在宇宙中为这个原理尽心尽力，服务于造物主不断创造的原则形式和方向。他这种快乐的智慧品质来自于对人类的爱戴，以及对德国人民道德水准的有效性与创造性的热爱。如果这两种品质没有合在一起，并以相同的热爱与个人的责任感服务造物主，就上不了天堂。

为了爱，就要努力把人类带入乐园，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这是"道”在天堂里继续写的伟大律法书籍，是我们必须向地球上的人民宣读的律法，这些人道德上可以预备上天堂，为了达到启动大探险的目的，他们不能相互毁灭和自我毁灭。

这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近似的情况。一人以所知现存同类中最好的特征构建一物送给另一人，他乐在其中并分享给接受者，也乐于将此能力投入于此一创新。

---

[10] Aeschylus，前 525－前 456，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一起称为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有“悲剧之父”的美誉

[11] 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inand von Humboldt，1767－1835，德国学者、政治家和柏林洪堡大学创始者，是德国文化史上影响最深刻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12] Baron vom und zum Stein，1757—1831，普鲁士王国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政治家、改革者

[13] 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家及将军

图11

开普勒对音程的推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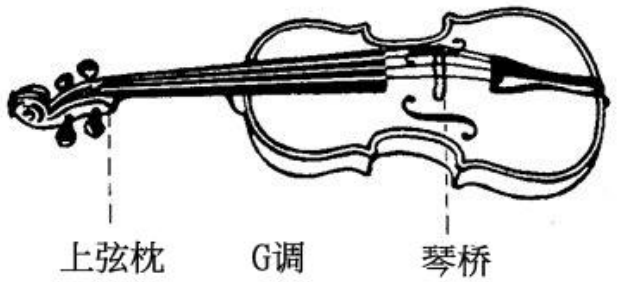
自从希腊人毕达哥拉斯以来，已知弦的振动产生两个音符之间的音程系由张力相等的(琴弦)长度比例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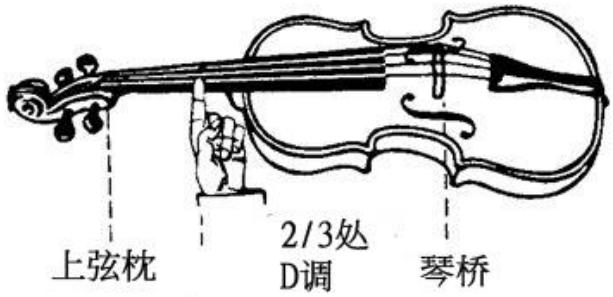
希腊人确定的比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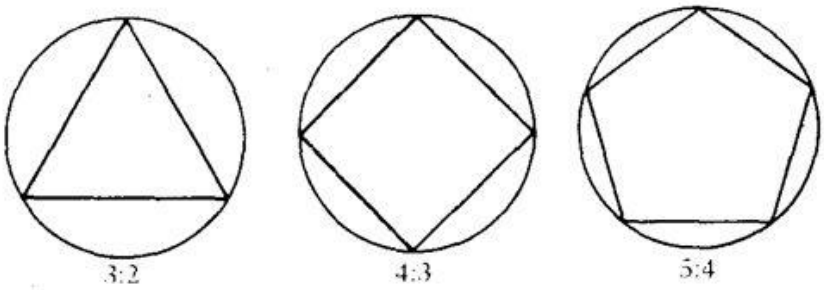
八度	Octave	2:1	“主要”间隔
五度	Fifth	3:2	
四度	Fourth	4:3	
大三度	major Third	5:4	
大六度	major Sixth	5:3	
小三度	minor Third	6:5	派生间隔
小六度	minor Sixth	8:5	

毕达哥拉斯原理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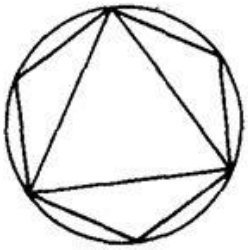
为了在G弦小提琴上产生D调，手指必须放在琴弦2/3处使之振动。开普勒运用柏拉图立体从几何推导出这些比率。如果一条弦做成一个圆，那么五度、四度和大三度就对应于圆内的柏拉图立体表面的三角形，正方形和五角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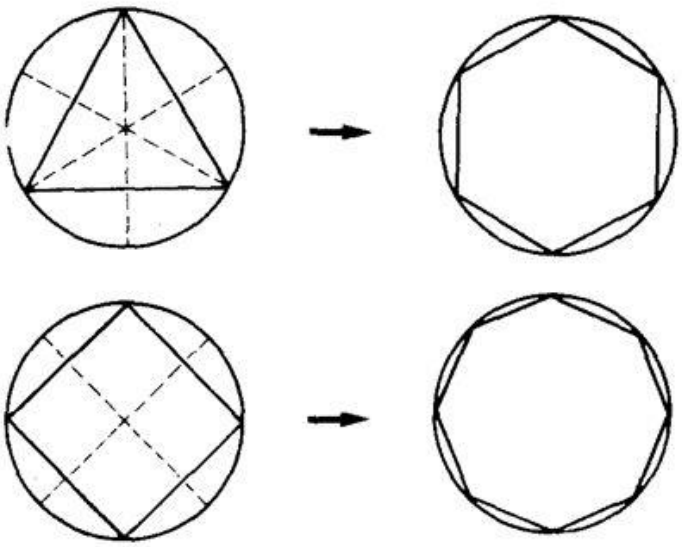




这些是“质数(又称素数，指在大于1的自然数中，除了1和该数自身外，无法被其他自然数整除)”，对应于算术质数，其中不包含正多边形。因为六角形包含正三角形，所以不是质数



从其他协和音程中，大六度来自五角形，而小三度和小六度则分别来自六边形和八边形。六角形和八角形是通过三角形和正方形的加倍得出（下图）。



开普勒解释说，诸如7：6等其他比率在音乐上不协调，因为柏拉图立体无相应的多边形表面，也无法已直边和圆规建构。

精心构思的诗是另一个表达相同设计原则的例子；满足同样原则的音乐作品是最伟大作曲家的特征。伟大的作曲家为了上述原则将自己与“专业赞扬”分开 - 他从来不是单纯的艺人，也不寻求艺人的成功。其间必有一项道德原则：一个有用、巧妙为特征的礼物，致力于扩大音乐作品的影响力，其中有爱，沿着寻求真理顶端的路径、甘冒风险。他们编写一部好戏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让人们在娱乐高尚，进而将世人引入天堂，一如席勒的戏剧。

事实上创作音乐的力量在本世纪已经是失落的艺术了，所以选择依此创作原则直接进入平均律复音音乐的所有本质特征，让我们用(但丁的)「天堂」这个作品为范例。音乐和声理论和作曲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音乐作为一种语言形式与人有关的“文化”，最终只是道德上的差异。无论音乐理论上的差异如何发生，根源本身并非音乐，而是反映那个人的道德水准所选择的音乐理论观点，与他当时个人世界观的道德一致。

我们之前提到音乐从复音音乐平均律的调性范围开始。创作中，有可能只有一组音乐的调性和和声关系，平均律的数据由柏拉图立体的原理决定，和前述的圆锥函数定义一样。第一位音乐家出现之前，这些数值就已经存在，是调性和和声的唯一音乐数值。

事实上，我们知道，柏拉图时代，甚至可能更早，就采用平均律的值，并由九世纪的伊斯兰科学家阿尔·法拉比(al-Farrabi，870－950，中世纪钦察部落著名哲学家、自然科学家、音乐理论家）指定的。他写道，他当时在12个调以及八度音阶所采用的平均律已经算是相当古老的。有理由相信，达芬奇已经能够理解和运用平均律系统，同时还结合当时已经在使用的发声训练和美声法。十六世纪的札利诺(Gioseffo Zarlino，1517 – 1590)主教开始教授平均律原则，是目前所知唯一处理音乐理论基础的现代音乐理论家。迄今为止所有的音乐理论都奠基于札利诺的作品，否则，现在以音乐理论为基础的所有东西都只是近似，或者多数情况下，都没什么科学价值。

柏拉图立体的含义源自于平均律24个调的要求。音乐中和声进行原则是基于第五、第四和第三音，以及它们的转位音程。也就是说，第五、第四和第三音相当于几何的“质数”，几何上无法再以对折方式产生另一个正多边形。将“质数”加倍后，获得第六音（六边形）、第八音（八边形）和第十音（十边形）等。

音乐的特点是发展部、韵律（我们稍后会指出，音乐是依赖于诗歌）和和声。和声发展有一定的格式，由主要或次要的和声音程，或由复调决定的不和谐音主导，不过不和谐音必须透过编曲解决。不和谐音是一个特殊的奇点，必须在狄利克雷(Dirichlet，德国数学家)原理的拓扑定义解决。以24个调的“功能”作为潜在的表面，其间的解析度符合狄利克雷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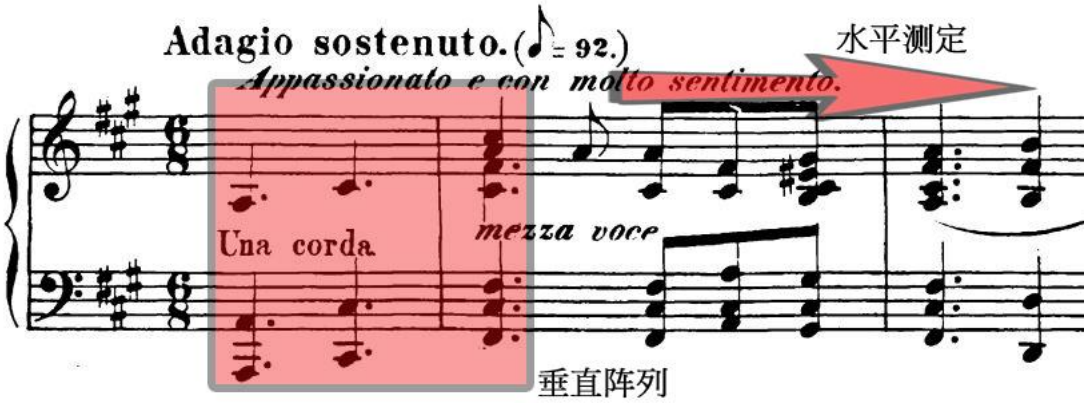
音乐中没有垂直和声，垂直和声是创造出来的 - 几乎和几何上创造线条同样的意义。垂直和声没有规律，也就是说，即使很多音乐家对乐理了解不深，也可能以虚假的印像或习惯反驳。音乐中的所有和声都是水平的，是时间导向，不是垂直的。除了一些不幸的怪胎在嘉年华会和马戏团演出外，复音的每一行由相

当于一个歌声组成，无法同时唱出两个音符。复音在第一个声音的前一个音符之后，引入以时间序列和和声序列第二个歌声进入（标准基本和声）。

换句话说，引入第二个标准音之前的音符处，第一个歌声在它自己的声部中继续分岔到第二个声部的第一个声音，形成一个级进。因此，这两个音符的和声和后面自己声部的音符及第二个声部的第一个音符，决定了垂直和声。

这种分支原则，或跨声部序列，贯穿整个作品。

实际音乐作品中，呈现的结果可能不同。作曲家可能会用和声作为作品的开头，等等之类的。然而，整体作品源于音乐的根本概念，以卡农的方式呈现。也就是说，在作品开头敲打一个和弦，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和弦是如何产生的？那些规范分析说明垂直阵列的水平测定？



这只涉及作曲的和声。音乐本质上是诗歌的产物，因此从中得到韵律的特征。音乐是复调诗，藉由复调，要求为诗歌旋律的音节选择调性搭配和声。作为音乐本质的合唱复音从唱诗中抽离，提供了器乐复音。

近期弦乐四重奏的重点是跨越人声的复音音乐，正是贝多芬发展音乐的方向 - 演奏者必须传达乐器的声音，也要与其他演奏者合作，使得乐器间的声音回荡全场。这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造成以韵律定义声音，使得复音音乐的编配呈现和谐的状态，也是音乐的核心部分：发展部。一部古典音乐作品是一阙复调诗歌，整部作品以完整发展的单一声部为单位编制。这种发展是作曲所特有的“音乐思想”，是（多样的24个调）和声和韵律同步发展。

所以，古典的平均律复音音乐在创作中提出了和科学发现完全相同的问题。古典音乐主要的功能是庆祝演奏者和听众心中的创造力，因为古典音乐运用假定前提.的原理，所以也可以呈现于任何其他形式的创造，其中最重要的是神圣、伟大的音乐作品。

最初破坏音乐创作和聆听音乐的力量，主要是由利斯特（又译李斯特）、瓦格纳（又译华格纳）和浪漫派的其他代表人物所发动，这是令人十分困惑的结果。音乐学家的目的是要发现贝多芬浪漫主义的特色，而古典的勃拉姆斯却与他深怀

芥蒂的对手瓦格纳出现在同一张专辑中。他们认为“古典”和“浪漫”音乐没有区别，只是“一些声音”、“某种风格”。

“古典学派”不是“声音”或“风格”，其原则性观点是以音乐作品表现人与人的本质。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1683－1764，法国伟大的巴洛克时期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就是真正的浪漫派。巴赫（又译巴哈），1782年以后的莫扎特（重点）和贝多芬就是创作真正“古典作品”的例子；他们只运用合律发展的原则，创作（发展等）也仅限于合律发现。浪漫主义学派的原则是一群声音集合的“欢乐效果”，任意半音的“飞跃效果”等。这在十九世纪并不新鲜，但是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1567日－1643，意大利作曲家、制琴师）却早已实践。他是威尼斯聘用的扎尔里诺之前的学生，试图用这种浪漫的作曲原则摧毁扎里诺的影响力。

各大音乐学派的基本特征都已经摧毁作曲家和观众（以及众多演奏家和指挥家）的心灵，这些学派都有系统地违反与柏拉图立体含义相关的平均律复调原理。例如，在勋伯格[14]的废话音乐中，误将完全任性、未严格定义问题的作品认为是“创造力”，而任性的感官效果是“知识分子现代主义者”的典型替代品。所以，演奏者只为了启迪听众演奏一些莫名其妙的内容，因为他们在搭地铁上班时玩字谜、听音乐；想要“理解”并“欣赏”其美感。如果有人厌倦了，就会堕落到摇滚音乐会的纯粹野蛮的狂欢节奏。

摇滚乐、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学派都是“地狱”的居民。这些过得去的作品，如同那些模仿古典音乐学派的作品，也像之前一个严肃的作曲家仅仅重申解决问题的发展，就把我们引到康德的“炼狱”层面，而我们习惯贝多芬作品的突破发展原则，就是“天堂”的观点。

今天的“炼狱者”通常是很熟练的演奏者，他会惊讶于自己尽管已经掌握了诠释乐曲，仍然不会作曲。听他说明他诠释的原则，就会立即明白他不会编写古典作品是因为他不采用严谨的观点 - 古典作品赖以奠基的类综合几何观点。他太在意“听起来应该是什么”，却忽略了严格定义的音乐思想。

一般而言，我们的思想和道德是以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中心，因此科技进步影响道德是从三个层面中的一个层面转向另一个层面，其间的关系有两个相互影响的层面。首先是关于我们如何评价其他人；其次，我们如何定义社会个别成员的活动在协同效应方面的共同目标。正如科技进步的原理影响后者，我们也定义其他人的实际价值。

技术停滞的社会中，其“传统”社会实践模式就会有兽类般的质量。此时我们会意识到自己依靠别人的创造力，重视别人心灵的创造力；也唯有此时，社会成员间会相互待之以礼，也是康德学派定义为“道德的”社会人口。我们在炼狱中体认到人类心灵创造的力量是发现和吸收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而且我们的福祉依赖于此，也取决于社会上其他人面对一般事务时的理性行为。

[14] Arnold Schönberg，1874－1951，奥地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

我们期望进一步转变：把技术进步作为发展创造力心灵的必要方法，而不是把心灵发展的力量视为获取技术进步的物质利益。一旦大家都热爱心灵发展，就会促使人们推动技术进步作为社会共同发展彼此间的心灵；那么人们就已经走向天堂的大门。

反之，我们会采取的教育政策，就是把人们从天堂的门前赶走；这种教育方式，我们只会关注他们成年后的就业等等。如果我们在各方面不重视技术进步，那么这种观点就会把人们从炼狱驱赶到地狱的不道德生存。

总而言之必不可缺的政策

如果我们拥有引导我们进入天堂的爱的品质，那么我们必须同意两项政策。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引进先进的技术进而提升技术，以增加人类的潜在相对人口密度，协助大多数人摆脱战后经济政策和当今经济崩盘所推动的趋势。让我们致力于为下两代人，消除地球上几乎所有因此产生的不公平现象。其次，我们必须同时为人类进步到更高的共同目的：空间的探索和殖民化，无论我们之后发现什么更高的目的，都要引领人类。

这种双重解决问题的功能是为了指导人类实践政策，以及分享实践的目的意识，以引导人类的一般观点，以及汇集在人类在宇宙中进入天堂的道德条件。

马尔萨斯主义及其反映的邪恶文化范式，无论采取何种法律手段，都必须立即从各国的习俗中拔除。根据自然法则，马尔萨斯主义不应视之为政治观点；它是某种犯罪形式，其主张是犯罪心理的陈述。那些马尔萨斯主义者会造成有权活下去的人死亡；而且，马尔萨斯主义者，不论以任何理由、任何时候都无权剥夺他们的生命，也无权通过新闻媒体和其他洗脑方式引诱他们接受死亡。即使受害者同意，特别受到社会压力时，安乐死也是谋杀，是死罪。

然而，徒法不足以成事，我们不仅仅满足于监狱里越来越多的吸毒者和贩毒者。我们必须根除作恶者的恶行，改变潜在作恶者犯罪或犯严重错误的文化范式。为了在道德上活出人类的尊严，我们必须从事“文化工程”，使科技进步成为国家无可改变的政策与国家之间关系无可取代的政策，而自然法则可以为每个人的利益服务。

我们在本书具体地提出，英国和美国东部权势集团的领导圈，应对非裔实行奴隶贩售、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以及帕格沃什会议在此恶行中助其成事的罪行负起道义责任。这是本书对英国的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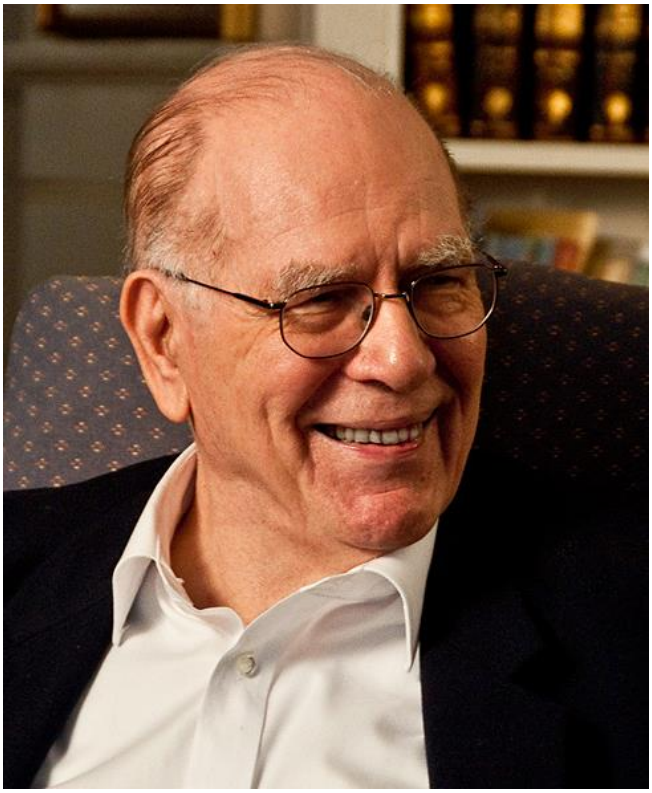
成立帕格沃什会议的英美国家与其他国家，把我们带到了全面热核战争的边缘，启示录中的四骑士(传统上认为是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爆发前，文明就可能已经倾覆或者成立苏维埃统治的世界帝国。这些结果对人类和其本身都是灾难。

现在是时候了，在这些事件的过程中，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必须对当前

日益严重的危机有所觉醒。他们必须重建自己国家的经济，并为此目的提供最先进的技术。因此，我们希望，这个起动全球大多数世界的经济，含蓄地说，不会成为全面战争的前兆。我们也希望受害国人民的思想和道德层面的提升，是长久而非暂时为全人类而为之。我们希望，对即时险境反应的好处足以超越当前危机，则我们所有人都能这个过程学到经验，并因此渴望改变自己，让我们自己自苦与乐的假设原则中脱身，因为这已经让人民退化，同时把我们带到灾难的边缘。

让我们从个人和民族的角度相互提醒，对社会进行所谓的“文化工程”，国家间都从人的观点接受宇宙的实践法则；每个人类的生命都很神圣，我们所有人都会全力支持和保护使其道义上的存在很丰硕。

关于林登·拉鲁什



林登·拉鲁什(又名拉鲁旭)先生是国际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他在这些领域的卓越成就渊源于他对哲学和科学的深邃见解。

1922 年 9 月 8 日他生于新罕布希尔州的罗彻斯特。二战期间，他在中缅战场服役。完成兵役后，他于一九四七年结束在波士顿东北大学的学习而开始从事管理咨询工作。

1952 年以后，拉鲁什深入研究了伯纳德·黎曼和乔治·坎特的数理物理学。他认为，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基本发现，其中包括定量分析技术进步与实物经济增长关系的拉鲁什－黎曼方法，均来自于他在这方面的研究。

1974 年，拉鲁什创办了一个国际新闻服务机构，并由该机构出版发行《主管策略评论》(EIR) 周刊和其他一些专题报告。拉鲁什有许多著作，如《辩证经济学》[PDF]（1974 年），《理性的力量》[PDF]（1976 年），《帝国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后阶段》（1974 年），《增长无极限》（1984 年），《你想真正掌握经济学吗？》（1984 年）（该书也以西班牙文、俄文、乌克兰文、波兰文和德文出版），《理性的力量：1988 年》（1988 年），《常识之辨》（1990 年）和《基督教经济科学》 （1991 年）。

拉鲁什是聚变能基金会（1974 年）、生命俱乐部（1982 年）和席勒学会（1984

年）的创始人。 1994 年，他当选为莫斯科全俄生态科学院院士。

拉鲁什在 1976 年以美国劳工党侯选人身份竞选总统，目的是重新振兴亨利·克雷和林肯总统的辉格党传统。他是 1980 年全国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创始人。在民主党内一些重要党员的支持下，他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在 1980 年, 1984 年, 1988 年和 1992 年竞选总统。 1990 年，他还是 弗吉尼亚州第十选区联邦众议员的民主党侯选人。

拉鲁什的基本理念是全民福祉，他认为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间应透过彼此之间理性，科学性的合作追求共同的发展。早在 1970 年代他就指出西方缺乏自律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根本问题，正确预言多次金融危机 。

他也看到了冷战时代维系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领袖的两大集团间和平的基础--保证彼此相互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核子武器恐怖平衡--是何等的不稳。因此他首先提出反弹道导弹防御政策。这一政策后来由理根总统在 1983 年 3 月 23 日以“战略防御倡议”的名义宣布。当苏联拒绝了理根总统的邀请共同发展和享有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后，他成功预言了柏林围墙的拆除和苏联的解体 。

多年来他预言国际金融体制的不可避免的崩溃。他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开发银行以作为全球债务重组的中央机构。由于这建议，他的名字为整个发展中世界所熟知。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计划，如印度的冈吉斯－布拉玛富特拉河谷开发计划，亚洲的湄公河三角州计划，中国的南北运河计划，东欧生产三角区计划，以及连接欧亚大陆 、中东和世界许多地区的新丝绸之路铁路计划。孙中山先生在所着的建国方略提出一些相似的计画。 他非常敬佩孙先生。

1987 年，拉鲁什先生和六位同事被老布希政府投进联邦监狱。拉鲁什先生作为老布希的政治囚犯，被监禁在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的联邦监狱中达五年之久(「判他有罪还是杀了他!」 那一夜他们要杀我)。全世界 有数千位仪员、外交家、社区领袖和神职人员呼吁克林顿政府为拉鲁什平反昭雪。 1993 年克林顿上任后即着手此事，拉鲁什先生于 1994 年获得释放(见"前国会议员忧恩说:拉鲁什名誉必须恢复")。

1993 年克林顿上任后即着手此事，拉鲁旭先生于 1994 年获得释放 (见 "前国会议员曼恩说: 拉鲁旭名誉必须恢复")。

拉鲁什 1977 年 12 月 25 日与德国政治领袖黑尔佳·策普.结婚。拉鲁什夫人也是生命俱乐部和席勒学会的创始人。

如有进一步关于拉鲁旭或《全球策略信息》的问题，请寄电子邮件至
Leni Rubinstein (陆淋漓):leni_r@msn.com 或者是给我们写信:
Chinese EIR c/o HSDI; P.O. Box 58; Ridgefield Park, NJ 07660

EIR 全球策略信息
chinese.larouchepub.com